

---

# 蘇軾研究

2016年第3期（总第46期）

（季刊）

## 卷首语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  
莫把文章动蛮貊，恐防谈笑卧江湖。  
——《神水馆寄子瞻兄》

周裕锴先生曾笑谈：“苏轼虽然没有出过国，但他的诗文集早已通过盗版渠道流传到契丹。”元祐四年冬，苏辙出使契丹，看到苏轼诗文不仅在契丹臣僚中颇具影响，而且在民间也广为流传。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冲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带给人们无穷的心灵震撼和人生启迪。一千多年后，第二十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宋时契丹首都）召开，100多位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苏轼的作品又一次以灵魂造访的形式抵达北京，给予我们许多思考。

在本期的《苏轼研究》中，我们精选了几篇角度新颖的会议论文，例如周裕锴、王朋《时间与流水：欧苏文赋的书写方式及其审美观念》，陈才智《香雾空濛月转廊——苏东坡与香文化述论》，胡金旺《苏轼与“离铅坎汞”说》等，相信大家会获益匪浅。

---

# 蘇軾

# 研究 SUSHI YANJIU

2016年第3期（总第46期）

（季刊）

- 编辑出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  
《苏轼研究》编辑部
- 委印单位：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 主管单位：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
- 主 编：张志烈
- 副 主 编：周裕锴 方永江
- 责任编辑：刘清泉
- 编 辑：袁 丁
- 编 务：唐雅兰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纪念馆三楼312室  
邮编：620010 电话：(028) 38299092  
网址：<http://www.3swh.cn>  
邮箱：sushiyanjiu@163.com  
印数：2000册  
发送：苏轼研究学者、爱好者，有关高校及图书馆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四川新财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年9月



## 目 录

### □苏学论坛

- 时间与流水：欧苏文赋的书写方式及其审美观念  
周裕锴 王朋/04
- 论苏轼词对现实悲剧性的审美超越 冷成金/12
- 香雾空濛月转廊 陈才智/20
- 苏东坡与香文化述论
- 从域外汉籍看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在宋代的流传与佚卷之复原 卞东波/28
-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庆振轩/38
- 苏轼被贬谪辞、谢表探论
- 苏轼与“离铅坎汞”说 胡金旺/45
- 论苏轼的反贪与自净(下) 彭林泉/49
- 苏轼陆路出蜀路线考探 尧军/57

□顾问：李 静 罗佳明 王影聪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王水照 刘尚荣  
苏 灿 邱俊鹏 周先慎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永江 木 斋 王友胜  
王希龙 王晋川 刘川眉  
刘清泉 朱 刚 孙开中  
李景新 冷成金 张志烈  
张 鸣 张海鸥 张忠全  
杨胜宽 杨常沙 卢晓光  
宋明刚 周裕锴 胡先酉  
涂普生 康 震 韩国强  
**赖正和** 蔡心华 熊朝东  
潘殊闲

## □诗文鉴赏

读《东坡志林》(十二)

徐 康/65

## □苏学专家

一位当代作家对苏轼的凝视

山流水/76

——郑秉谦的苏轼研究

## □新书评介

我与三苏祠

曾枣庄/68

——《三苏评传》又序

## □景苏札记

一读一回新

胡先酉/69

——简评《重编三苏〈南行集〉》

寻访望湖亭

刘清泉/78

## □研究史话

韩国苏轼研究述略(七) [韩] 洪瑀钦/73

## □苏学动态

第21届苏轼国际学术会议征文启事 /80

# 时间与流水： 欧苏文赋的书写方式及其审美观念

周裕锴 王朋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与汉赋和宋前赋论的比较，讨论了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赋所采用的以时间为线索的书写方式，以及与此线性时间移动观念相关的若干赋论。汉赋及其所代表的“赋者铺也”的空间铺排方式，在欧、苏《秋声赋》《赤壁赋》等经典文赋中变为一种按时间顺序的书写。赋论中的“列锦”之喻让位于“流水”之喻，意味着宋代文赋更注重与时间流动相对应的文脉和意脉，追求叙事、抒情、说理的畅达通透。同时，在强调工艺奇巧的修辞性的传统赋学审美观之外，宋代出现了一种自然无营、随物赋形的更为实用性的赋学审美观。这是北宋古文复兴后其“行文”而非“摛文”的审美观念渗入赋体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汉赋 宋代文赋 《秋声赋》  
《赤壁赋》 空间铺排 时间顺叙

何为文赋？顾名思义，文赋是指一种具有古文特征的赋体。自元代祝尧、明代徐师曾、清代李调元迄至当今学者，莫不认为文赋流行于宋代，以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为代表作。至于文赋的特征，学界则主要概括为内容上的说理议论、形式上的散化平易。这自然是不刊之论。然而，当我们聚焦于为学界所公认的欧、苏文赋代表作之时，就会发现为学者所忽略的文赋区别传统各体赋的重要特征之一——时间顺叙。而此时间顺叙的书写，从更深层的角度看，与宋人的赋学乃至文章学的审美观念密切相关。需要指出

的是，本文讨论宋赋的范围主要局限于文赋，继承宋前赋体特征之作及其赋论不包括在内。

## 一、从空间铺排到时间顺叙

《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论赋之语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sup>(1) 99</sup>意谓作赋的外在形式犹如铺列锦绣，如织品中之经纬与音乐中之宫商的排列组合，其内在意识则是囊括整个宇宙和社会。无论是“赋之迹”还是“赋家之心”，都体现出从时空交织（经纬与宇宙）的角度进行构思创作的意识。此产生于文学自觉的魏晋时期而托名司马相如的赋论，基本上概括了传统赋作的构思方式，故后人称赞说：“千古作赋之语，已被长卿道尽。”

<sup>(2) 31</sup>尽管如此，从汉代以来，赋家的主流大抵以空间书写的纵横捭阖为其主要特色。以经典性文本《子虚赋》为例，子虚夸示楚国云梦泽，从其山、其土、其石、其东、其南、其高、其埠、其西、其中、其北、其上、其下各个空间角度展开，大肆铺张。其后的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等各种类别的赋，莫不以其空间场景的铺陈罗列为主要方式。

直至宋代，空间铺排仍被文人视为作赋的重要方法，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夏竦幼学于姚铉，使为《水赋》，限以万字。竦作三千字示铉。铉怒，不视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后

左右广言之？则多矣。’竦又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铉，铉喜曰：‘可教矣。’”<sup>(3) 55</sup> 姚铉所教授的“前后左右广言之”的书写方式，即是空间铺排构思的传统观念的产物。这种方式是“赋者铺也”最直接最简洁的说明。然而，到了北宋中叶，随着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前后《赤壁赋》的相继出现，一种以时间流动为主要线索的新型赋作悄然登上赋坛，并引领一时风气。

作为公认的宋代文赋的典范之作，《秋声赋》的摹声、写景、抒情，说理，都由一条时间之线串接起来。如其开篇即言：“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点明赋文开始时间为初夜，并通过童子之口交待出此时的夜象：

“星月皎洁，明河在天。”而在结尾处写到：“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sup>(4) 256</sup> 从夜读闻声、主仆问答到童子沉睡，从秋声乍临、星月皎洁到声湮虫鸣，其中具有明显的时间进程的转换，而且时间形成自足的首尾呼应。

虽然涉及时间书写的赋作，在汉代就已出现，但时间因素多出现在赋序部分，如以扬雄《甘泉赋序》提及“孝成帝时”、“正月从上甘泉还”<sup>(5) 111</sup>，《羽猎赋序》提及“孝成帝时羽猎”<sup>(5) 130</sup>，《长杨赋序》提及“明年秋”<sup>(5) 135</sup>，皆如此。时间提示的功用只是为点明赋文创作背景，具体时间本身并未在赋的正文中出现。当然，汉赋正文中并非没有时间因素，如《子虚赋》就写了楚王游猎过程，其中使用了

“于是乎乃使剽诸之伦”、“于是楚王乃弭节徘徊”、“于是郑女曼姬”、“于是乃相与獠于蕙圃”、“于是楚王乃登云阳之台”这样的句式引领段落<sup>(5) 119~122</sup>。同样，扬雄《甘泉赋》写了汉帝郊祀过程，也使用“于是乃命群僚”、“于是乘舆”、“于是大厦云谲波诡”、“于是事变物化”、“于是钦柴宗祈”、“于是事毕功弘”等句式<sup>(5) 111~115</sup>。时间性事件成为若干场景单元的排比罗列。而这种排比句式，我们在《上林赋》的纯粹空间铺排中也可看到：“于是乎蛟龙赤螭”、“于是乎崇山矗矗”、“于是周览泛观”、“于是乎离宫别馆”、“于是乎卢橘夏熟”、“于是乎玄猿素雌”<sup>(5) 123~130</sup>。由此可见，汉赋虽然也有一定的时间性，但其时间是非线性的，以“于是”“于是”“于是”的

排比结构推进。换言之，时间之“经”在汉赋中往往因其平行之铺叙而多少被空间化了。

东汉以后的抒情小赋时间因素稍多。典型的如张衡《归田赋》中有“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于时曜灵俄景，继以望舒”等句<sup>(5) 223</sup>，然而这仅为两个时间点，并未构成贯穿全篇起迄完整的时间线索。王粲《登楼赋》以“登兹楼以四望”、“览斯宇之所处”的空间观照开头，只在赋的最后部分有“白日忽其将匿”、“夜参半而不寐”的时间指示<sup>(5) 162~163</sup>，时间同样是点而非线。纪行类的赋，除了在开始提到征程的起止外，全篇多未按时间推延展开，如班彪《北征赋》用“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sup>(5) 142</sup>，班昭《东征赋》用“时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乃举趾而升舆兮，夕予宿乎偃师”<sup>(5) 144</sup>，皆用一两联完成“朝”与“夕”的时间介绍，接下来便是对途中经历的城池、山川的逐一铺写，仍然采用的是“前后左右广言之”的方式。曹植《洛神赋》最具时间顺序色彩，不仅其序中提及“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而且赋中以“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开始，以“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而结束，但其“于是洛灵感焉”、“于是屏翳收风”、“于是背下陵高”的句式，仍注重铺陈排比<sup>(5) 271</sup>。总体来说，在欧阳修之前，以时间顺序为构思线索的赋作数量很少，且无典型性。主导赋坛的构思之法，始终无法挣脱“赋者铺也”的空间藩篱。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秋声赋》在奠定宋代文赋诸多特征的同时，完成了赋作由空间铺排向时间顺叙的转换，秋声、秋意、秋情的渲染铺陈，皆由时间之轴统率，前后转换，首尾呼应。这成为后来宋代文人作赋的范式之一。不仅如李纲的《秋色赋》、张侃的《夏喜雨赋》公然声明仿《秋声赋》而作，而且如周紫芝的《听夜雨赋》“有声飒然起于寒蕉”、“始霏微以成滴，旋淅沥而惊飘”，王柏的《喜雨赋》“初淅沥而萃藜，忽砰湃而奔腾”皆类似《秋声赋》的描写<sup>(6)</sup>。

苏轼的《赤壁赋》《后赤壁赋》两篇文赋代表作，以时间为线的行文特点体现得更为鲜明。《赤壁赋》篇首点明游览赤壁的具体时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

壁之下。”接着写明月初升的情景，“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最后点出游玩结束的具体时间，“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sup>(7) 27~29</sup> 全赋按照一条“日暮——月升——夜半——破晓”的时间线索来组织结构。《后赤壁赋》同样是这种时间书写套路，以“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起，开头点明日期，具体则为“霜露既降”、“仰见明月”的初夜时分，然后以“归而谋诸妇”、“复游于赤壁之下”、“反而登舟，放乎中流”等一连串的动作表述，暗示时间的持续推进。此后是“时夜将半，四顾寂寥”。赋末则表明已是翌日清晨，“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sup>(7) 39~40</sup>。赋文潜行着一条“初夜——夜半——翌日清晨”的时间链条。其实，苏轼《黠鼠赋》也隐含一条时间之线，此线由“苏子”与“童子”先后互动而形成，始言“苏子夜坐，有鼠方啮”，然后“使童子烛之”，接下来分别是“童子惊曰”、“苏子叹曰”，又“坐而假寐”，最后是“俯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怍”<sup>(7) 44~45</sup>，与《秋声赋》中“欧阳子”与“童子”的互动异曲同工。

随着欧阳修、苏轼相继主盟文坛，这种以时间顺序为线统率空间铺叙的书写方式，在宋代逐渐流布开来。苏轼曾作《飓风赋》<sup>(8) 450</sup>，行文沿袭其父，如赋中对飓风经过情形的描写，贯穿其中的仍是以时间顺序为线索的行文方法。文中从“仲秋之夕”，飓风渐起写起，再到飓风先驱之时，“语未卒，庭户肃然，槁叶簌簌”，进而是飓风强盛之时，“少焉，排户破牖，殒瓦擗屋”，最后写到“盖三日而后息”，飓风结束后“湛天宇之苍苍，流孤月之荧荧”。谢逸《雪后折梅赋》<sup>(9) 1</sup> 从“耿夜阑之青灯”开头，按时间先后叙写“徐披衣而启户”、“携纤枝而入室”、“起取酒而自温”、“径就醉而曲肱”环环相接的行为，最后以“晓援毫以陈辞”结束。

时间顺叙的书写方式，在杨万里的文赋中使用更广泛，如《秋暑赋》由秋暑写到秋凉，除了“丁亥八月，秋暑特甚”<sup>(10) 2264~2265</sup> 的时间节点，文中更按时间先后一气写下，从白天的秋阳开始，依次推移到夜晚的暑气难耐，夜

半的风雨骤至，进而引起个人的感触。又如《木犀花赋》<sup>(10) 2267~2268</sup> 开篇即点明时间，“秋气已末，秋日已夕”，接着写主客欲别，新月初升，“偶云物之净尽，吐霁月之半璧”，然后描写在香气牵引下，进入空灵的月宫世界。而醒来之时，“月尚未午，客亦未去”。其《雪巢赋》<sup>(10) 2280~2281</sup> 由“夜半风作，顿撼林薄”开始，到“夙兴而视之，但见千山一缟，群山失碧”<sup>(10) 2281</sup> 结束；《梅花赋》<sup>(10) 2283~2284</sup> 由“绍熙四祀，维仲之冬”开始，“旦而视之，乃吾新植之小梅，逢雪月而夜开”结束，莫不贯穿着明显的时间顺序。

虽然从数量来看，以时间为书写线索的文赋在整个宋代赋坛所占比例不算大<sup>(11)</sup>，然而，就《秋声赋》、前后《赤壁赋》所隐含的内在结构而言，却对宋代文赋的发展影响深远。即使是在那些并无明显时间线索的文赋里，我们仍然能体会到一种线性流动的时间意识。

## 二、从列锦之喻到流水之喻

从两汉到宋前，与空间铺排相对应传统赋论，除了《西京杂记》里关于“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的概括外，其他如《文心雕龙·诠赋》<sup>(12) 134</sup> 定义：“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同书《时序》<sup>(12) 674</sup> 也说：“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与“列”字的含义相同，“铺”“摛”“横”几个动词都是陈列广布之义，是指一种空间排列铺陈的状态。

若扩大到宋前的普通文章学的观念，也有诸多类似的地方。“列锦”之类的比喻常见于一般诗文的评论中，如《世说新语·文学》<sup>(13) 143</sup> 称：“潘（岳）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南史·颜延之传》<sup>(14) 881</sup> 称其诗：“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宋书·傅隆传》<sup>(15) 1551</sup> 亦称：“摛文列锦，焕烂可观。”文章的本质是华丽辞藻的展开陈列，无论是指事造形，还是穷情写物，大都强调其具有空间意味的并置铺展。换言之，列锦之喻对应的是“摛文”的创作理念，即将文采铺陈到作品的平面上，如同锦绣或绘画制品。而赋作则是这种“摛文”观念最典型最突出的体现。

而到了宋代，赋论以及普通文章学虽然还为传统的“列锦”之喻保留着一席之地，但已逐渐让位于苏轼力倡的“流水”之喻。苏轼在《答谢民师推官书》<sup>(7) 5292</sup>中有一段名言：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提到的文体是“诗赋杂文”，因此这段话也可看做苏轼的赋论。在这里，“铺锦列绣”之喻为“行云流水”之喻所取代。我们知道，“行云流水”尤其是“流水”，历来是中国古代关于时间移动性的隐喻，自孔子面对川流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后，流水便成为“移动的时间”概念最生动的展示。正如苏轼自己在《别岁》诗中所说：“人行犹可复，岁行那可追？问岁安所之，远在天一涯。已逐东流水，赴海无归时。”<sup>(16) 263</sup>“行”与“流”是时间这一概念最本质的特征，苏轼却将它用来形容诗赋杂文的书写，这意味着苏轼把诗赋的写作，看做是一次时间的移动过程，是一次思想意识和文字笔墨旅行的过程。

苏轼在《自评文》<sup>(7) 7422</sup>中表达了相似的见解：“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这里强调的是文章“滔滔汩汩”的涌动过程，“一日千里”的推移过程，以及线性的“随物赋形”的旅行过程。因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排除那些纯粹以时间为书写线索的文赋，我们仍然能从其他体物写景、抒情说理如“行云流水”一般的文赋中发现时间顺叙的影子。

“流水”之喻还见于苏轼其他讨论诗赋的文章，如其《答张文潜县丞书》<sup>(7) 5322</sup>：

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愤慨者。

“汪洋澹泊”自然是水的流动形态，“一唱

三叹之声”亦强调音乐性时间艺术的特征，而内在“秀杰之气”的外露，也有行云流水一般的风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谈及的苏辙所作《黄楼赋》<sup>(17) 417~421</sup>，正具备典型的以时间为线索的书写构架，开篇是“子瞻与客游于黄楼之上”，收束是“于是众客释然而笑，颓然而就醉，河倾月堕，携扶而出”。《黄楼赋》作于《赤壁赋》之前，甚至可以说，《赤壁赋》的结构乃在《黄楼赋》基础上仿拟推衍而成。可见，“流水”之喻的确与宋代文赋书写的时间性相关。

更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关于“汪洋澹泊”之喻以及对《黄楼赋》的推崇，是在与张耒（文潜）的书信中提及的。作为苏轼的学生，张耒无疑受到这种观念的启发和影响。在今存张耒的作品中，以时间为线索的赋所占比例相当高，如其《秋风赋》开篇即言：“张子夕坐于堂之南轩，有风飒然来自西方，感乎人心，异于寻常。”点明人物、时间、地点，与《秋声赋》<sup>(18) 24</sup>开头完全一致。既而用“吾尝中夜而听之，淅沥飕飗”，“旦起而望之”等句领起行文安排，构成一条“黄昏——半夜——天明”的时间线索。其他如《卯饮赋》《鸡鸣赋》《燔薪赋》《鸣蛙赋》大体如此结构。张耒认为：“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sup>(18) 755</sup>虽然这是论词，其实也可看做他的赋论，与苏轼论文“不择地皆可出”的写作态度一脉相承。

苏轼在《答李方叔书》<sup>(7) 5336</sup>中也讨论到古赋的写作问题：

惠示古赋近诗，词气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伤冗，后当稍收敛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当极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见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这里分别使用了“川之方增”、“霜降水落”两个自然意象与李方叔讨论赋文创作，可以看到苏轼将赋的行文变化比为河流的自然涨枯。所谓“伤冗”，是指李方叔古赋铺张扬厉稍显过分。李方叔《济南集》卷五中的几篇赋，极少有《秋声赋》《赤壁赋》类型的文赋，恐怕正是苏轼期待李方叔赋“霜降水落”的原因之所在。

我们注意到，宋代更多的文赋中的时间性表现为一种“文脉”，而“文脉”的背后是思维的“意脉”，这“意脉”就是宋人文章“理得而辞顺”的要求<sup>(19) 1972</sup>。惠洪称赞苏轼说：

“以其理通，故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而成文，盖非语言文字也，皆理故也。”<sup>(20) 29</sup>文脉的通顺如水流的涣然漫衍。无独有偶，苏辙也同样提到理路与文脉的关系问题，宋释晓莹《云卧纪谈》<sup>(21) 10010</sup>卷上记载韩驹跟从苏辙学作文之事：

公（韩驹）因话次，谓少从苏黄门问作文之法，黄门告以熟读《楞严》《圆觉》等经，则自然词旨而理达。东坡家兄谪居黄州，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

同样是流水之喻，无论是涣然漫衍，还是浩然无涯，皆是词旨而理达的形象说明。之所以词旨而理达，不正因为赋文是依时间的先后链条来构架说理的逻辑吗？由此可见，所谓“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乃是以“理”之逻辑来统率文词的移动与否。

与“列锦”之喻、“流水”之喻相对应，是两种赋论（文章论）指导下的书写方式。“列锦”对应着一种“摛文”的方式，重在“摛”

（铺、敷、布、列、陈、横），追求辞藻的堆砌，物象的罗列，事典的铺陈，以“前后左右广言之”的空间平面展开的形式为其主要审美特征。如前述司马相如《子虚赋》赋云梦泽，依次铺排其中的山、土、石蕴藏，东部的奇花异草，南部的高低平原物产，西部清泉水产，北部山林中花草禽兽。按上、下、东、西、南、北的次序描写，井然有序，体现出一种明显的空间方位意识。同样在《上林赋》中，作者先从介绍上林苑的方位开始，“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然后对其中的鱼禽、山木、野兽、离宫别馆、花果等一一展开铺排。正是得益于这种铺排，规制宏大的云梦泽和上林苑空间形象位置历历可见。

“流水”则对应着一种“行文”的方式，重在“行”，追求语言的畅达，说理的通透，以“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的时间线性移动的形式为其主要审美特征。如苏轼《赤壁赋》

论水月一段，从逝者如斯、盈虚者如彼的现象，到自其变者而观之、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的立场，又由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感悟出造物者之无尽藏，吾与子之所共适的感受。文理转折推进，情感由悲而喜。又如《黠鼠赋》由啮鼠、死鼠、走鼠之狡黠，人的惊、叹、念等情绪变化，揭示出“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之哲理。正如明陈天定评价说：“许大名理，说来如此透脱，前后点染，历历落落。”<sup>(7) 46</sup>这就是所谓“以文为赋”，无论是叙事、抒情还是说理，皆处于一种“前后点染”的行文轨迹之中。

### 三、从工艺之辞到自然之意

当古人把赋喻为列锦之时，不仅意味着空间的铺排，还特指一种工艺品的空间铺排。当今有学者从“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的赋论入手，特别探讨了汉赋的图案化倾向。<sup>(22) 250~271</sup>其实不仅是汉赋，后来南北朝的骈赋乃至唐宋科举考试的律赋，莫不追求一种图案之美：“如组织之品朱紫，绘画之著玄黄”、“写物图貌，蔚以雕画”<sup>(12) 136</sup>，包括辞藻的华丽、描写的繁复、布局的严谨、句式的排偶对称等等。

传统赋论常将赋文比作二维空间的锦绣、绘画或三维空间的雕刻、制器、建筑。我们曾指出：两汉以来的文章学一直把“雕刻”作为其写作态度，把“绮丽”作为其中心风格<sup>(23) 57~64</sup>。这在赋学方面表现得尤为充分。汉赋的基本写作模式和过程是：第一，先确定赋作的一经一纬，如织锦布置好纵横丝线，如绘画勾勒出大致轮廓，如雕刻准备好粗略模具，如玉器确定好大体造型，如建筑构建好基本框架。第二，接着按空间位置敷陈辞藻，如织锦之编排彩丝、绘画之填充颜色、浮雕之刻画图案、玉器之琢磨花纹、建筑之装饰藻绘。第三，尽可能驰骋才艺，夸饰雕琢，敷广漫衍，所谓“腴辞云构，夸丽风骇”<sup>(12) 254</sup>，同时精心结撰，如工匠之篆刻研磨。所谓“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sup>(12) 294</sup>，广为人所称道，正可说明赋的创作乃是一件复杂的工艺品的“研”（玉石）和“练”（锦绣）的过程。

由晋至唐数百年，以工艺为赋的观念一直统治着赋坛，支配着赋论的话语权。唐人李百药在《北齐书·文学传序》中论述屈原、宋玉、司马相如、扬雄之后的辞赋发展历程，使用了

“振鶡鹭之羽仪，纵雕龙之符采”的带雕刻工艺的比喻<sup>(24) 601</sup>。令狐德棻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的评论大致相似，称贾谊“词赋之作，实为其冠”，其创作方式为“陶铸性灵，组织风雅”（陶铸指制器皿，组织指织锦绣）；称二司马、王褒、扬雄之作为“扬葩振藻”（葩藻指彩绘）；称班固、傅毅、张衡、蔡邕作赋“尤好虫篆”（虫篆指雕刻）；称曹植、王粲、陈琳、阮瑀“挺栋干于邓林”（栋干指建筑）；称潘岳、陆机、张华、左思“饰羽仪于凤穴”（羽仪指仪仗装饰）<sup>(25) 743</sup>。凡此种种，无一不以工艺制作用语形容赋的创作。

工艺制作的审美要求是“巧”与“奇”，赋文的审美追求也在于此。所谓“巧”，是指“体物形似”，即绘声绘色、状形状味地描绘客观物象。从魏晋到宋初，“赋体物”代表了文人对赋文创作的总体认知，皇甫谧在《三都赋序》<sup>(5) 641</sup>中强调赋“因物造端，敷弘体理”，认为赋的写作由体物而肇始。陆机《文赋》<sup>(26) 99</sup>更提出“赋体物而浏亮”之说。后世文人大体接受了这一观点，如唐人白居易《赋赋》<sup>(27) 73</sup>认为：“雅音浏亮，必先体物以成章；逸思飘飘，不独登高而能赋。”宋初孙何《论诗赋取士》<sup>(28) 205</sup>亦称：“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显然，“体物”作为赋最基本的文体特征已得到公认。与“体物”相应的是，从魏晋开始，“形似”成了评判赋文的审美标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sup>(29) 1778</sup>：“相如巧为形似之言。”即指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等赋中对园林物象的具体细致的描绘。

所谓“奇”，是指赋的语言特色，铺张扬厉，穷侈极妙。《汉书·艺文志·诗赋略》<sup>(30) 1756</sup>批评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竞为侈丽宏衍之辞，没其风谕之义”。汉赋多用奇字僻字，“诡异者，字体瑰怪者也”；又好用同一偏旁的字，联袂而下，“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sup>(12) 624</sup>。字体瑰怪，是为了获得造型诡异惊奇的视觉效果；半字同文，则是为了获得空间连绵铺衍的视觉效果。司马相如、扬雄、

班固都是小学家，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知识技能以及兴趣癖好，赋的“铺采摛文”的性质，正好给他们提供了利用奇文怪字填充敷衍赋篇空间的英雄用武之地。

从北宋中叶开始，辞赋中这种崇尚奇巧的工艺审美观，逐渐受到欧阳修、苏轼等人文学者中自然审美观的挑战。而这种自然审美观恰巧与流水之喻的几个关键词相关。这几个关键词分别是“涣”“涌”“溢”“浩”等等。

“涣”，水盛貌。“涣”之喻见于苏洵的《仲兄字文甫说》，在描述风与水相遭所形成的种种奇异景象之后，他借用《周易》“风行水上涣”之说，表达了自己对极品文章本体的理解：“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颇有意味的是，他特意将“天下之至文”与工艺品性质的文章区别开来：“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sup>(31) 412~413</sup>认为只有“无意”“不期”“无营”的书写态度，才能获得涣涣如水波的最美文章。此种观念用于赋的创作，便是以“风行水上”之赋取代“刻镂组绣”之赋。

“涌”，水往上冒，喻不由自主的创作冲动。欧阳修《送徐无党南归序》，在批评“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的写作态度之后，特意赞美徐无党“其文辞日进，如水涌而山出”的创作状态<sup>(4) 632</sup>。这也就是苏轼所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宋人黄彻评苏轼《浊醪有妙理赋》为“万斛汹涌，不暇检点”<sup>(33) 129</sup>，正是指出其哲思妙理滔滔汨汨随笔端涌出的特点。

“溢”，指水满而外流，喻内心修养充实，不得已通过文辞而表达出来。据《邵氏闻见后录》<sup>(33) 110</sup>记载：

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邪！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

苏轼认为晁载之的《闵吾庐赋》过于追求语言奇丽，违背了自然平和的为文原则。而赋中之“奇”当是作家修养达到“至足”的高度，作赋时不得已“溢为奇怪”。

“浩”，也是水盛大貌，喻文章立意广大，内容充实，文辞丰富，气势磅礴。如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sup>(4) 664</sup>，称其文“浩乎若千万言之多”，“辞丰意雄，需然有不可御之势”。其文之“浩乎需然”，来自内心的修养，“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有此修养，作赋自然会超越前人，而无蹈袭之弊。洪迈评苏轼《后杞菊赋》，批评了自屈原、司马相如以来赋作“蹈袭一律”的现象，高度称赞苏赋“如飞龙抟鹏，骞翔扶摇于烟霄九万里之外，不可搏诘，岂区区巢林翫羽者所能窥探其涯涘哉”<sup>(34) 912</sup>。而“无涯涘”也是水流浩渺漫衍的另一种比喻。

在宋代的赋论里，崇尚奇巧的工艺之赋，常常作为善为文章的反面教材而出现。扬雄之赋文，不仅被苏轼视为“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陋之说”，“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sup>(7) 5292</sup>，而且遭到陈师道的类似指责：

杨子云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词艰，善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搏物激，然后尽天下之变。子云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30) 309

与“思苦而词艰”的好奇之文相对照的，正是如江河流水一般“尽天下之变”的自然之文。因事触发，顺意脉之流而下，由此而形成“触山赴谷，风搏物激”的自然之奇。

宋人赋论中“流水”之喻的流行，其本质是欲以表意说理取代铺采摛文成为赋的主要追求。换言之，是要用具有实用性的赋文尽可能代替纯粹修辞性的赋文。欧阳修读了其友梅尧臣、谢绛所作立意截然相反的《红鸚鹉赋》后，“知世之贤愚出处，各有理也”，由此而再作《红鸚鹉赋》<sup>(4) 834</sup>以尽其理。晁补之评论苏轼《屈原庙赋》时，引用苏轼之说：“古为文譬造室，赋之于文，譬丹刻其楹桷也，无之，不害于为室。”并评论说：“故公之文常以用为主，赋亦不皆放（仿）《离骚》。”<sup>(36) 8</sup>显然，苏轼之赋把表意说理之实用性视为主要目标，而不在乎其“丹刻楹桷”的装饰性。所谓“文赋”这种

新兴赋体，正是在“流水”之喻赋论影响下的产物。后人批评宋代文赋“尚理而失于辞”<sup>(37) 2073</sup>，批评《秋声赋》《赤壁赋》是“一片之文但押几个韵尔”<sup>(38) 818</sup>，皆是因为其偏离了古赋“铺采摛文”之尚辞传统。

从“列锦”到“流水”，赋论话语的改变意味着一种艺术观念的改变。这是散体古文在北宋中叶以后全面复兴的结果。我们知道，古文是远较骈文更强调文气意脉的文体，因而常采用富于时间性的叙述方式。而这种时间顺叙的书写方式对赋体的渗入，无疑赋予了宋代文赋一种自由无碍的行云流水之气，迎合了宋人平和自然的审美趣味。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宋代文赋完全放弃了空间铺排，只不过空间铺排更多地被时间性叙写以及表达性说理所串接，成为顺流而下沿途所见的一重重风景，而非繁复堆砌的、铺张夸饰的一幅幅图案。伴随着空间铺排的淡化，时间叙写的强化，赋之所以成为赋的“纂组锦绣”的工艺特色，逐渐被文之所以成为文的“气盛言宜”的行文特征所冲淡、所淹没。由此，宋人之赋的“赋性”日减而“文性”日增，由“以文为赋”而最终趋近于“有韵之文”，这既是赋体的一次创造性革新，但也付出了“赋者铺也”基本文体特征逐渐消解的代价。

### 注释

[1]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按：据周勋初考证此段赋论当为魏晋赋家的创作理论总结，见《司马相如赋论质疑》，《文史哲》，1990年第5期，第20~25页。)

[2]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齐鲁书社1992年版。

[3]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

[4] (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

[5]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

[6] (宋)李纲《秋色赋》，《梁谿集》卷二，《四库全书》本，第3~6页。(宋)张侃《喜夏雨赋》，《张氏拙轩集》卷五，《四库全书》本，第5~6页。(宋)周紫芝《听夜雨赋》，《太仓稊米集》卷四一，《四库全

书》本，第11~12页。（宋）王柏《喜雨赋》，《鲁斋集》卷一，《四库全书》本，第5~7页。

[7]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8] （宋）苏过《斜川集》卷七，巴蜀书社1996年版。

[9] （宋）谢逸《溪堂集》卷一，《四库全书》本。

[10] （宋）杨万里《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

[11] 当前学界关于宋代文赋的数量统计多有分歧，有学者统计有近百篇，而亦有学者统计近两百篇。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宋代以时间为书写线索的文赋约有三十三篇，所占比例相当可观。如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后赤壁赋》《黠鼠赋》、苏辙《黄楼赋》、苏过《飓风赋》、张耒《卯饮赋》《鸡鸣赋》《燔薪赋》《鸣蛙赋》《秋风赋》、李之仪《梦游览辉亭赋》、谢逸《雪后折梅赋》、李复《竹声赋》、慕容彦达《岩竹赋》、李纲《秋色赋》、陈与义《放鱼赋》、郑刚中《秋雨赋》、周紫芝《听夜雨赋》、范成大《问天医赋》、杨万里《浯溪赋》《月晕赋》《木犀花赋》《放促织赋》《雪巢赋》《梅花赋》、陈造《听雨赋》、张栻《后杞菊赋》、程珌《钓台赋》、真德秀《鱼计亭后赋》、张侃《喜夏雨赋》、姚勉《梅花赋》、王柏《喜雨赋》。

[12]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3] （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

[14] （唐）李延寿《南史》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

[15] （梁）沈约《宋书》卷五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

[16]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7] （宋）苏辙《栾城集》卷第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8] （宋）张耒《张耒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

[19] （宋）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0] （宋）惠洪《跋东坡仇池录》，《石门文字禅》卷二七，《四部丛刊》本。

[21] （宋）释晓莹《云卧纪谈》卷上，《正续藏

经》第148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2] 万光治《汉赋通论》，巴蜀书社1989年版。

[23] 周裕锴《从工艺的文章到自然的文章》，《文学遗产》，2014年第1期。

[24] （唐）李百药《北齐书》卷四五，中华书局2001年版。

[25] （唐）令狐德棻《周书》卷四一，中华书局2001年版。

[26] （晋）陆机撰、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27] （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

[28] （宋）孙何《论诗赋取士》，《全宋文》卷一八六，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29]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六七，中华书局1974年版。

[30]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2001年版。

[31] （宋）苏洵撰，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2] （宋）黄彻《碧溪诗话》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33] （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

[34] （宋）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七“东坡不随人后”条，中华书局2005年版。

[35] （宋）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36] （宋）郎晔编《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屈原庙赋》注引晁补之语，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

[37] （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8] （元）祝尧《古赋辨体》卷八，《四库全书》本。

周裕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王朋，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代文学2012级博士生。

# 论苏轼词对现实悲剧性的审美超越

冷成金

**内容提要** 现实悲剧性是人的生命感知，是人的存在方式，它不会消失，也不会被克服，但它可以被转化为价值形态，进行审美超越。在这方面，苏轼词表现为以诗酒生活进行审美超越，对历史悲剧意识的审美超越，对宇宙自然的审美超越和以心灵解脱的方式进行审美超越；苏轼的这些词在更高的境界上观照现实悲剧性，对于不断提升现实悲剧性的品格，培养人性心理和塑造人格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苏轼词 悲剧性 审美超越

在中国主流文化中，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是价值建构的原初动力。人的动物性的生本能是人要“活着”的生物性基础，人要“活着”是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相互融合的不依赖于外在事物的内在亲证。人依据来源于历史实践的对人类总体存在与发展负责的人类总体意识进行“人能弘道”式的自证，这种自证是对人要“活着”的正向思考；悲剧意识的兴起是对人“活着”的反向思考，即通过追问和检讨从反面确认必须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并保证这种价值不会因缺乏这一反思维度而滑落。因此，中国主流文化中的悲剧意识来源于人生有限性和人要“活着”的无限追求之间的矛盾，用晏殊的词讲就是“人生有限情无限”（《踏莎行·绿树归莺》）的矛盾。这种悲剧意识在本质上属于价值悲剧意识，由于其来自人的生命根底处，也可称为生命悲剧意识。

现实悲剧性是对人的生命有限性的不断提示，更是对人的社会能力有限性的不断展示。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现实悲剧性是人的生命感知，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成为人的重要根据，是上述悲剧

意识的客观形态。由于现实悲剧性是人的存在方式，与人同生同在，所以它不会消失，也不会被克服。但它可以被转化，即以人类总体意识为依据来认同这种悲剧性，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价值形态，这就是审美超越。人的悲剧意识是人对现实悲剧性的把握，这种把握的不同精神指向就是悲剧精神。在众多的精神指向中，思考追索、奋斗抗争、默认消解、妥协屈服和审美超越是其主要类型。审美超越的功能在于培养人性心理，塑造人格，在更高的境界上观照现实悲剧性，不断改造现实和提升现实悲剧性的品格。<sup>[1][24-25]</sup>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和运行机制，也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历史合理性之一。在对现实悲剧性的审美超越上，苏轼的词体现得十分典型。

## 一、以诗酒生活进行审美超越

在宋词——尤其在北宋前期以及中期词中——对现实悲剧性的默认与消解表现得十分突出，这与唐人的悲剧意识显示出很大的不同。如晏殊的《浣溪沙》：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第一句就是对人生的悲剧真相极其鲜明而有力的提撕。“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分别是古人的常态，但是因为有了第一句的观照，第二句的“等闲离别易销魂”就不是一般的多愁善感了，而是上升到了悲剧意识的层面，但对待这种悲剧意识的态度却是“酒筵歌席莫辞频”。下阙面对无可奈何的“满目山河”和“落花风雨”，采取的态度更是“不如怜取眼前人”的质实的现实选择。

应该说，宋人对于现实悲剧真相和对生活情境的细腻体会，比任何时代都不差，但采取的态度往往是沉溺在现实的享乐中进行消解，缺少明确的价值追询的指向。晏殊这样的词还有不少，如说《谒金门》（秋露坠）中有“莫辞终夕醉”，《清平乐》（秋光向晚）中有“人生不饮何为”等。在这方面，宋祁的《玉楼春》也很典型：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  
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浮生”二字表现的是词人缺乏价值与意义的生存状态，是对人生悲剧真相的默认，而“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执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则是对这种悲剧真相的消解。另外，像晏殊的《浣溪沙》（小阁重帘有燕过）、晏殊的《踏莎行》（小径红稀）、欧阳修的《玉楼春》（酒美春浓花世界）、《浣溪沙》（青杏园林煮酒香）、张先的《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等词也从抒写“闲愁”的角度表现了上述的特点。

我们把这种对现实悲剧性的把握称作宋词的悲情意识。悲剧意识和悲情意识的区别在于，悲剧意识更注重以理性去撕开人生的悲剧真相，进行价值追询，悲情意识则更注重对悲剧真相的默认和消解，较少理性思考和价值追询。但悲情意识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遍状态，这些丰富细腻的感情，能够将悲剧意识中的理性因素融化到感性中去，那些指向升华的悲情意识，往往以即感性而又超感性的方式积淀入人的心理结构中，而这种心理结构又是促生悲剧意识的感性基础：悲情意识越丰富，悲剧意识往往越强烈。因此，悲情意识不仅不和悲剧意识相矛盾，而且是悲剧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上述这个大的背景上，苏轼的词既表现出了丰富悲情意识，又体现出新的特色，即更多地指向价值建构。同样是选择现实生活来抵抗现实的悲剧性，苏轼词导向的不是默认与消解，而是转化为价值形态。如《望江南》<sup>[2]164</sup>：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上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惜春或伤春，而是经春天情景的引导，使人进入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思考，所以在下阙的开始便有了悲剧意识的鲜明提示——“酒醒却咨嗟”。“咨嗟”，是悲剧意识的兴起，也是对现实悲剧性的默认与感慨，但这种默认与感慨可以有不同的指向，一种是对现实悲剧性的消解，一种是在对现实悲剧性的体认中转化为价值形态，进行价值追询，即审美的超越。该词最后选择的现实生活方式是：“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这样的生活并非“酒筵歌席莫辞频”、“不如怜取眼前人”的及时行乐和得过且过，而是文人应有的本真生活，是对现实中不合理的生活方式、生活情景（如官场中虚伪、浮华的生活等）的否定，它有着明确的价值建构指向，所以我们称其为以诗酒生活来进行审美超越。

其实，以本真的诗酒生活来超越现实中的不合理因素，是中国的很多文艺作品中的一种模式。我们再来看苏轼著名的《满庭芳》<sup>[2]458</sup>词：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此词非常著名，《苏诗纪事》（卷上）记载：“东坡《满庭芳》词，（东坡在世时）碑刻遍传海内，使竞进之徒读之可以解体，恬淡之徒读之可以娱生。达人之言，读之使人心怀畅然。”<sup>[3]19</sup>开篇引《庄子》中的典故，对人生为虚名微利而奔忙的悲剧性进行彻底的揭示；“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不是宿命论、命定论，而是境界的开启，即“我”依照既定的有价值有意义的合理准则去做“我”该做的事，而非依照世俗的、功利的、不合理的准则去做事；这是既定的准则，与现实宠辱得失、虚名浮利无关。“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这个“疏狂”不是狂妄，而是对现实某些不合理的生活方式的解构。

“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对世俗价值的否弃；一切都无需争辩，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情景是

最合理的：“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在自然、诗、酒与歌中建构起超越现实悲剧性的生命价值。

诗酒生活张扬的是本真的生命之情。苏轼的《哨遍·春词》<sup>[2] 590~591</sup>这样写道：

睡起画堂，银蒜押帘，珠幕云垂地。初雨歇，洗出碧罗天，正溶溶养花天气。一霎时，风迴芳草，荣光浮动，卷皱银塘水。方杏靥匀酥。花须吐绣，园林排比红翠。见乳燕捎蝶过繁枝。忽一线炉香逐游丝。昼永人间，独立斜阳，晚来情味。便乘兴携将佳丽。深入芳菲里。拨胡琴语，轻拢慢捻总伶俐。看紧约罗裙，急趣檀板，霓裳入破惊鸿起。颦月临眉，醉霞横脸，歌声悠扬云际。任满头红雨落花飞。渐鶗鴂楼西玉蟾低。尚徘徊、未尽欢意。君看今古悠悠，浮宦人间世。这些百岁，光阴几日，三万六千而已。醉乡路稳不妨行，但人生、要适情耳。

“但人生、要适情耳”，这里的“情”不是人的自然物欲之情，而是充分积淀了历史合理性的人性心理，是人应然的本真生命情感，是人应该追求的生存状态。“适情”，更是对僵固的封建政治意识形态的解构和对世俗价值的反抗。

## 二、对历史悲剧意识的审美超越

陈师道《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sup>[4] 309</sup>“世语云：

‘苏明允不能诗，欧阳永叔不能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sup>[4] 312</sup>这种观点在后世影响极大，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近世学者主要认为，陈师道站在尊体的立场，以非本色为缺点，进而否定苏词，但在某种意义上正道出了苏词的贡献。这样从体式的角度来理解苏轼“以诗为词”的意义当然是正确的，但实际上苏轼词与诗的联系不仅在体式上，更体现在内在神理上。

例如，对历史悲剧意识的超越是唐诗重要的精神指向，唐诗中的大量怀古诗、咏史诗都体现出这一特点。杜牧《悲吴王城》云：

二月春风江上来，水精波动碎楼台。

吴王宫殿柳含翠，苏小宅房花正开。解舞细腰何处往，能歌婉女逐谁回。千秋万古无消息，国作荒原人作灰。

《登乐游原》云：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

这些诗表现的是不合理历史状态的无价值无意义的彻底的历史悲剧意识，同时在深情感慨中又表现出对应有的本真历史的向往，以“向空而又”的方式导向了价值的建构。又如杜甫的《咏怀古迹》（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表现了对天道与人道疏离的质疑和深沉的历史悲剧意识，同时指向的是对历史合理性的建构。

苏轼的词可谓继承了唐诗的这种艺术精神。如《念奴娇·赤壁怀古》<sup>[2] 398</sup>：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面对万古流淌的浩浩长江，即便是风流人物也是渺小的，何况芸芸众生！既然无论百姓还是英雄都要被“淘尽”，人的价值与意义何在？开篇三句就毫不留情地撕开了人生的悲剧真相，将人抛到了价值的虚空之中。这是历史悲剧意识，也是价值悲剧意识。然而，在中国文化中，人生来是未必有价值的，却是必须有价值的，人就是在悲剧意识的兴起中依据人类总体意识追询价值和建立价值的。接下来对赤壁如画江山的描绘和对年少英雄周瑜的赞扬为价值的建立提供了情感基础和人格榜样：江山永恒而美好，人生也应该永恒而美好；周瑜风流倜傥而又“雄姿英发”，人生也当如此。最后五句有两层意思，前三句是说既然悟道人生本已如此，不必自作多情，徒生烦恼，只需要以本然的方式对待人生世事即可；最后两句是说人生本来就说不清楚，本来就短暂，唯有江月宇宙确定而永恒，向永恒的江月宇宙致敬，但不是向江月宇宙的融入与消

隐，而是效法江月宇宙的自然而建立起来自然而然的本真生活和价值观念。人生来未必是有价值的，这是价值之“空”，但却必须建立价值，这是价值之“有”，“向空而有”的价值建构保证是人类总体意识，即为了人类总体的存在与发展而积淀形成的历史合理性。苏轼此词开篇展示出最彻底的历史悲剧意识，对待这种现实悲剧性的态度，不是直接与其斗争，强行为历史规定“价值”；也不是默认，在颓废中生活；更不是妥协屈服，在悲伤中绝望，甚至投江自尽；而是对其进行审美超越，以这种悲剧意识为动力并将其转化为价值形态，在美好的宇宙自然的启示下和周瑜人格榜样的激发下建立具有合理性的价值观念和存在状态。该词在文化意蕴上深契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是其巨大艺术魅力的根源所在，也是诗词“向空而有”的价值建构模式的典型代表。

在苏轼词中，这样的词还有一些。如《永遇乐》<sup>[2]247</sup>：

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  
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  
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  
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该词作于元丰元年(1078)徐州任上，此年十月，据说苏轼曾经梦登燕子楼，次日便往寻其地，有感而作。上片追述梦中所见，极言燕子楼的清寂美好，使人如临其境；下片概述燕子楼旧事，多有人生无常之慨叹。过去多以为苏轼此词有一定的虚无情绪，实际上否定的是“旧欢新怨”的无谓的是非之争和非本真的人生价值，通过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为四处奔波的“天涯倦客”建立起应然的富有历史合理性的本真价值观念。这仍然是唐诗中的怀古诗、咏史诗对待历史悲剧意识的典型方法。

还有的是将两种价值观进行对比，如《满江红》<sup>[2]168</sup>：

东武南城，新堤固、涟漪初溢。  
隐隐遍、长林高阜，卧红堆碧。枝上残花吹尽也，与君更向江头觅。问向

前、犹有几多春？三之一。官里事，何时毕。风雨外，无多日。相将泛曲水，满城争出。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座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满山阴，空陈迹。

该词作于熙宁九年(1076)春，时苏轼在密州任上。词前有小序：“东武会流杯亭，上已日作。城南有陂，土色如丹。其下有堤，壅扶淇水入城。”时密州饥旱，苏轼率官民兴修水利，始有“相将泛曲水，满城争出”的乐境。词的下阙由春光易逝而联想到东晋王羲之等人的兰亭集会，由此兴起了浓郁的历史悲剧意识，但该词并未导向消沉，反而对“风雨外，无多日”的“官里事”进行了有力的消解，充满了对“新堤固、莲漪初溢。隐隐遍、长林高阜，卧红堆碧”民生事业和春日风光的热爱。

在更多的时候，历史悲剧意识往往与宇宙情怀相联系，如《行香子·过七里濑》<sup>[2]24</sup>：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虚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上片全写对宇宙自然的体认之情，过片以“重重似画，曲曲如屏”做出总结。这是一个在美好的情境中寻觅的过程，但宇宙情怀如果不经过历史悲剧意识的过滤就会显得浅薄和虚浮，所以接下来就自然转向人事——“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君臣相遇也终归是空名，经过这样的历史悲剧意识洗礼以后，苏轼眼前呈现的是“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这是人感悟之后又“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悟道”境界，是人的本真价值建立之后的境界。

### 三、对宇宙自然的审美超越

在中国诗词中，自然诗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历史阶段）：一是客体层次，即山水自然是独立于创作主体之外的审美对象，这些诗歌注重的是对山水自然的客观描摹，往往将自然美与人的道德情操相联系，将人的道德品性与自然事物的某种物性相比附，在使自然物的自然属性人

格化的同时，更使人在向自然的认同中获得道德、价值的感悟与支撑，在实质上是以比德的思维方式将山水自然看成是体道之物和媚道之形，从《诗经》到谢灵运、谢眺的诗都表现出这一特点；自然诗化的这一历史阶段与中国传统社会前期政治本体化的逐渐形成相适应，在自然诗化走向上属客体自然——描写自然之美——的层次。二是主体层次，即创作主体往往以自己的情感去改造审美对象的固有形态，使情、景相互生发，把山水自然当作心灵的象征，情感的符号，自然不再外在于人，而是与人融为一体，甚至使人沉入自然；在自然诗化的走向上，这一历史阶段与政治本体的历史合理性的全面释放相适应，体现的是对政治本体的最为充分的乐感，属于情意自然——情景相生——的层次，以初、盛唐时期的某些诗人——如王维、孟浩然、李白等——为突出代表。三是哲理层次，即对自然与自我进行双重超越，使其诗词意境超越现实，又在更高的层次上观照现实；这一自然诗化的历史阶段与政治本体消解，文化本体建立相适应，体现的是价值的追询与人格的建立，它属于哲理自然——以哲理的眼光审视自然的层次，以苏轼等人的诗词为代表。

上述的三个历史阶段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在渐进的发展中不断呈现出新的特点。所谓政治本体就是以现实政治为思考问题的基础和归宿，这种思考有明确的目的和答案，在其发展的高峰期可以激发出人的巨大的热情，但往往容易导向禁锢；文化本体是以文化追询为基础，容易导向价值的建构和思想解放，但难以找到最终的精神归宿，永远处于精神家园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宋诗还是宋词，都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对文化本体的追询。苏轼词通过对宇宙自然客观性的审美超越而克服其对人的限制性，使之成为发展人的手段。

在苏轼的词中，面对永恒的自然，往往不是惆怅与无奈，也不是向自然融入，而是对自然进行审美超越。如《少年游·润州作》<sup>[2]59</sup>：

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  
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恰似嫦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

该词中表现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唐

诗中的宇宙情怀明显不同。在中国人看来，人首先活在自然宇宙中，在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的基础上，中国人赋予中性的宇宙以积极温暖的情感；在天、地、人“三才”中，人既为天地“立心”，也为自己“立命”；人与宇宙自然共生共存，人类既不是宇宙自然的奴隶，也不是宇宙自然的主宰，而是以积极能动的态度“参赞化育”，化宇宙自然为情感，又以宇宙自然为精神归宿。我们把这种天人关系和对待宇宙自然的态度称为宇宙情怀，唐代《春江花月夜》等大量诗篇对其有充分的表现。如王绩的《秋夜喜遇王处士》：

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

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

前两句是由本真生活构成的历史与现实，后两句是宇宙情怀。没有前两句后面的宇宙情怀会显得虚浮，没有后两句前面的本真生活就没有归宿。该诗体现了本真生活与精神归宿的统一，因而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但细味苏轼的这首词，我们感受到的是人与自然在对话，人并不试图主宰自然，自然也并不为人提供归宿。“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飞雪仿佛是抒情主体布置的场景，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仿佛是对杨花的“客观”描写，又回到了《诗经》描写自然的时代。下阙尽显抒情主体与天地平等对话的气魄。在下阙的映照下，上阙的宇宙自然便“为我所用”，即把对自然的描绘变成了丰富和发展自我的方式和彰显人格的手段，自然不再道德化和“情怀”化。再如《行香子·丹阳寄述古》<sup>[2]45</sup>：

携手江村，梅雪飘裙，情何限、  
处处销魂。故人不见，旧曲重闻。向  
望湖楼，孤山寺，涌金门。寻常  
行处，题诗千首，绣罗衫、与拂红尘。  
别来相忆，知是何人？有湖中月，江  
边柳，陇头云。

苏轼在杭州时与杭州知州陈述古相处极好，此词为怀念二人的交往所作。下片追忆与友人同乐的情景，结尾并非要融入自然，而是情化入景、景化为情、景为情用、情景相互映射促生、情满天地，最终归于思念之情——人之情。

这种对自然的审美超越往往指向境界的打开。如《采桑子》<sup>[2]118</sup>：

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楼中，尊  
酒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停杯

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

词前小序云：“润州甘露寺多景楼，天下之殊景也。甲寅仲冬，余同孙巨源、王正仲参会于此。有胡琴者，姿色尤好，三公皆一时英秀，景之秀，妓之妙，真为希遇。饮阑，巨源请于余曰：‘残留晚照，非奇才不尽。’余作此词。”<sup>[2]118~119</sup>该词中的“斜照江天一抹红”与唐代许浑《谢亭送别》诗中的“满天风雨下西楼”相比，形式相同，但内容相反。许浑的“满天风雨下西楼”是借自然表现出知命而不乐天的郁闷情绪，该词表现的则是爱人以至于爱自然，爱人之爱已经无法表达了，以至于爱染江天。但这个爱不是爱生活的内容，而是爱生活的形式，因为上面“乐事回头一笑空”已经把生活的内容否定了，剩下的是爱生活的形式——生活自身应有的样式。由“一笑空”到“一抹红”，境界豁然打开。这个“空”不是“无”，而是“空而有”，“向空而有”是价值建构的方式，在该词中就是无论面对怎样的生活内容，都要建构应有的生活方式。由爱人爱生活而爱自然——爱自然的自然而然，不只是爱的延伸，更是爱的升华和心灵的彻底敞开。再如《虞美人》<sup>[2]67</sup>：

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须千里。  
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尊前醉倒，且徘徊。  
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  
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结尾是对人的心灵的洗礼，也是精神境界的体现。又如《南歌子》<sup>[2]367</sup>：

雨暗初疑夜，风回忽报晴，淡云  
斜照著山明。细草软沙溪路，马蹄轻。

卯酒醒还困，仙村梦不成，蓝桥  
何处觅云英。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

这是在自然中得到了净化。抒情主人公不再去寻找仙村、云英，“多情流水、伴人行”是一种释然，一种解脱，是借自然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在艺术上，这种对自然的审美超越往往与“韵”相关联，如《江城子》<sup>[2]31</sup>：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  
明。一朵芙蓉、开过尚盈盈。何处飞  
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  
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  
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  
取，人不见，数峰青。

写弹筝而不见弹筝人，只以闻筝所见与想像衬托之，实为烘云托月之范例，韵味绵长，思之不尽。此烘托手法，至宋代而大行，比之《湘夫人》、《洛神赋》等先秦汉唐之实写，其手法已大有不同。唐诗之“境”，主要来自对政治本体的实实在在的体认，无论怎样想象与夸张，都还是现实之“境”；宋词之“韵”，主要来自对文化本体的追询，这种追询已超越了现实之“境”，指向的是价值的遐思和情感的远扬。再如《念奴娇·中秋》<sup>[2]426</sup>：

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  
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  
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  
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我醉  
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  
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  
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  
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该词上片写月宫景象，笼罩着美丽的神话色彩，一片空明澄澈；下片回到人间的生活，直接表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诉求。在这个意义上，“韵”导向的是对人性情感的培养。

苏轼词的上面这些方面都是相互联系的。在苏轼词中，人的宇宙情怀离不开自然，但人又不机械地依靠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经过文化本体的追询——审美超越——后建立起来的情感体认关系。宇宙自然融入人的情感，为人所用，成为发展人、彰显人的媒介。苏轼“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苏轼《行香子》）<sup>[2]725</sup>以应有的本真之心对自我和自然进行了双重的审美超越。

#### 四、以心灵解脱的方式进行审美超越

心灵解脱是指人在思维和情感上都摆脱了现实功利乃至生存欲望的束缚和羁绊，只按照历史合理性的本然要求来思维和行动。这不仅是对一切现实功利的审美超越，甚至是对生命自身的审美超越，因此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这种审美超越方式是儒、释、道三家文化中的合理因素相互融合的结果，它在宋代文化——尤其是在苏轼的诗、词、文和人生方式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苏轼的《记游松风亭》<sup>[5]4~5</sup>这样写道：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  
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

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此间可以熟歇”并不是苏轼个人的随意选择，而是人类历史的最本真的要求；因为如果人人都按照自己的本分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不去做“非分之想”，人类就不会有纷争和战乱，也就不会有“进则死敌，退则死法”的两难处境，人类就会处于“云在青天水在瓶”的自然状态，就会进入和谐美好的大同世界。在这种顿悟中，有儒家对现实的执着，有道家对心灵自由的向往，也有佛家真如本体的追求；可以说，这是对一切外在束缚的耸然摇脱，是将历史的本真要求化作内在生命，是心灵的彻底解脱。这种心灵的解脱是传统士大夫人格的最高境界，也是对现实悲剧性的最彻底的审美超越；它不是宗教，但具有宗教性的精神指向，所以对于人格建构具有永恒的魅力，对于不合理的现实也具有永恒的批判和矫正力量。

关于此类论述，《东坡志林》中还有很多，如《儋耳夜书》：“已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sup>[5]15</sup>一切求诸内心，但又不离现实。再如《论修养帖寄子由》：“任性逍遙，隨緣放旷，但盡凡心，別無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語，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自有明，醫師只有除翳藥，何曾有求明藥？明若可求，即還是翳。”<sup>[5]18~9</sup>以佛解儒，儒、佛相融；“眼自有明”是本然的存在，尽心即得“胜解”，不假外求。

在苏轼的词中，这种心灵的解脱也体现得很充分。如《定风波》<sup>[2] 356</sup>：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前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

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这是一首心灵洗礼的赞歌，上片写雨中的表现，下片写雨中的感受，苏轼就是借这样一个契机来完成了一次对自己心灵的洗礼。中国诗人都讲究妙悟，苏轼就是在“雨具先去”的情况下，妙悟了人生之理。上片的结句“一蓑烟雨任平生”还是执着现实，不管外在的规则怎样，不管“我”的遭遇怎样，“我”都我行我素，按照应有的正确准则行事。这的确是苏轼人生的真实写照，苏轼一生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不唯势，只唯真、唯善、唯美，体现的是中国传统中真正的“文士道”精神。他一生的生命历程都说明了这点，用“一蓑烟雨任平生”来概括他的现实人格，最为恰切。但这还不是人生的最高层次，还没有达到人生的“天地境界”。人生的“天地境界”是指将天地运行的自然而然化为人生的自然而然的境界，即以人类总体观念为依据摒除了一切人为、杂念和私欲而与天地、人事的自然而然合一的境界，即“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也无风雨也无晴”，连上片的“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存在了，但这又不是“空”和“无”，而是不再执著于现实的“风雨”和“晴”，而是将人事的应然化为了生命的自然而然，无丝毫的思虑和情感的羁绊，纯任本心，却能符合自然与人事之道。这是心灵对与现实羁绊的解脱，是精神家园的建构，也是对现实进行审美超越的终极状态。在这里，儒家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道家的“至人”、“神人”、“圣人”（《庄子·逍遥游》）和佛家的“禅悟”冥然合一。

这种审美超越方式往往直接体现为对精神家园的寻找和建构。苏轼一生都要“归家”，但是终老未践。在他的词中，很多地方表现了对家园的渴望。如“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满庭芳》<sup>[2] 506</sup>）、“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醉落魄》<sup>[2] 58</sup>）、“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南乡子》<sup>[2] 90</sup>）、“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醉落魄》<sup>[2] 114</sup>）、“家何在，因君问我，归梦绕松杉”（《满庭芳》<sup>[2] 563</sup>）、“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蝶恋花》<sup>[2] 54</sup>）、“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醉落魄》<sup>[2] 123</sup>）、“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满庭芳》<sup>[2] 458</sup>）、“见说东园好，能消北客愁”（《南歌子》<sup>[2] 530</sup>）、“此心安处是菟裘”（《浣溪沙》<sup>[2] 478</sup>）等。

等。最著名的是《定风波》<sup>[2] 578</sup>:

谁美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  
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词作于“乌台诗案”之后，“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语借歌妓的口吻表达了苏轼的心声。后来苏轼被贬海南，历尽艰辛，不仅没有颓废，反而找到了精神的归宿。他在《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sup>[6] 2243~2244</sup>一诗中说：

九疑联绵属衡湘，苍梧独在天一方。  
孤城吹角烟树里，落日未落江苍茫。  
幽人拊枕坐叹息，我行忽至舜所藏。  
江边父老能说子，白须红颊如君长。  
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平生学道真意，岂与穷达俱存亡。  
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  
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本真的心灵就是苏轼的故乡，这与随遇而安的消极处世的态度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否弃外在价值观念，直接诉诸心理本体的审美的人生态度。

无论是“也无风雨也无晴”，还是“此心安处是吾乡”，都是否弃了外在的价值评判标准，离开了对现实中的“道”的依待，以“人能弘道”的姿态进行自证。“思我无所思”（《和陶移居二首并引》其二，《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九<sup>[6] 2191</sup>）是说生命的审美化，将自然、人事的应然之理内化为自己的生命情感，以这种情感来应对世事人生，万事不假思索，一任情感的自然，从而避免了滞涩与梗塞；“吾生本无待”（《迁居并引》<sup>[6] 2194</sup>），是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过程即目的，现象即本体，不为“理”生，不为“道”存，只依据应然之理进行生命实践，从而避免了禁锢与僵化。“思我无所思”是情，“吾生本无待”是理，这是中国文化中最为深刻的情理结构，并由此构成了最富合理性的心灵本体。这种心理本体基于人类总体观念，所以具有本体的性质；同时又以“人能弘道”的自证为其表现形式，所以具有心理的属性。以心理为本体不是无本体，而是将外在的本体内在化，使人真正处于完全开放的境域中，使人得到最彻底意义上的解放。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岭海时期的苏轼已经做到不预设自身的属性，从心而为，适物而发。“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

（《观棋》<sup>[6] 2310</sup>）在对现实束缚的解脱中实现了最深刻的审美超越。在悲剧精神上，唐诗更多地倾向于思考和抗争，而宋词更多地倾向默认、消解和审美超越；前者主要来自对政治本体的乐感，后者主要源于对文化本体的探询。苏轼词是宋词中审美超越悲剧精神的最重要的代表。这种审美超越基于对人生应然存在状态以及价值与意义的思考和探寻，通过对不同事物不同层次的审美超越，最终达到心灵解脱的最高境界，指向的是极富宗教魅力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现实人格。

### 注释

[1] 冷成金《论孔子的内在亲证价值建构思想》，《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2] 邹同庆、王宗棠《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

[3] 曾枣庄《苏词汇评》，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4] 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

[5] 王松龄《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1年版。

[6] 王文诰，孔凡礼《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冷成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

# 香雾空濛月转廊 ——苏东坡与香文化述论

陈才智

**内容提要** 在香文化史上，苏轼占有重要地位，他不仅用香品香，还制香合香，可说是香界少有的通才。如同对待书画一样，苏轼将香道视为滋养性灵之桥，不只享受香之芬芳，更以香正心养神；不仅将香道提升到立身修性、明德悟道的高度，同时将禅风引入品香和香席活动中，以咏香参禅论道，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

**关键词** 苏轼 香文化 述论

千古文人一东坡。苏轼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继陶渊明和白居易之后，最具典型性的文人性格的代表，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诗称宋冠，词开苏辛，文追韩柳，书首四家，画擅三绝，堪称神州千载才人之冠。拙文《千古文人一东坡——苏诗与北宋文化》曾就此略有评述，然尚未注意到在香文化史上，苏轼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故草此文，以补其不足。概而言之，苏轼不仅用香品香，还制香合香，可说是香界少有的通才。如同对待书画一样，苏轼将香道视为滋养性灵之桥，不只享受香之芬芳，更以香正心养神；不仅将香道提升到立身修性、明德悟道的高度，同时将禅风引入品香和香席活动中，以咏香参禅论道，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

元丰六年（1083），苏轼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受转运使蔡景繁的关照，在黄州城南江边驿站增修房屋三间，位于临皋亭旁，俯临长江，取名南堂。据《东坡志林》卷四云：“临皋亭下八十余步，便是大江。”<sup>(1) 127</sup>苏轼在《迁居临皋亭》诗中亦说：“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sup>(2)</sup>

<sup>1054</sup> 其《南堂》诗五首，从不同角度描绘南堂风光，最后一首写到：

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

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sup>(2) 1167</sup>

南堂四面临水，水天相接。夏日，在南堂扫地焚香静坐，安适自得，闭阁而昼眠。睡在细密的竹席上，竹席所织纹理光润，像水的波纹一样；纱帐轻细薄透，如烟如雾，犹如李白《乌夜啼》中“碧纱如烟隔窗语”那样，似云烟缭绕一般的轻软柔细。这种闭门焚香昼寝的境界，不同于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悠闲意境，而近似韦应物“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sup>(3) 55</sup>的高洁情怀，确实“可追踪唐贤”<sup>(4)</sup>，与苏轼《黄州安国寺记》所写“焚香默坐”的心曲是一致的。因客忽访，打破梦境，恍惚醒来，一时间恍惚不知身处何处。挂起帘子，只见窗外江浪连天。那种闲适，安静，与天地自然气息相接的生活状态，俱现于纸上。诗写得声情俱美，兴象自然，且意在象外。尤其结句，以景收束，挂起西窗，从阁内打通到阁外，拓出一派江浪连天的阔远境界。不仅表现了清静而壮美的自然环境，而且与诗人悠闲自得的感情相融合，呈现出一种清幽绝俗的意境美，确如前人所评“想见襟怀”。<sup>(5)</sup> 羲皇上人，亦不过如此。清汪师韩《苏轼诗评笺释》卷三评云：“境在耳目前，味出酸感外。”纪晓岚《纪评苏诗》卷二十二也认为：“此首兴象自然，不似前四首，有宋人極权之状。”<sup>(6) 967</sup>此诗写于贬谪时期，诗人仍能够焚香闭阁，酣然高卧，从容安闲，悠然自得，可见其真性情、真胸襟。

元祐元年（1086），苏轼有《和黄鲁直烧香二首》：

其一：

四句烧香偈子，随香遍满东南；  
不是闻思所及，且令鼻观先参。

其二：

万卷明窗小字，眼花只有斓斑；  
一炷烟消火冷，半生身老心闲。<sup>〔2〕 1477～1478</sup>

黄鲁直，即黄庭坚，苏门四学士之一，也是香学史重量级人物，笔者另有《尘里偷闲药方帖——黄庭坚与香文化之缘》专论之。以上两首咏烧香之诗，均为和黄庭坚之作。宋哲宗元丰八年（1085），黄庭坚以秘书省校书郎被召，与苏轼第一次在京相见。元祐元年（1086）春，黄庭坚作《有惠江南帐中香者戏赠二首》，赠给苏轼，其一云：“百炼香螺沉水，宝熏近出江南。一穟黄云绕几，深禅想对同参。”其二又云：“螺甲割昆仑耳，香材屑鵠鸽斑。欲雨鸣鸠日永，下帷睡鸭春闲。”<sup>〔7〕</sup>

诗从别人所赠送的帐中香谈起，分析帐中香的成分，焚香的时机、用何种香具，与香味等等。前一首首先以精心炮治的“香螺”（即螺甲或甲香），“沉水”（即沉香）开首，说明帐中香来自江南李主后宫，当时于江南一带，可见这种百炼而成的“宝熏”，然后以香飘的形态，来烘托诗中主角与同伴一起专注参禅的幽静、祥和、沉默的气氛。后一首开篇呼应前一首前两句，但换了一种描述方式，述及香材的外形，描写制香的原料上一点一点的斑纹，也就是对制香过程的细部观察。甲香（或螺甲）有如昆仑人（南海黑人）的耳朵形状，据吴时万震（220～280）《南州异物志》载：“甲香螺属也，大者如瓯，面前一边，直撝长数寸，围壳有刺。其厣可合，杂众香烧之，皆使益芳，独烧则臭。”甲香入香方中，有助于发烟、聚香不散之特点。不过，作为香药使用，需要经过繁复的修制程序。修制甲香，主要以蜜酒再三煮过、焙干，如此重复数次，方能使用。“香材屑鵠鸽斑”，说的是另一种鵠鸽斑香，为香中之绝佳者，系从沉水香、蓬莱香及笺香中所得，因其色斑如鵠鸽，故名。丁谓《天香传》即云：“鵠鸽斑，色驳杂如鵠鸽羽也。”<sup>〔8〕</sup>叶庭珪《名香谱》有鵠鸽斑香，谓其“出日南”。<sup>〔8〕</sup>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

香》亦云：“鵠鸽斑香，亦得之于海南沈水、蓬莱及绝好笺香中，槎牙轻松，色褐黑而有白斑点点，如鵠鸽臆上毛，气尤清婉似莲花。”<sup>〔9〕</sup>接着也是对前一首气氛的呼应，前一首说的是人自己置身宁静之境，后一首则用成天鸣叫的鸠、在帷幕下倘佯的鸭子（大概联想自女性闺房中常用鸭形香薰），呈现一幅闲适且平静不过的春日画面。

诗题既然称为“戏赠”，就考验苏轼的回应了，对此，苏轼分别依韵唱和，时亦在元祐元年（1086）。<sup>〔10〕 1653</sup>苏轼的两首和作，最突出的特点，是打通诗艺与香道，将《楞严经》的“鼻观”引入诗歌的评价，以“鼻根”品味黄鲁直的烧香诗偈。

第一首，称赞黄庭坚的诗偈如此美妙，已随江南帐中香的香气传遍东南，因此只能用鼻子来闻，才能感觉到其美其妙；这诗偈中的智慧，不是凭耳闻心思，便能企及，而是要靠嗅觉的观照才能参透。虽然苏轼是用戏谑的方式，提出从嗅觉的角度来观诗偈，但显然已经点透，“鼻观”既是最佳的品香境界，也是最高的品诗法。“四句烧香偈子”，指黄庭坚的二首原诗，偈：梵语“偈陀”（Gatha）的简称，即佛经中的唱颂词，通常以四句为一偈，故《金刚经》曰：偈，谓之四句偈。“闻思”，来自《楞严经》卷六观世音所云“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佛书还称观世音为闻思大士。宋陈敬《陈氏香谱》有配方略异的两种“闻思香”之香方，应取意于此。明周嘉胄则认为“闻思香”为黄庭坚所命名，其《香乘》卷十一云：“黄涪翁所取有闻思香，概指内典中从闻思修之意。”“且令鼻观先参”之鼻观，又称鼻端白，是佛教修行法之一。注目谛观鼻尖，时久鼻息成白。故次公注曰：“佛有观想法，观鼻端白，谓之鼻观，新添香之妙意，非闻与思所从入也。”此首诗意，即《楞严经》所云：“孙陀罗难陀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出家，从佛入道，虽具戒律，于三摩提，心常散动，未获无漏。世尊教我，及俱絰罗，观鼻端白。我初谛观，经三七日，见鼻中气，出入如烟，身心内明，圆洞世界，遍成虚净，犹如琉璃，烟相渐销，鼻息成白，心开漏尽，诸出入息，化为光明，照十方界，得阿罗汉。”<sup>〔11〕 126</sup>

第二首，以文人书斋中的熏香，作为内心表露的回应。言万卷小字密密麻麻，即使置于明窗之下，也让人无法看得清楚。当一炷香烧尽时，个中的妙意尽是心境的平静，带入出世之思。末句，有欲隐居世外之意，即使暂时漂游于俗世，亦令人有隽永意冷之感，或许与苏轼在朝中几度沉浮的经历相关。当时苏轼已经五十一岁，年过半百，在京任中书舍人，九月为翰林学士。然而，如同爱书人进入藏书无穷的书斋，却眼已昏花，只觉字小；烟消火冷，香味已远。对苏轼而言，或许半生身老，大抵只剩“心闲”。而溯其源，应该也是取义于《楞严经》关于鼻观的另外一个典故：“香严童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闻如来，教我谛观，诸有为相。我时辞佛，宴晦清斋。见诸比丘，烧沈水香。香气寂然，来入鼻中。我观此气，非木非空，非烟非火。去无所著，来无所从。由是意销，发明无漏。如来印我，得香严号。尘气倏灭，妙香密圆，我从香严，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香严为上。”

<sup>(11)</sup> <sup>125</sup> 看来，香岩童子因香而悟道，参透禅关才是主题。“鼻观”是山谷以禅入诗之惯用语汇，其《题海首座壁》也有“香寒明鼻观，日永称头陀”<sup>(12)</sup> 的说法，而《谢曹方惠二物》其一亦云：“注香上裹裹，映我鼻端白。”<sup>(12)</sup>

鼻子具有眼睛的“观”的功能，这种说法源自《楞严经》“六根互相为用”的思想。佛教称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为六根，对应于客观世界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而产生见、闻、嗅、味、觉、知等作用。《楞严经》认为，只要消除六根的垢惑污染，使之清净，那么六根中的任何一根都能具他根之用，这叫做“六根互用”或“诸根互用”。惠洪不仅信奉“鼻观”说，而且相信眼可闻，耳可见，各感官之间可以互通。他在《泗州院旃檀白衣观音赞》中说：“龙本无耳闻以神，蛇亦无耳闻以眼，牛无耳故闻以鼻，蝼蚁无耳闻以声。六根互用乃如此。”<sup>(13)</sup> 他认为，“观音”一词，表示声音可观，本身就包含六根互用、圆通三昧的意味。在《涟水观音像赞》中，他对此进行讨论：“声音语言形体绝，何以称为光世音？声音语言生灭法，何以又称寂静音？凡有声音语言法，是耳所触非眼境。而此菩萨名观音，是

以眼观声音相。声音若能到眼处，则耳能见諸色法。若耳实不可以见，则眼观声是寂灭。见闻既不能分隔，清净宝觉自圆融。”<sup>(13)</sup>

两组四首六言咏香小诗，见证了黄庭坚与苏东坡之间最初结交的一段情谊，也是苏、黄二人日后不断分享烧香参禅的生活情调的一个缩影。在苏黄应答诗中，两人以香所结的情缘，同修共参，令人动容，所谓气味相投，莫过于此。“沉水”，“烧香”，“一穟黄云”，“鼻观先参”，种种场景，建构出一种安和平静的气氛。

“身老心闲”，渗透着对清静心有所追求的思想，平静如“火冷”一般，是对寂静本心的向往，想要抛开令人“眼花斑斓”的“万卷小字”，以求一念清净、心身皆空、物我相忘之境，而“烟消火冷”四字，则把此种意境展现得恰到好处。继苏轼之和作，黄庭坚又有《子瞻继和复答二首》：“置酒未容虚左，论诗时要指南。迎笑天香满袖，喜公新赴朝参。”“迎燕温风旎旎，润花小雨班班。一炷烟中得意，九衢尘里偷闲。”及《有闻帐中香以为熬蝎者戏用前韵二首》：“海上有人逐臭，天生鼻孔司南。但印香严本寂，不必丛林遍参。”“我读蔚宗香传，文章不减二班。误以甲为浅俗，却知麝要防闲。”苏、黄二人以六言小诗的形式，这般相互唱和，乐于玩味再三，看似无拘束的轻松交流，实是对佛理的同参，融入着禅机妙理，可见二人精神境界在诗道与香道上的契合相和。

另一位在诗道与香道上与苏轼契合相和的，是他的弟弟苏辙（1039～1112）。苏辙的生日，苏轼寄赠檀香观音像，并将专门合制的印香（调制的香粉）和篆香的模具（银篆盘）作为寿礼，可见其对香道的重视与钟爱。其《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诗云：

旃檀婆律海外芬，西山老脐柏所薰。  
香螺脱蜃来相群，能结缥缈风中云。  
一灯如萤起微焚，何时度尽缪篆纹。  
缭绕无穷合复分，绵绵浮空散氤氲。  
东坡持是寿卯君。君少与我师皇坟，  
旁资老聃释迦文。共厄中年点蝇蚊，  
晚遇斯须何足云。君方论道承华勋，  
我亦旗鼓严中军。国恩未报敢不勤，  
但愿不为世所醺。尔来白发不可耘，

问君何时返乡粉，收拾散亡理放纷。  
此心实与香俱煮，闻思大士应已闻。〔2〕2015

这首诗尚存苏轼原迹拓本，曾收入宋拓《成都西楼诗帖》，帖心高29.5厘米，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端匱斋本，题为《子由生日诗帖》。〔14〕

<sup>630</sup>诗作于绍圣元年（1094）二月初。时苏轼在定州任，苏辙在京师为官。苏辙的生日，是己卯年二月二十日，所以苏轼诗中称其为“卯君”。

〔15〕《唐宋诗醇》卷四十评云：“香难以形容，偏为形容曲尽。平时好以禅语入诗，此诗偏只结句大士已闻一点，真有如天花变现不可测。识者在诗道中，殆以从闻思修而入三摩地矣。”

〔16〕<sup>1094</sup>再次呼应《和黄鲁直烧香二首》从《楞严经》“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借鉴的“闻思”，禅思、香道与诗艺，打通一气。清人张问陶则评云：“此作章法奇甚，仄韵叶来稳甚。”〔17〕前半段多处谈香，旃檀即檀香，婆律即龙脑香（亦名冰片），均为海外引进的名香。《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八“广动植之三”云：“龙脑香树，出婆利国，婆利呼为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国。树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围，叶圆而背白，无花实。其树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龙脑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断其树劈取之，膏于树端流出，斫树作坎而承之。入药用，别有法。”〔18〕<sup>177</sup>柏，即柏树，是用来熏烧的香料。而香螺旋，为甲香也，能聚众香，多出于海南。这些显然是东坡合香的香料。老聃，麝香也。诗言麝食柏而香，原袭古人成说，不过麝的取食，的确很清洁，如松与冷杉的嫩枝和叶，又地衣、苔藓、野果。合香所用为整麝香，亦即毛香内的麝香仁，俗称当门子，其香气氤氲生动，用作定香，扩散力最强，留香特别持久，惟名贵不及舶来品的龙涎香。〔19〕

<sup>115</sup>“缪篆纹”一句，又谈到用香工具，即篆香盘，从后句“缭绕无穷合复分”看来，这款香印屈曲缠绕，相当回环复杂，饶有意趣。后半段回顾与子由各自生平的主要阶段，堪称苍茫一生之概括，并表达与子由一起返还乡粉（乡曲，故乡）之心，特别是最后一句，颇有些与香并世而存，又要与香共赴九天之感，可见兄弟情谊之深厚。

此诗苏辙有《次韵子瞻生日见寄》相和：  
日月中人照与芬，心虚虑尽气则薰。

彤霞点空来群群，精诚上彻天无云。  
寸田幽阙暖不焚，眇视中外绎锦纹。  
冥然物我无复分，不出不入常氤氲。  
道师东西指示君，乘此飞仙勿留坟。  
茅山隐居有遗文，世人心动随蛇蚊。  
不信成功如所云，蚤夜宾饯同华勋。  
尔来仅能破魔军，我经生日当益勤。  
公禀正气饮不醺，梨枣未实要锄耘。  
日云莫矣收桑粉，西还闭门止纷纷。  
忧愁真能散凄君，万事过耳今不闻。

（登真隐诀云：“日中青帝，日照龙韬，其夫人曰芬艳婴。”）〔20〕886

和韵诗分依韵、用韵和次韵（步韵）三类，在诗韵的创作难度上，逐次加大。其中依韵，是指按照原诗原韵部的字来协韵；用韵，是指在依韵基础上按照原诗原字来协韵；次韵，是指在用韵基础上按照原诗原字原序来协韵。苏辙这首和韵之作，韵部及次序与苏轼原唱完全相同，属于难度最高的次韵。挑战这一次韵的，是七百四十年之后的清代人。清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胡敬（1769～1845）作《以藏香赠小米用东坡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诗韵》，和者汪远孙、汪斌，收录在汪远孙编刊本的一卷本《销夏倡和诗存》中。<sup>〔21〕</sup>

328

绍圣五年（1098）二月，六十四岁的哥哥苏轼，为了庆祝弟弟苏辙六十大寿，以沉香山子寄弟苏辙。<sup>〔22〕</sup>并作《沉香山子赋》，题下自注“子由生日作”。〔23〕425

古者以芸为香，以兰为芬，以郁鬯为裸，以脂蒿为焚，以椒为涂，以蕙为薰。杜衡带屈，菖蒲荐文。麝多忌而本羶，苏合若芗而实革。嗟吾知之几何，为六入之所分。方根尘之起灭，常颠倒其天君。每求似于仿佛，或鼻劳而妄闻。独沉水为近正，可以配工卜而并云。矧儋崖之异产，实超然而不群。既金坚而玉润，亦鹤骨而龙筋。惟膏液之内足，故把握而兼斤。顾占城之枯朽，宜爨釜而燎蚊。宛彼小山，巉然可欣。如太华之倚天，象小孤之插云。往寿子之生朝，以写我之老勤。子方面壁以终日，岂亦归田而自耘。幸置此于几席，养幽芳于帨幘。无一往之发烈，有

无穷之氤氲。盖非独以饮东坡之寿，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sup>(24) 13</sup>

写这篇赋时，正值朝廷疯狂镇压元祐党人，兄弟二人，正隔海相望，一个被贬儋州，一个被贬雷州。年迈之人被流放在蛮荒绝域，心情的恶劣是可想而知的。身处蛮荒之地，不能以贵重的礼物给弟弟祝寿，只有以当地儋崖之沉香送给弟弟做寿品。沉香亦称“伽南香”、“奇南香”，为海南特产，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香》曰：“沉水香，上品，出海南黎峒，一名土沉香……焚少许，氛翳弥室”。赋中的沉香，专指品质卓越的海南沉香。《舆地纪胜》卷一二四说：“沉香，出万安军（今海南万宁），一两之值与百金等”。如此高昂的价值，自是奇物。苏轼《和陶拟古九首》其六曾写到用沉香木和甲煎粉制作庭中照明之大烛，诗云：

沉香作庭燎，甲煎粉相和。  
岂若炷微火，萦烟裊清歌。  
贪人无饥饱，胡椒亦求多。  
朱、刘两狂子，陨坠如风花。  
本欲竭泽渔，奈此明年何。

自注：“朱初平、刘谊欲冠带黎人，以取水沉耳。”<sup>(2) 4892</sup> 盖谓朱、刘“改置和买，抑勒多取，其害转甚”<sup>(2) 2263</sup>，故加以讽刺。又在《次韵滕大夫三首·沉香石》写到：

壁立孤峰倚砚长，共疑沉水得顽苍。  
欲随楚客纫兰佩，谁信吴儿是木肠。  
山下曾逢化松石，玉中还有辟邪香。  
早知百和俱灰烬，未信人言弱胜刚。<sup>[18] 2000</sup>

其中提到的辟邪香，指安息香。据《酉阳杂俎》载：安息香，出波斯国，其树呼为辟邪。树高三丈许，皮色黄黑，叶有四角，经冬不凋。二月有花，黄色，心微碧不结实。刻皮出胶如饴，名安息香。<sup>(18) 177</sup> 百和，指以众香末合和为之。李之仪还有《次韵东坡沉香石》诗：

海南枯朽插天长，岁久峰峦带藓苍。  
变化那知研山骨，仪刑空只在人肠。  
几因瞰日疑蠮蜡，试沃清泉觉弄香。  
切莫轻珉亡什袭，须防偷眼误摧刚。<sup>[25]</sup>

当时苏辙深陷逆境，苏轼借着沉香山子（即沉香块料山料雕成的山形工艺品）为喻，隐喻坚贞超迈的士君子，以此激励子由，可谓大有深意。整篇寿赋构思奇妙。妙在笔笔不离沉香，

却处处在颂扬一种卓然不群的品格。开篇列举古人以为珍奇的种种香草香料，但作者认为，其香浓烈乱心而不可取。笔锋一转，点出“独沉水为近正”，沉香与众不同，“实超然而不群。既金坚而玉润，亦鹤骨而龙筋”，其淡香无尽和不凡的形象，给人一种启示：坚硬似金却温润如玉，纤细似鹤却重筋如龙，形状小然气象豪，有太华倚天、小孤插云的伟姿。尤其是其香味，更非其他香木可比——香不浓然久不衰。像香木产地占城的香木在沉香的面前，就只能用来烧饭、薰蚊子了。这种种物性，岂不都与人内在的节操与品性相似吗？夸赞当地山崖所产的香，实际暗含对中原某些官僚贵族的不满。前半部分铺陈的香草，就是那些人的象征，而蛮荒之香，实际上是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在香草对比中，反映的是一种自我肯定的心态，是向弟弟倾诉，是在异地他乡寻找自我和精神的象征。

于是，接着说它可以送给苏辙，弟弟面壁，正好可放之于几席之上。香之芬芳和人之品德正好对应，将之作为寿品，再好不过。不难看出，苏轼在给逆境中的弟弟输送一种精神力量，激励他以沉香山子为鉴，保持晚节，做一个立场坚定、精神超然的士君子。如此的寿祝，如此的寿礼，如此的手足悌爱，是建立在心心相印基础上的相互牵挂、相互疼爱，与一般寿礼的善祝善颂，自然大异其趣。

这篇赋还有一个妙处，即严肃的思想内容，反以风趣的笔调出之。从“往寿子之生朝”之后，便以诙谐的口吻和弟弟开起玩笑来：你这个书呆子整天闭门读书，让这沉香山子散发的淡淡的幽香永远提醒你，可不要忘了身在黎民之间的哥哥的情谊哟！两鬓星霜的弟弟、读到这里定会欣然开怀。是啊，在这严酷的人世间，还有什么比这真诚的手足之情更让他感到慰藉的呢！通读全文，虽历近千年岁月，仍馨香氤氲，堪称文字海南沉！<sup>(26) 127</sup>

读到哥哥苏轼的这篇寿赋，苏辙答以《和子瞻沉香山子赋》，前有小序云：“仲春中休，子由于是始生。东坡老人居于海南，以沉水香山遗之，示之以赋，曰：‘以为子寿。’乃和而复之。”赋云：

我生斯晨，阅岁六十。天凿六窦，俾

以出入。有神居之，漠然静一。六为之媒，聘以六物。纷然驰走，不守其宅。光宠所眩，忧患所连。少壮一往，齿摇发脱。失足陨坠，南海之北。苦极而悟，弹指太息。万法尽空，何有得失？色声横鹜，香味并集。我初不受，将尔谁贼。收视内观，燕坐终日。维海彼岸，香木爰植。山高谷深，百围千尺。风雨摧毙，涂潦啮蚀。肤革烂坏，存者骨骼。巉然孤峰，秀出岩穴。如石斯重，如蜡斯泽。焚之一铢，香盖通国。王公所售，不顾金帛。我方躬耕，日耦沮溺。鼻不求养，兰茝弃掷。越人髡裸，章甫奚适。东坡调我，宁不我悉。久而自笑，吾得道迹。声闻在定，雷鼓皆隔。岂不自保，而佛是斥。妄真虽二，本实同出。得真而喜，操妄而栗。叩门尔耳，未入其室。妄中有真，非二非一。无明所缠，则真如窟。古之至人，衣草饭麦。人天来供，金玉山积。我初无心，不求不索。虚心而已，何废实腹。弱志而已，何废强骨？毋令东坡，闻我而咄。奉持香山，稽首仙释。永与东坡，俱证道术。<sup>[20] 941~942</sup>

此赋充分表现了弟弟苏辙对哥哥原赋精神实质的心领神会，这样的唱和，既是骨肉亲情的彼此依恋，又是在同一文化层次上知音的心照与默契。与《次韵子瞻生日见寄》不同，此赋和其意，不和其体，采用北宋时期并不多见的四言赋和答——苏辙集只有两篇四言赋，另一篇是《卜居赋》。虽四言在字数上不免局促，但毕竟也是赋。其体物铺张扬厉，同样很好地体现出赋的特色。写沉香山子“维海彼岸，香木爰植。山高谷深，百围千尺。风雨摧毙，涂潦啮蚀。肤革烂坏，存者骨骼。巉然孤峰，秀出岩穴。如石斯重，如蜡斯泽。焚之一铢，香盖通国。”从物的出产地，写到性状，正是咏物赋的特点。但此外更有叙事、抒情与议论。赋中回顾往事，忆及自己早年“纷然驰走，不守其宅”的宦海生涯，而今耳顺之年，深感“少壮一往，齿摇发脱。失足陨坠，南海之北。苦极而悟，弹指太息”，似乎想到自己年迈体衰，对人生也有些悔意。表现出晚年贬官雷州带来的思想变化。但一转念，又觉得人生如梦，一切都会归于空无，领悟到“万法尽空，何有得

失”，妄真虽二，本实同出，只要淡化得失，持此香山，必将与兄长俱证道术。

元符三年（1100），流落海外三年的苏轼回归内陆，南贬北归后，事事值得新奇，而他自称堪为喜事者，饮酒、啜茶、焚香而已。十月二十三日，他在拜访老友孙鑛之后，写下《书赠孙叔静》，中云：

今日于叔静家饮官法酒，烹团茶，烧  
衙香，用诸葛笔，皆北归喜事。<sup>[24] 2236</sup>

孙叔静（1042~1127），名鑛，本钱塘人，随父徙江都，年十五游太学，苏洵曾亟称之。<sup>[10]</sup>

<sup>2910</sup> 据《宋史》卷三四七记载，鑛笃于行义，在广东时，苏轼谪居惠州，极意与周旋。二子娶晁补之、黄庭坚女，党事起，家人危惧，鑛一无所顾。时人称之。

再来看苏轼的咏香词。有一首和香有关的词牌，其得名即出自东坡，那就是《翻香令》<sup>[27]</sup>  
<sup>833</sup>：

金炉犹暖麝煤残。惜香更把宝钗翻。  
重闻处余熏在，这一番、气味胜从前。  
背人偷盖小蓬山。更将沈水暗同然。  
且图得氤氲久，为情深、嫌怕断头烟。

《翻香令》约作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六月。是年二月，东坡还朝，除判登闻鼓院，专掌臣民奏章事。五月妻王弗卒，时年27岁。以后封为魏成君、崇德君、通义郡君。六月，殡于京城西。这首《翻香令》系东坡在殡仪后撰写的怀旧词，就香炉焚香、今昔对比之景来怀念王弗。《填词图谱续集》此首误作蒋捷词。傅幹《注坡词》卷十二注曰：“此词苏次言传于伯固家，云：老人自制腔名。”苏伯固，名坚，是苏轼好友。傅幹则是南宋初年的人。这一记载，可以说是流传有自，相当可靠。由此也证明，苏轼的确能够自己度曲。<sup>[28] 86</sup>《御定词谱》卷十二亦云：“翻香令，此调始自苏轼，取词中第二句‘惜香爱把宝钗翻’为名。”双片56字，上、下片各五句三平韵。《词式》卷二说“全调只有此一词，无别词可较”。

上片，写灵柩前烧香忆旧情景。第一句忆旧。忆当年，每天祝福的烧香的金炉暖气犹存，伴读时的麝煤已所剩无几。金炉，指金属所铸香炉，有可能是金色的铜质香炉。王安石《夜直》诗：“金炉香尽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

麝煤，或指含有麝香的墨，<sup>(29)</sup> 这里泛指香（并非专指以麝香制作的香）燃烧后的香灰，借代香，因为香气浓烈，所以称“麝”，并不是焚麝香。<sup>(30)</sup> 第二句用递进句忆旧。忆当年，君“惜香”（珍惜麝香，供香），希望香气长留我们身边。更为可贵的是，用“宝钗”将那残余未尽的香翻动，让它全部燃烧完毕。范智闻《西江月》所写“烟缕不愁凄断，宝钗还与商量。佳人特为翻香，图得氤氲重上”，与此相似。翻香，此后渐成宋词常见意象之一。<sup>(31)</sup> 而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香》还以“翻之四面悉香，至煤烬气不焦”，来辨别海南香，品第优劣，意趣正与之无别，焚香之要，实也在此。最后四句用叙述的语言写现实。“重闻”（再嗅）那个地方，“余熏”（余留的香味）还在。“这一番气味”犹胜从前的烧香祝福。整个上片饱含着浓烈香气，象征着东坡与王弗昔日幸福绵绵。

下片，描叙殡仪上精心添香，及其忠诚心态。第一、二句写感情上的隐私。明人沈际飞评曰：“遮遮掩掩，孰谓坡老不解作儿女语。”<sup>(32)</sup> 小蓬山，相传为仙人居地，这里代指焚香之炉，应该是博山炉。《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引李尤《熏炉铭》：“上似蓬山，吐气委蛇。”沈水，即沉水、沉香，一种珍贵香料。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密香沉香》：“此八物同出于一树也……木心与节坚墨，沉水者为沉香，与水面平者为鸡骨香。”后因以沉水借指“沉香”。然：“燃”的本字。趁人不知道，“背人偷盖”上小蓬山式的香炉，再把沉香木加进去，和燃烧着的香料一同暗暗燃烧。这是为了什么？“背人偷盖小蓬山”，这一举动，虽极微小，但刻画出东坡对爱情的虔诚专一。最后几句，又从两层意思上作答：一是“且图得，氤氲久”，只愿香气浓烈，弥漫不散；二是“为情深，嫌怕断头烟”，更为情深香久，不会断截。断头烟，即断头香，谓未燃烧完就熄灭的香。俗谓以断头香供佛，是不吉之兆，来生会得与亲人离散的果报，卓人月《古今词统》卷七云：“元曲所谓‘前生烧了断头香’者，宋时先有此说耶。”尽管这是陈旧习俗，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坡对王弗矢志不渝的深挚之情。

苏轼的《翻香令》影响深远，南宋临川（今江西抚州）人邬處（字文伯），今存词仅一首，

即《翻香令》，词云：“醉和春恨拍阑干。宝香半掩倩谁翻。丁宁告、东风道，小楼空，斜月杏花寒。梦魂无夜不关山。江南千里霎时间。且留得、鸾光在，等归时，双照泪痕干。”<sup>(33) 2471</sup> 上、下片第三句六字折腰，第四句三字，第五句五字，分句与苏词略微不同。清人用此调填词者颇多，如李雯（1608~1647）《翻香令·本意》：“微翻朱火暖金猊。绿烟斜上玉窗低。龙香透，云英薄，近流苏、常自整罗衣。轻分麝月指痕齐。闻山馀篆润丹泥。只赢得，笼儿热，但灰成心字少人知，岭南有心字香。”<sup>(34)</sup> 屈大均（1630~1696）《翻香令》：“香魂煎出怕多烟。未焦翻取气还鲜。玻璃片，轻轻隔，要氤氲、香在有无间。莞中黄熟胜沉鬱。忍教持向博山燃。且藏取，箱奁内，待荀郎熏透玉婵娟。”<sup>(35)</sup> 钱芳标（1635~1679）《翻香令·烧香曲感旧》<sup>(36)</sup>：

绨函牢合鹧鸪斑。殷勤曾索绿窗间。  
重开检，人何处，对金龕、不忍便烧残。  
双心一意本相关。那知荀令损韶颜。  
营斋日，招魂夜，只留熏、小像挂屏山。

虽各有胜境，但皆紧扣翻香词意，与苏轼原作一脉相承。

元丰五年（1082），苏轼在黄州，回忆起七岁时，在眉山遇到一位年九十岁的朱姓老尼，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919~965）宫中。一日大热，孟昶与花蕊夫人纳凉于成都市郊的摩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四十年后，朱去世已久，人无知此词者，苏轼也只记其首两句，于是敷衍为《洞仙歌令》，词云：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sup>(27) 420</sup>

首写炎夏之夜，清涼幽淡之景，“冰肌”二句，形容女子肌肤美妙，性情幽静，如冰清玉润一般。“水殿风来暗香满”之“暗香”寓含着殿里焚茗之静香，栏边美人肌肤之幽香，水上荷花之清香，从中可以想见花蕊夫人的清雅气质，而“欹枕钗横鬓乱”，则更有娇慵神态。下片“庭户无声”、“疏星渡河汉”、“金波淡，玉

“绳低转”诸语，小处见大，细画夜之静谧，也烘托出主人公心境之清淡。玉绳，指北斗七星中的两星名，在第五星玉衡的北面。玉绳转，表示夜深。美人易老，年华如逝。这惯常的主题，在苏轼这首词里，不仅另有一番清凉光景，而且似乎续写出一段美妙的佳话，勾勒出一幅夏夜美人纳凉图，但作者的深意，却结在末句的“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此词笔墨空灵超妙，清人沈祥龙《论词随笔》谓诵其句，“自觉口吻俱香”。

龚明之《中吴纪闻》有一则“姚氏三瑞堂”，记载一桩以香为礼的逸闻：

閩门之西，有姚氏园亭，颇足雅致。姚名淳，家世业儒，东坡先生往来必憩焉。姚氏素以孝称，所居有三瑞堂，东坡尝为赋诗云：“君不见董召南，隐居行义孝且慈。天公亦恐无人知，故令鸡狗相哺儿。又令韩老为作诗，尔来三百年，名与淮水东南驰。此人世不乏，此事亦时有。枫桥三瑞皆目见，天意宛在虞鰌后。惟有此诗非昔人，君更往求无价手。”东坡未作此诗，姚以千文遗之。东坡答简云：“惠及千文，荷雅意之厚。法书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缘，除长物旧有者，犹欲去之，又况复收邪？”固却而不受。此诗既作之后，姚复致香为惠。东坡于《虎丘通老简》尾云：“姚君笃善好事，其意极可嘉，然不须以物见遗。惠香八十罐，却托还之，已领其厚意，与收留无异。实为它相识所惠皆不留故也。切为多致，此恩。”予家藏三瑞堂石刻，每读至此，则叹美东坡之清德，诚不可及也。<sup>(37)</sup>

姚淳为了答谢苏东坡的美意，恭送上好的香料给他，以表敬意。只是这礼物实在太贵重了，一次送礼就八十罐，数量之多令人咋舌！苏东坡也具有清雅高迈的美德，对如此雅礼表示心领，龚明之对他二人都赞佩不绝。实在来说，这些都是深深为香所迷醉的士大夫，他们于香学，早已铭刻在心灵的最深处，可谓香道之知己，香学之知音。

东坡一生嗜香制香，流传至今的有关香的故事还有很多。同时，东坡不仅品香咏香，更以香悟道，以香参禅，不愧香界的实践家兼理

论家。以上所论，点滴而已。希望爱香的有心人，根据有关文献，可以研制出当年东坡的香方，写出一部《东坡香道》一类更为详尽的专书，也不枉东坡当年惜香、用香的一脉香息。

### 注释

- [1]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注释《东坡志林·仇池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 [2]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 [3] 李肇《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 [4] 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 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中。
- [6] 曾枣庄《苏诗汇评》(第2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 [7]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二，四部丛刊景宋乾道刊本。
- [8] 见陈敬《陈氏香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9]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 [10] 孔凡礼《三苏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 [11] 《楞严经》卷五，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
- [12] 《山谷外集诗注》卷十三，四部丛刊景元刊本。
- [13] 《石门文字禅》卷十八，四部丛刊景明径山寺本。
- [14] 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第33卷)，荣宝斋1991年版。陈中浙著《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31页。
- [15] 《王直方诗话》曰：“苏黄门以己卯生，故东坡有卯君之语，其以檀香观音像遗黄门云：‘持是寿卯君。’其《出局偶书》云：‘倾杯不能饮，待得卯君来。’其《送王巩》诗云：‘泪湿粉笺书不得，凭君送与卯君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九)
- [16] (清)爱新觉罗·弘历《唐宋诗醇》下册，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 [17] 见王利器《张问陶读苏诗简端记贅言》，《南充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
- [18] (唐)段成式、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八“广动植之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
- [19] 扬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第一册)，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
- [20] 陈宏天、高秀芳校点《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
- [21] 徐雁平《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 [22] 绍圣五年，六月改年号为元符元年。《苏颍滨年表》所云：“元符元年戊寅二月，轼以辙生日，有《沉香山子赋》赠辙，辙和以答之。”应订正为绍圣五年。

(下转第37页)

# 从域外汉籍看施顾《注东坡先生诗》 在宋代的流传与佚卷之复原

卞东波

**内容提要** 施元之、顾禧、施宿合著的《注东坡先生诗》是宋人注宋诗中的名作，在南宋嘉定、景定年间两次刊刻，目前宋刊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残存三十六卷，日本还保存着施宿所作的《东坡先生年谱》古钞本。日本室町时代的禅僧大岳周崇所作的苏诗古注本《翰苑遗芳》中引用了大量施顾注的佚文，可以辑补出已经散佚的六卷的注文。本文利用域外汉籍新资料考察了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在宋代的流传情况，对现存的宋刊本施顾注以及前人所作的复原工作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复原和整理宋刊本施顾注，可以嘉定原刊本为底本，参校景定补刊本，并以《翰苑遗芳》中所引的施顾注为补充。

**关键词** 施顾《注东坡先生诗》 《翰苑遗芳》 嘉定本 景定本 复原

## 一、引言

南宋施元之、顾禧、施宿合力著成的《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堪称宋人注宋诗中的精品。施元之，字德初，吴兴（今浙江湖州）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起居舍人、国史院编修、左司谏、赣州太守等职<sup>〔1〕 302</sup>。顾禧，字景藩，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终身未仕，闭户读诵，博极坟典。除注东坡诗之外，还著有《补注东坡长短句》（见旧题陈鹄《耆旧续闻》）。施宿（1164～1213），字武子，施元之之子，绍熙四年（1193）进士。庆元（1195～1200）初知余姚县，旋通判会稽，纂成《（嘉泰）会稽志》；嘉定时以朝散大夫提举淮东常平仓，刊刻了施顾注坡诗<sup>〔2〕</sup>。施宿留心金石，广搜苏轼的墨迹碑帖，取之与当时流行的东坡文集对校，并多用东坡手迹碑帖作为《注东坡先生诗》的底本文字。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初稿完成后，一直未付

之剞劂，施宿对初稿进行了加工，“反覆先生出处，考其所与酬赓答倡之人，言论风旨足以相发，与夫得之耆旧长老之传，有所援据，足裨隐轶者，各附见篇目之左。而又采之国史，以谱其年，及新法罢行之目，列于其上，而系以诗之先后”<sup>〔3〕</sup>。可见，施宿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编纂了《东坡先生年谱》附于卷首，二是“篇目之左”的“题左注”<sup>〔4〕 16</sup>也是出于他的手笔。比起其他的宋人注苏诗，施顾注“援引必著书名，诠诂不乖本事。又于注题下务阐诗旨。引事征诗，因诗存人，使读者得以考见当日之情事”<sup>〔5〕</sup>，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

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在宋代曾经两次刊刻，一次是嘉定六年（1213）施宿于淮东仓司任上的初刊本，由当时擅长欧体书法的傅穉手书上版，刻印精美。屈万里先生跋此书云：“楮墨精湛，字画劲秀，宋本中之上品也。”<sup>〔6〕</sup>此本刻成后，版片仍存于淮东仓司。景定三年（1262），当时提举淮东常平仓的郑羽在淮东仓司发现了嘉定年间的版片，于是“汰其字之漫者，大小七万一千五百七十七，计一百七十九板，命工重梓”<sup>〔7〕</sup>。这就是景定年间的补刊本，景定本是在嘉定本基础上的修补，大部分版面仍是嘉定年间的原版。见过景定本的大藏书家傅增湘云：“兹本则字画俊美，楮墨明净，生平所见宋代佳刻，殆难其匹。”<sup>〔8〕 690</sup>日本汉学巨擘吉川幸次郎见此书亦“叹为人间奇宝”<sup>〔9〕</sup>，日本汉学家小川环树亦称，此本“天水精椠，人间孤本，宇内之鸿宝”<sup>〔10〕</sup>。难得的是，目前宋刻嘉定本、景定本仍传承于世，庋藏于海峡两岸的图书馆中。不过，四十二卷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仅有三十六卷传世（部分卷帙有残缺），仍有六卷完全亡佚。幸运的是，施顾注很早就东传到日本。施顾注卷前所附的施宿编的《东坡先生年谱》虽在中国已经散佚，然在日本尚有两种古

钞本存世<sup>(11)</sup>；而且日本室町时代的苏注古本《翰苑遗芳》也大量征引了施顾注，再结合中国的其他传世文献，庶几可以部分复原已经亡佚的六卷的注文。



## 二、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在宋代的流传

南宋嘉定六年（1213），施宿动用公款在淮东仓司刊刻了他参与修订增补的、其父施元之和顾禧合著的《注东坡先生诗》，随即施宿去职还家，不久去世，这期间还遭到弹劾。去世一年后，又被抄家。直到嘉定十五年，才由其女上书自陈，获得平反。宋刊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在宋代流传资料极少，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sup>[12] 591~592</sup>卷二十最早著录了此书：

《注东坡集》四十二卷，《年谱》、《目录》各一卷，司谏吴兴施元之德初与吴郡顾景蕃共为之，元之子宿从而推广，且为《年谱》，以传于世。陆放翁为作序，颇言注之难。盖其一时事实，既非亲见，又无故老传闻，有不能尽知者。噫，岂独坡诗也哉！注杜诗者非不多，往往穿凿傅会，皆臆决之过也。

见到全本四十二卷施顾《注东坡先生诗》的人不多，陈振孙的著录很重要，一是证明了全本前有施宿所撰的《年谱》一卷。二是肯定了施宿的贡献，即他对施元之、顾禧的原稿进行了“从而推广”的工作。三是似乎也暗示施顾注没有“穿凿傅会”的毛病。

原本前还有陆游所作的序，见于《渭南文集》<sup>[13] 376~377</sup>卷十五，略云：

近世有蜀人任渊，尝注宋子京、黄鲁直、陈无已三家诗，颇称详赡。若东坡先生之诗，则援据宏博、指趣深远，渊独不敢为之说。某顷与范公至能会于蜀，因相与论东坡诗，慨然谓予：“足下当作一书，发明东坡之意，以遗学者。”某谢不能。……后二十五六年，某告老居山阴泽中，吴兴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谏公所注数十大编，属某作序。司谏公以绝识博学名天下，且

用功深，历岁久，又助之以顾君景藩之该洽，则于东坡之意，盖几可以无憾矣。某虽不能如至能所托，而得序斯文，岂非幸哉！嘉泰二年正月五日山阴老民陆游序。

嘉泰二年，即1202年，距施顾注刊刻完成尚有11年，施宿当初给陆游看的“数十大编”注本可能是施元之、顾禧所作的稿本，后来施宿又对稿本进行了加工。此事当在施宿通判会稽时，另外陆游还为施宿所编的《(嘉泰)会稽志》作序，可见两人交谊较笃。

郑骞教授所辑的《宋刊施顾注苏东坡诗提要参考资料汇编》中所附的宋代资料有限，除了施宿本人的序外，就是上面的两条。又有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施武子被劾”条记载了施宿因刊刻苏诗注本而被劾之事的经过：

施宿字武子，湖州长兴人。父元之，绍兴张榜，乾道间为左司谏。宿晚为淮东仓曹，时有故旧在言路，因书遗以番葡萄。归院相会，出以荐酒，有问，知所自，憾其不己致也。劾之，无以蔽罪。宿尝以其父所注坡诗刻之，仓司有所识。傅穉字汉孺（湖州人），穷乏相投，善欧书，遂俾书之，锓板，以赒其归。因摭此事，坐以赃私。其女适章农卿良朋云。<sup>[14] 241</sup>

这段史料不仅记载了施宿因为刊刻其父所注的东坡诗而获罪的来龙去脉，他遭受的完全是不白之冤，而且也记载了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是由擅长欧体的傅穉手写上版的这条珍贵史料。

此前关于施顾《注东坡先生诗》的宋代史料仅见于此<sup>(15)</sup>。最近笔者在阅读域外汉籍和其他宋代文献时，又发现了一些与施顾注相关的新资料，现披露如下。

南宋诗僧物初大观（1201~1268）《物初臘语》卷二载《楼潮州以汝窑瓶炉泰州新刊坡诗注及澄心堂纸见遗以诗寄谢》<sup>[16] 553</sup>一诗：

汝州瓶炉何处有，花影卦文随转矚。  
细然柏子扬轻烟，满插莲葩吐新馥。  
松窗竹几顿精神，更把风骚看玉局。  
野禅危坐舌若瘖，得书稍稍闲披读。  
麻沙常厌字如蚁，鸟焉成马大成六。  
海陵刊本何磊落，未阅先令人意足。  
二贤发明竟该洽，似向乌台露心腹。  
有问山翁安得此，迂斋故家书满屋。  
跨灶冲楼独擅场，古文源委有正续。  
已知胸中饱经济，暂向家园乐幽独。  
论文取士到山林，衲衣椎鲁慚虚辱。  
冥搜岂足报琼瑶，无奈溪藤闹裁玉。  
想见书窗清昼长，笔底春风珠百斛。

释大观，字物初，号慈云，俗姓陆，鄞县横溪（今浙江宁波）人，临济宗北礪居简（1164~1246）法嗣，宋代看话禅代表人物大慧宗杲（1089~1163）之再传弟子。大观有《物初大观禅师语录》一卷，又有诗文别集《物初臘语》二十五卷。《物初臘语》有宋刻本、日本宝永五年木活字本及日本抄配本等本存世，宋刻本为残帙，而木活字本为全本。金程宇教授所编的《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收录了宝永五年的木活字本，许红霞教授编著的《珍本宋集五种：日藏宋僧诗文集整理研究》则收录了《物初臘语》木活字本的点校本。《物初臘语》中的此诗是笔者新发现的有关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在宋代流传的极好资料。

施宿在嘉定六年的原刻本，郑羽在景定三年的补刻本皆刊于淮东仓司，其驻地在泰州，而海陵县为泰州的治所，故物初大观诗中所言的“海陵刊本”，即淮东仓司本。诗题中的“泰州新刊”，既可能指景定年间郑羽补刊本，但因嘉定本成书的时间到大观生活的时代也相隔不远，故也可能指嘉定本。从“何磊落”，“未阅先令人意足”等语可见淮东仓司本刊刻质量之高。大观将淮东仓司刻本与宋代流行的福建麻沙刻本做了比较，麻沙本不但字小，而且错误极多，这从反面映衬了“海陵刊本”品质之高。此本一直流传至今，从实物来看，大观之语不虚。“二贤发明竞该洽，似向乌台露心腹”，“二贤”即施元之、顾禧，此两句道出了施顾注在学术上的价值，其注的特色是“该洽”，即博通之意<sup>[17]</sup>，可与陆游《注东坡先生诗》序中所言的施元之其人“以绝识博学名天下”，其注“援据宏博”相印证。“乌台”是宋代的御史台，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曾遭“乌台诗案”，在御史台的牢狱中，苏轼被迫向御史台官员供述了他所写的一些犯忌诗文背后的讥刺之意，苏轼的这些口供，后来被编为《乌台诗案》一书。

“露心腹”是说施顾注颇像《乌台诗案》中的苏轼供词一样，能探得东坡内心的确曲。“有问山翁安得此，迂斋故家书满屋”，可见此书是楼潮州的先人楼昉传下来的。楼昉，字旸叔，号迂斋，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绍熙四年（1193）进士；而施宿为湖州长兴人，又曾在会稽为官，而且施宿亦为绍熙四年进士，与楼昉是同年。极可能施宿与楼昉之间有交游，而楼昉所藏的施顾注本可能为施宿所赠。如果楼潮州所持之本确为楼昉所传，那么此本应是较早刊刻的嘉定本。从《物初臘语》中这则史料可见，宋人就已经对此书精美的刊刻多有揄扬之词，而且对施顾注的学术价值已有肯定。

晚宋王应麟（1223~1296）《困学纪闻》<sup>[18]</sup>

1970~1971 卷十八云：

东坡《与欧阳晦夫》诗三首，晦夫名辟，桂州人。梅圣愈有诗送之云：“我家无梧桐，安可久留凤。”东坡南迁，至合浦，晦夫时为石康令，出其诗稿数十幅。事见《桂林志》。注坡诗者以为文忠之族，非也。

王应麟所称的“注坡诗者”应就是指施顾注。按施顾注卷三十七《梅圣俞之客欧阳晦夫，使工画茅庵居其中，一琴横床而已，曹子方作诗四韵，仆和之云》题下注云：“东坡以元符三年正月诏移廉州，四月移永州，五月始被移廉之命，六月离儋耳，七月四日至廉，三为欧阳晦夫赋诗……晦夫盖文忠公之族，当是为此州推官尔……”虽然王应麟这里是批评施顾注，但对这一细节的重视，可见他可能仔细读过施顾注。

南宋福建遗民蔡正孙（1239~？）编著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下简称《和陶诗话》）是现存唯一一部宋人所编有关苏轼《和陶诗》的专题评论集，而且载录了三部苏轼《和陶诗》的宋代注本。《和陶诗话》在中国本土已经失传，目前有三种残卷保存在韩国。《和陶诗话》不但保留了两部已经失传的非常珍贵的宋代苏轼《和陶诗》注本，即傅共《东坡和陶诗解》与蔡梦弼《东坡和陶诗集注》的佚文，而且还有蔡正孙本人对《和陶诗》的评释<sup>[19]</sup>。笔者发现，蔡正孙对《和陶诗》的注解，有不少地方与施顾注相同，仅以《和陶诗话》卷二苏轼和陶渊明《归园田居》注为例，其一：“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蔡注云：“《家语》：鲁人以孔子为东家丘。”施顾注卷四十一同样也引用了《孔子家语》中的这段话。其二“穷猿既投林”，蔡注引《晋史》云：“穷猿投林，何暇择木。”施顾注所引与此相同。其四“莫言陈家紫”，蔡注引《荔支谱》云：“兴化军有陈家紫，为第一品。”施顾注卷四十一亦引此语。其五“月固不胜烛”，蔡注引了一段“东坡旧注”，此段注文几乎一字未易地见于施顾注中。类似的蔡注与施顾注相同的地方还很多，这可能并不是偶然，而有可能是蔡正孙见过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但他没有在注中提到该书。

从这些史料可见，施顾注并非我们想象的流传不广，实际上在宋代已经有不少学者阅读并利用过此书了，通过域外汉籍新资料，我们可以追踪到更多施顾注在宋代流传的线索。

### 三、宋刊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残本现状以及前人所作的复原工作

宋刊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分

别在南宋嘉定、景定年间两次刊刻过，而元明再未重刊，故传世稀少<sup>(20)</sup>。明末钱谦益的绛云楼曾藏有一部四十二卷的全本，钱氏云：“其考证人物，援据时事，视他注为可观”，“坡诗尽于此矣，记者宜辨之”<sup>(21) 1783</sup>。对其评价颇高，但后绛云楼遭遇祝融之厄，钱氏藏本亦不幸化为乌有。目前存世的宋刊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皆为残帙，今将其收藏情况略述如下：

版本	藏地	现存卷数	备注	影印情况
嘉定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	卷十一、十二、二十五、二十六四卷	原为缪荃孙所藏，后归刘承幹嘉业堂。	影印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嘉定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	卷四十一、四十二两卷	原为黄丕烈藏书，后归杨绍和海源阁、周叔弢。“第四十一卷”、“第四十二卷”之卷数，被书贾分别挖改为“卷上”和“卷下”。	影印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嘉定本	台湾“国家图书馆”	总目录卷下，诗注卷三至四、卷七、卷十至十三、卷十五至二十、卷二十九、卷三十二至三十四、卷三十七至三十八等十九卷，再加卷十四的三分之一，卷二十八的卷端页 <sup>(22) 14~24</sup> 。	此书先后经明人安国、毛晋，清徐乾学、宋荦、揆叙、吴荣光、翁方纲、潘德畲、叶名澧、邓邦述、袁思亮，民国潘宗周、蒋祖诒、张珩等人收藏，抗战胜利后归国立中央图书馆，1949年转移至台湾 <sup>(23)</sup> 。	2012年，台湾大块文化景印出版，定名为《焦尾本〈注东坡先生诗〉》（加上大陆藏书家韦力所藏的卷四十一）。
嘉定本	藏书家韦力“芷兰斋”	卷四十一	与台湾“国图”藏本同源，后归藏书家陈澄中，2004年陈氏后人在美国转让给韦力。	影印收入《焦尾本〈注东坡先生诗〉》。
嘉定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	卷四十二	与台湾“国图”藏本同源，后归藏书家陈澄中，2004年陈氏后人在美国转让给中国国	未影印。

景定本	上海图书馆	总目录一卷，诗注卷三至四、卷十一至十八、卷二十一至四十二，凡三十二卷。	原为清宗室允祥安乐堂旧藏，翁同龢于同治十年（1871）“以二十金购之”，后翁氏玄孙翁万戈转让给上海图书馆。	《宋刊施顾注苏东坡诗》，台湾艺文印书馆，1969年。 郑骞、严一萍编校的《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台湾艺文印书馆，1980年。
-----	-------	-------------------------------------	---	---

从上可见，目前嘉定本存总目录卷下，诗注卷三至四、卷七、卷十至十三、卷十五至二十、卷二十五至二十六、卷二十九、卷三十二至三十四、卷三十七至三十八、卷四十一至四十二，凡二十三卷，以及卷十四、卷二十八残页。景定本存总目录一卷，诗注卷三至四、卷十一至十八、卷二十一至四十二，凡三十四卷。两者去其重复，仍缺卷一、二、五、六、八、九，共六卷。



复原施顾《注东坡先生诗》的工作从清代就开始了。康熙年间，宋荦得到宋刊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后，憾其不全，遂请邵长蘅、李必值相继为之补注，又辑得施顾未收的东坡佚诗四百余首，属冯景注之，编成一部新的《施注苏诗》。但邵长蘅等人接手后，对施顾原注无端删减，“大都掇拾王氏旧说，失施氏面目”<sup>(24)</sup>；

“又旧本微黯，字迹多难辨识，邵长蘅等惮于寻绎，往往臆改其文，或竟删除以灭迹，并存者亦失其真”<sup>(25) 1327</sup>。这种整理古籍的方式，遭到了学者痛斥，谓之“其书为人齿冷，不足置议”<sup>(26)</sup>；“无知妄作，厚诬古人”<sup>(27)</sup>；“其编纂态度草率敷衍，对原书极不忠实”（《论邵长蘅

补本》<sup>(28) 38</sup>；甚至说“其书可覆酱瓿”<sup>(29) 611</sup>。邵本遭到古今学者的一致批评，主要是其对施顾注原书大加删削，不但失去施顾注之原貌，而且学风极不严谨。据郑骞先生研究，除了无故删节外，邵本还“割裂颠倒，移动其次序位置，或窜入他人的注解”，非但没有补足宋刊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散佚的部分，而且离原貌也谬之千里，可谓古籍整理失败的典型。

日本汉学家仓田淳之助、小川环树在日本苏诗古注本《翰苑遗芳》中发现其中引录了大量的施顾注佚文，遂命助手将之抄出，依翁同龢玄孙翁万戈所藏景定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目录重新辑录，加上日本发现的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上下卷并陆游、施宿的序跋，编成《苏诗佚注》一书，由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在1965年出版。仓田、小川先生在日本汉籍中发现施顾注的佚文，其功甚伟，为复原施顾注指明了方向。《苏诗佚注》辑录了施顾注卷一、二、五、六、七、八、九、十、十九、二十的佚注，不过，囿于当时条件，两位先生能接触到的宋刊施顾注原本有限，而施顾注真正亡佚的不过卷一、二、五、六、八、九等六卷，卷七、十、十九、二十仍有台湾所藏的嘉定本，虽有部分残缺，但并没有完全亡佚，又《苏诗佚注》在辑佚时不免有误。严一萍先生在《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的序中以卷七为例，指出了《苏诗佚注》的两个问题，即“施顾原注所无，为佚注误收者”；“施顾原注有，而为佚注所失收者”。郑骞先生则指出，《苏诗佚注》“第一，所辑确是施注，但有时掺入他人注文；第二，辑出来的句注及题下注大约有原书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题左注差不多完全辑出。”<sup>(28)</sup>

<sup>47</sup> 两位先生指出的《苏诗佚注》误辑、漏辑的状况在全书中比较多见。再以卷十为例，如《游庐山次韵章传道》、《送赵寺丞寄陈海州》、《送赵寺丞寄陈海州》、《答陈述古三首》等诗，《苏诗佚注》皆云“无注”，但实际上，嘉定本不但有注，而且注文还颇长。又如施顾注卷十《和梅户曹会猎铁沟》，我们比较一下嘉定本施顾注和《苏诗佚注》的辑录：

嘉定本	《苏诗佚注》辑本
山西从古说三明，《后汉·段明传》：与皇甫威明、张然颖并知名，显达京师，称为“凉州三明”。又传赞：山西多猛，三明俪踪。 <u>谁信儒冠也捍城。</u> 《汉·邴食其传》：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左氏以干城为捍城。 <u>竿上鲸鲵犹未掩，草中狐兔不须惊。</u> <u>东州赵叟饮无敌，南国梅仙诗有声。</u> <u>不向如皋闲射雉，归来何以得卿卿。</u> 《胜览》：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	山西从古说三明，谁信儒冠也捍城。 <u>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u> 左氏以干城为捍城。 <u>竿上鲸鲵犹未掩，草中狐兔不须惊。</u> <u>东州赵叟饮无敌，南国梅仙诗有声。</u> <u>不向如皋闲射雉，归来何以得卿卿。</u> 《胜览》：

身。竿上鲸鲵犹未掩，东坡云：近皋数盗。《左传·宣公十二年》：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草中狐兔不须惊。杜子美《冬狩行》：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东州赵叟饮无敌，南国梅仙诗有声。  
《汉·梅福传》：隐吴市门，卒，至今人以为仙。韩退之《石鼎联句序》：侯喜新有能诗声。不向如皋闲射雉，归来何以得卿卿。东坡云：是日惟梅、赵不射。《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世说》：王安丰妇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不敬。”答曰：“我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复卿卿。”

泰州如皋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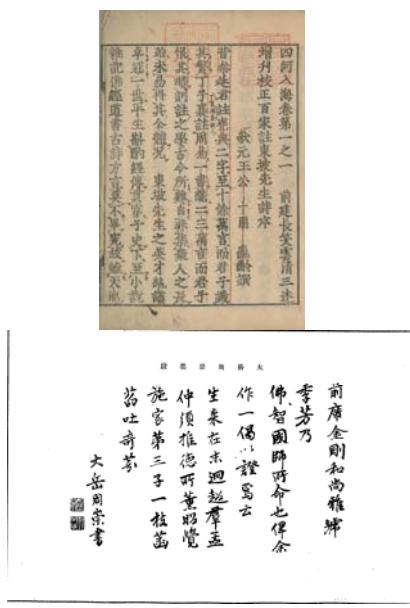
从此例可见，《苏诗佚注》遗漏了不少施顾注的原文，而且最后引用的《方舆胜览》中语也不见于施顾注，而是《翰苑遗芳》本身的注。另外，《苏诗佚注》在利用《翰苑遗芳》时也有一些讹误，如《苏诗佚注》卷十《和蒋夔寄茶》“沃野便到桑麻川”注“沃野”云：“《文选》张平子《西京赋》：广衍沃野，厥田上。”这里《苏诗佚注》有脱误，最后一句当作“厥田上”。故《苏诗佚注》所辑的卷七、十、十九、二十不足为据，应该直接用台湾藏的嘉定本，残损的部分可以参考《翰苑遗芳》来补完。

郑骞、严一萍先生编校的《增补足本宋刊施顾注苏诗》是目前最完整、学术水准最高的施顾注辑本，其有四部分组成：一、排印了日本发现的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上下卷，以及陆游、施宿原序。二、影印了翁万戈藏郑羽补刊景定本目录一卷、正文三十二卷。三、排印了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而翁藏本所缺的嘉定原刊本卷七、十、十九、二十等四卷。四、排印了《苏诗佚注》所收的卷一、二、五、六、八、九的辑录本，此六卷为翁藏本、台湾“国图”藏本俱缺的部分。郑、严二位先生的增补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也恢复了宋刊施顾注的旧观。但从今天的学术观念来看，仍有缺憾。首先，虽然台湾所藏嘉定本十九卷曾经祝融之厄，但主体部分仍然完好，且有大陆所藏相同版本可以参证。故笔者认为如果复原宋刊施顾注，应该以嘉定原刊本为底本，参照景定本来复原。其次，排印的台湾藏嘉定原刊本四卷多有缺字，如卷十九《东坡八首》

其三“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施顾注引东坡语云：“蜀人贵芹芽，脍杂鸠肉作口。”其实此语乃东坡自注，宋代的文献如《宋文鉴》卷十八都有引用，缺字就作“之”，可补。《冬至日赠安节》“诸孙行复尔，世事何时毕。”施顾注云：“□□口诗：子孙日已长，世事还复然。”此处的缺文可补作“柳子厚”<sup>(30)</sup>。又如同卷《乐全先生生日以铁拄杖为寿二首》其一“众中惊倒野狐禅”，施顾注引《传灯录》云：“……老人言中大悟，告辞，曰：‘今已免野狐身，□□□□□，□□亡僧例焚烧。’师令□□□□□□□□。果见一死野狐，积□□□。”其实，这些缺字可以依《古宿尊录》卷一所载的百丈怀海语录补全：“……老人言中大悟，告辞，曰：‘今已免野狐身，只在山后住，乞依亡僧例焚烧。’师令维那白槌告众。岩中果见一死野狐，积薪化之。”

综上所述，复原宋刊施顾《注东坡先生诗》的工作，从清代就开始了，经过古今中外学者的努力，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也留下了不少遗憾，今天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复原宋刊施顾《注东坡先生诗》的工作向前更推进一步<sup>(31)</sup>。

#### 四、日本苏诗古注本《翰苑遗芳》与施顾《注东坡先生诗》的复原



目前收录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佚文最多的是日本禅僧大岳周崇（1345~1423）<sup>(32)</sup><sup>167</sup>所撰的苏诗注本《翰苑遗芳》（简称《遗芳》）。大岳周崇，俗姓一宫氏，法讳周崇，道号大岳，别号全愚道人，阿波国（今德岛县）人，日本南北朝、室町时代临济宗梦窗派僧人。早年入

阿波的宝陀寺，师事默翁妙诫，后随默翁迁至京都临川寺。其为人明敏，通内外典，受到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尊崇。应永九年（1402），任京都相国寺住持；十年任天龙寺住持。应永十一年（1404）始，任南禅寺鹿苑僧录11年。晚年再任天龙寺住持<sup>(33)</sup><sup>164~167</sup>。据仓田淳之助先生研究，大岳年轻时曾访金泽文库，读过其中的藏书。金泽文库是日本镰仓时代执权北条氏建立的私人文库，文库所藏之书全部是从中国输入的宋元版善籍，仅供当时北条家和称名寺的僧人使用。到大岳周崇的时代，金泽文库由称名寺的住持管理，但管理非常严格，一般外来之人很难入寺读书。大岳周崇所引用到的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可能就是金泽文库所藏的宋刊本<sup>(34)</sup>。《翰苑遗芳》是以旧题王十朋编纂的《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为底本，对其进行补注的古注本，大岳补注依靠的主要文献是施顾注和赵次公注。《翰苑遗芳》共二十五卷，目前仅有古钞的单行本存世<sup>(35)</sup>，同时笑云清三所编的《四河入海》抄录了绝大部分的《遗芳》。不过笔者发现，《四河入海》所抄的《遗芳》尚有遗漏，同时《四河入海》的录文（特别是通行的古活字本）错误较多<sup>(36)</sup>。故在《遗芳》有完整的单行本存世的情况下，应该以《遗芳》原书为依据来复原其中所引的施顾注，而非援引错误很多的古活字本《四河入海》，但同时也可参照京都建仁寺两足院所藏《四河入海》古钞本。

下文以《遗芳》中保存的施顾注佚注，来讨论施顾注亡佚部分的辑佚。《遗芳》引用的施顾注以及施顾注本身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遗芳》有时引用施顾注，会直接称为“施曰”、“施氏本”、“顾本”、“施顾本”、“施宿本”，这部分就可以直接辑出。二、施宿所作的“题左注”一般比较长，像一小段诗话，利用宋代国史等资料，对诗题中的人物、掌故、朝政、时局及作诗本旨进行详细的解释。三、如果相关诗歌有苏诗墨迹碑刻的话，施宿在题下注中也会说明，并采用墨迹碑刻作为底本，并与当时流行的“集本”比勘。四、在题下注中，施宿偶会提及自己<sup>(37)</sup>。五、施顾注句注的注释方式用的是李善注《文选》式的，基本是释事而不释意，直接引用文献来说明苏诗的语源，即“援引必著书名”。六、大岳周崇有时在引用施顾注后，会加上自己注解，同时用“注”字加以区隔，“注”之前的就是施顾注<sup>(38)</sup>。如果《翰苑遗芳》的注文有符合上面六个特点的，就可以确认是施顾注。

先看直接引用施顾注的例子，《翰苑遗芳》

## 卷十一《苏州姚氏三瑞堂》(见施顾注卷九)题注云:

施曰：三瑞堂在阊阖门外，道间密迩枫桥水陆院。初姚氏之先墓，有甘露、灵芝、麦双穗之异，遂以三瑞名其堂。枫桥水陆长老通公者。东坡倅杭时，往来吴中，舟必经枫桥，识通，姚氏子名淳者，因通以求诗，而坡盖未始识淳也。坡守高密，答通二帖，淳亦并三瑞诗刻于堂中。第一帖乃十二月十二日所作，其词云：“轼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养衰拙。然城中无山水，寺宇朴陋，僧皆粗野。复求苏杭湖山之游，无复仿佛矣。”后批云：“三瑞堂诗已作了，纳去。恶诗竟何用是家，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是岁熙宁七年甲寅也。第二帖乃后一岁八月廿四日。词云：“承开堂未几，学者日增，吾师久闲，独迫于众意，无乃少劳，然济物为心，应不计劳逸也。”后批云：“姚君笃善好事，其意极可佳，然不须以物见遗也。惠香八十罐却托还之，已领其厚意，与收留无异。实为他相识之惠，皆不留故也。切为多致此恩，千万勿讶。”三瑞堂者，考于《吴郡图经》皆无所见。屡访郡人而不可得，最后属平江观察推官赵君珌夫穷究得之，且云：“地已易主，诗刻亦不存。”而以东坡二帖刻本相示，虽石已湮泐，而刊刻甚工，秀润可爱。校以岁月，则此诗当在《除夜病中赠段屯田》诗之前。此卷皆已先刻，有不容易矣。备载二帖，得以尽见始末云。

本注是典型的施宿所作的“题左注”，对诗题中出现的人名、地名详细考证，并介绍作诗的前后背景，且备载施宿收集到的碑帖方面的文献。从注中也可以看到施宿本人的学术态度，为了弄清楚诗题中的“三瑞堂”，他先查阅了当地的地方志《吴郡图经》，未果后，又实地踏访，“屡访郡人”，最后从平江观察推官赵珌夫那里得到准确信息。虽然三瑞堂旧址已不存，且堂中刊刻的苏诗石刻亦已“湮泐”，但施宿意外得到了苏轼写给此诗的主人公姚淳的两份“帖”的刻本，并在注中附录了这两份珍贵的文献。施宿此注信息量非常大，不但详细考证了“三瑞堂”的来历，“姚氏”其人，而且还上下求索，从当地得到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注中的赵珌夫，主要活动于嘉定年间，据《宝庆四明志》卷十八记载，他在嘉定十一年曾任定海县的宣教郎，十二年转任县令。故施宿与赵珌夫是同时代人。可见，施宿在增订施顾注的过程中，既参之以文献，又实地考察，还质之以当时学者。这种学术上的实证与严谨的精神，使得施

顾注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施宿又说：“校以岁月，则此诗当在《除夜病中赠段屯田》诗之前。此卷皆已先刻，有不容易矣。”此语又透露出施顾注刊刻的重要信息，即施宿可能是在施元之、顾禧原稿基础上随修订随刊的。当他修订好《苏州姚氏三瑞堂》一诗的注释时，发现编年上，此诗应在《除夜病中赠段屯田》之前，但《除夜病中赠段屯田》已经刊刻，故无法再调整位置，故在注中加以说明。

但更多的时候，《遗芳》是直接袭用施顾注，而不注明。可以根据上文对施顾注特点的概括来断定其是否为佚文，如《遗芳》卷九《次韵和刘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间刘购得之》(见施顾注卷一)题注云：

刘京兆，名敞，字原父，新喻人。庆历廷试第一。编排官王尧臣，其内兄也，以亲嫌自列，乃为第二。直集贤院，判考功、权度支判官。夏竦，谥文正。原父疏言非是，改谥文庄。吴充以典礼得罪，冯京救之，亦罢。原父因对极论。仁宗曰：

“充振职，京亦亡他，中书恶其太直，不能容尔。”原父曰：“自古惟人主不能容受直言，陛下不宽仁好谏，而中书乃排逐言者。”帝深纳其忠，擢知制诰。宰相陈执中恶其斤己，沮之，帝不听。后以翰林侍读学士知永兴军。召还，以病求汝州。改集贤院学士，判南京御史台。卒年五十。原父学问渊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皆究知大略。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即其家以取决。为文尤赡敏。欧阳文忠公深服其博。子奉世，字仲冯。元祐间为签书枢密院事。东坡在齐安有诗云：

“平生我亦轻余子，晚岁谁人念此翁。”盖记原父语也。事见十八卷《和王巩》诗注。

这段注文，《遗芳》并未像其他地方一样注明“施曰”，但这段注文的风格明显与施宿的“题左注”风格相同，可以断定是施顾注的佚文。施宿的题左注可能利用了当时的国史，但又参考了其他的文献，加进了自己的考证<sup>(39) 165~166</sup>。

又如《遗芳》卷九《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二首》其一(见施顾注卷六)“乱山滴翠衣裘重”，注云：“集本作‘衣裘’，重亭上有先生所书石刻本作‘湿’。”《遗芳》卷十一《李颀秀才善画山以两轴见寄仍有诗次韵答之》(见施顾注卷八)“囊中收得武陵春”，注云：“陆文学《钱塘记》：武林山，隋时有虎见于上，因名虎林。后避唐讳改为武林。集本‘林’作‘陵’，盖音响相似故。”这两处出现了与“集本”的校勘，明显是施顾注的特色。故虽未标施顾注，也可以断定是施顾注的佚文。

除此之外，施顾注以旁征博引见长，其中引用了不少稀见的宋代文献，甚至仅见于施顾注的文献。如果《遗芳》用了这些文献，也可以推断此注是施顾注的佚文，如《遗芳》卷十一《游鹤林招隐二首》（施顾注卷八）题注云：

“曾彦和《润州类集》：招隐，本征士。戴颙之馆斋，昙度道人则以为寺。”《润州类集》是南宋曾旼所编的宋代镇江地方总集，目前已经亡佚，其佚文基本见于施顾注中<sup>(40) 305~307</sup>，这里《遗芳》引用的《润州类集》，可以认定就来自于施顾注。

除了“做加法”外，可能还要“做减法”。由于《遗芳》是目前唯一引用施顾注佚文最多的文献，故恢复完全佚失的六卷，必须依赖《遗芳》。《遗芳》主要是由施顾注、赵次公注，以及大岳周崇本人的注组成，赵次公注比较好分辨，《遗芳》在引用时，全部都会注明是“次公注”，目前比较难区分的是施顾注与大岳周崇的注。笔者比较了《苏诗佚诗》辑录的施顾注卷七、十、十九、二十与嘉定本原刊的四卷，通过比较容易发现《苏诗佚诗》辑佚的状况。笔者发现《遗芳》基本抄录了施顾注，但也有若干条的脱漏和误辑。对于已经亡佚的六卷而言，脱漏的部分无从核校，关键要保证不能将大岳周崇的注误辑入。上文已经说到施顾注句中注的特点就是“援引必著书名”，否则就非施顾注，如《苏诗佚注》卷十《和蒋夔寄茶》“海鳌江柱初脱泉”注“江柱”云：“江瑤柱也。瑤与珧同，鳌属甲，可饰物。俗呼江珧。”此注没有引书，当非施顾注，核以嘉定本，果然如此。施顾注的“句注”与“题注”分工比较明显，诗歌创作背景方面的内容只会出现在“题注”中，不用出现在“句注”。如果“句注”没有引经据典，又交代写诗背景，则可能非施顾注，如《遗芳》卷十六《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见施顾注卷一）

“夜雨何时听萧瑟”下，《苏诗佚注》与《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皆从《遗芳》注云：“是岁应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诗序》有曰：嘉祐六年，予与子由同举制，策寓怀远驿，时年廿有三。”此注与施顾注句注体例不合，似非原注。

除此之外，大岳周崇之注的语气也不同施顾注，如施顾注卷十《寄刘孝叔》“保甲连村团未遍”，《苏诗佚注》注“保甲”云：“王介甫，宋熙宁中自参政拜相，变新法，有青苗、市易、保马、保甲、新经、字义、水利、雇役等名也。”这一条不但不见于嘉定本，而且作为宋人的施元之等人，不会直接称本朝为“宋朝”的，而

是称“国朝”，这在现存的施顾注中多见。而且这一条也没有引书，可以断定非施顾注，而是大岳周崇本人之注。再如上引《遗芳》卷九《次韵和刘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间刘购得之》之诗的题左注末还有“刘敞，字原父，号公是先生，弟攽，字贡父，号公非先生。敞子奉世，字仲冯，是为三刘。刘贡父神宗朝充集贤院校理，著《汉书误》。刘涣字凝之，号西磵先生，字恕，字道原，恕子羲仲，亦为三刘”一段话，这段文字不但与上文有部分重复，且语气也与上文不通贯。实际上，如果检视现存的施顾注题左注的话，就会发现，题左注最后一句往往即是“事见某卷某诗注”，如卷三《送刘道原归觐南康》题左注末云：“事见四十卷《是是堂》诗注。”卷四十一《岁暮作和张常侍》题左注末云：“事见三十八卷《次韵子由赠吴子野先生》诗注。”一般注文就到此为止，下面不会再有其他文字。另外，《遗芳》等日本苏诗注本比较喜欢引用苏轼的年谱，如傅藻的《东坡纪年录》等来注苏诗，但施顾注现存的卷帙中一次都没有引用过东坡的年谱，实际上施顾可能并没有接触过傅藻的《东坡纪年录》，故如果《苏诗佚注》辑本中引用到傅书，一定不是施顾注原文，如《苏诗佚注》卷十《惜花》“而我食菜方清斋”，就引到《东坡纪年录》，此注当删。

综上所述，《翰苑遗芳》保存了施顾注的大量佚文，是目前辑佚的最好文献。但在利用《遗芳》辑录施顾注时，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凡是符合本文总结的施顾注特点的，都可以当作佚文辑入；同时也要仔细分辨《遗芳》的注文，凡是注语不似宋人语气，或者引用到施顾没有看到的文献的，这些注文都不可能是施顾注。

## 五、结语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缪荃孙所藏嘉定原本四卷、周叔弢所藏《和陶诗》二卷，以及台湾大块文化影印的台湾“国图”所藏嘉定原本施顾注十九卷半（及韦力先生所藏《和陶诗》一卷）相继出版，加上上世纪台湾影印出版的翁同龢所藏的景定补刊本三十二卷，为复原宋刊施顾注提供了极好的文献基础。如果机械地将各种影印本拼合在一起，固然可以看到宋刊施顾注的原貌，但嘉定原本受到火烧，多有残损，且仍有六卷完全散佚，加之施顾注原注也存在一些刊误<sup>(41)</sup>，故笔者认为，在现有的影印本之外，应该再作一校证本，对宋刊施顾注进行全

面的董理。校证本的底本可以用嘉定原刊本，版面残损或缺失的部分可以参考景定本，以及各种传世文献。完全佚失的六卷，可以依日本所藏的《翰苑遗芳》古钞本以及《四河入海》古钞本重辑。在复原宋刊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原貌的基础上，再检核施顾注的原文，覆其出处，进行全面的校证考订，庶几可以成为体现当代学术水准的整理本。

### 注释

[1] 《施元之传》，参见陆心源《宋史翼》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91年版。

[2] 《施宿传》，参见陆心源《宋史翼》卷二十九，《(道光)泰州志》卷二十“名宦门”。施氏父子生平，又可参见陈乃乾《宋长兴施氏父子事迹考》，载《事林》第六辑，1941年4月。

[3] 施宿《注东坡先生诗》序，载郑騫、严一萍编校《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艺文印书馆1980年。

[4] 关于句注、题下注、题左注的分别，参见郑騫《苏刊施顾注苏东坡诗提要》第三节《施顾注性质分析及作者考证》，《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

[5] 清宋荦、张榕端阅定，邵长蘅、顾嗣立等删补《施注苏诗》，张榕端序，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刊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关于施顾注的文献价值，参见王友胜《施元之等〈注东坡先生诗〉平议》[《中国韵文学刊》，2002年第1期；又见王友胜《施元之等与〈注东坡先生诗〉研究》，载其所著《苏诗研究史稿》(修订版)，中华书局2010年版]、何泽棠《施宿〈注东坡诗〉题注的诠释方法与历史地位》[《中国韵文学刊》，2010年第2期]、《施宿与“以史证诗”》[《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6] 屈万里《跋“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宋刊本注东坡先生诗》，《图书馆学报》创刊号，1959年。

[7] 郑羽景定刊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跋，载《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卷末。

[8]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9] 吉川幸次郎《苏诗佚诗序》，载小川环树、仓田淳之助编《苏诗佚注》卷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5年。

[10] 翁万戈《影印宋刊施顾注苏东坡诗缘起》引小川环树语，载《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艺文印书馆1980年版。

[11] 一种为小川环树先生在京都书肆所购之古钞本(收入小川先生所编《苏诗佚注》中)，一种为名古屋蓬左文库所藏钞本，王水照先生所编的《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中华书局2015年版)中影印了蓬左本，又以《苏诗佚注》本为底本，参校蓬左本，整理出一个点校本。

[12]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基本照录了陈氏记载，加上了一条张舜民的评语，并节录了陆游的序，可能马氏并未见到原书。

[13] 涂小马《渭南文集校注》卷十五，载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第九册，浙江古籍

出版社2011年版。

[14] 周密著、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版。其实，施宿在淮东仓司任上颇有政绩。《(道光)泰州志》卷二十“名宦门”载：“施宿，常平使。海陵城垣久圮，宿申乞耗盐袋钱，置窑百座，并乞兵夫修筑，广厚视旧有加。复建惠民仓、惠民药局。嘉定十五年，郡人祠之于城隍庙西庑，祷多应。绍定元年，守陈垓增绘像于景贤堂。”可见，施宿为政得到当地百姓的认可。

[15] 另外，旧题陈鹄《耆旧续闻》卷二中还有顾禧《补注东坡长短句》的记载，补的应是傅幹的《注坡词》。

[16] 许红霞《珍本宋集五种：日藏宋僧诗文集整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7] 如《北齐书·颜之推传》称颜之推“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陆游所作的《注东坡先生诗》序中也称“助之以顾君景藩之该洽”，可见“该洽”是宋人对施顾注公认的评价。

[18] 王应麟著，翁元圻等注，宋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困学纪闻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9] 参见卞东波《〈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与苏轼和陶诗的宋代注本》，《复旦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20] 关于施顾注的宋刊本，参见刘尚荣《宋刊〈施顾注苏诗〉考》，载其所著《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1988年版。该文也谈到施顾注复原的问题，可以参看。

[21] 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五《跋东坡先生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2] 参见俞小明(台湾“国家图书馆”特藏文献组主任)《嘉定本〈注东坡先生诗〉复刻始末》，台湾《“全国”新书信息月刊》第178期，2013年10月。

[23] 关于翁方纲所藏嘉定本的情况，参见潘美月《谈宋刻施顾东坡诗注》(《故宫文物月刊》，1985年第10期)、拓晓堂《翁方纲藏宋刻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嘉德通讯》，2004年第4期)、王长民《也谈翁方纲与宋椠〈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2期)、衣若芬《敬观真赏：翁方纲旧藏本〈施顾注东坡诗〉研究》(台湾清华大学《清华中文学报》，2014年6月第11期)。

[24] 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例略》，见查慎行补注、王友胜校点《苏诗补注》卷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

[25]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查慎行《补注苏诗》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

[26] 景定本潘祖荫跋语。

[27] 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八，上海澹园排印本，1928年。

[28] 郑騫《苏刊施顾注苏东坡诗提要》，《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

[29] 黄丕烈著、屠友祥校注《荛圃藏书题识》卷八“注东坡先生诗”后引录周锡瓒跋，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

[30] 此诗为柳宗元《田家三首》其一，见《柳河东集》卷四十三。

[31] 今人也提出了复原施注本的方案，如子冉《复原〈施顾注坡诗〉之我见》，载《天府新论》，1987年第4期。

[32] “大岳”有时也写作“太岳”，但现存大岳的手迹，自署写作“大岳”，见上村观光编《五山诗僧传》，民友社1912年版。

[33] 大岳周崇生平参见上村观光编《五山诗僧传》，又参见玉村竹二《五山禅僧传记集成》，讲谈社，1983年，第402~403页。

[34] 参见仓田淳之助《注东坡先生诗与东坡先生年谱》中《施注与翰苑遗芳》一节，载《苏诗佚注》附录。关于金泽文库之收藏，参见近藤守重《金泽文库考》，金泽文库发行之非卖品，1911年。

[35] 《翰苑遗芳》古钞本为京都相国寺僧喜承的写本，第二十五卷末有喜承的跋语：“延德二年庚戌自九月二十一日始之，同三年辛亥七月十二日于万年山相国寺大智院怡云轩下，而防州南明山乘福寺长松院末派僧喜承书之毕。”可见，《遗芳》抄写于延德二年至三年间（1490~1491），这离《遗芳》成书并不久。

[36] 例如，《遗芳》卷九《李公择求黄鹤楼诗因记旧所闻于冯当世者》注引章炳文《搜神秘览》“老卒再拜，且愿执事”（此注正是施顾注），《四河入海》所引的《遗芳》“愿”误作“顾”。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37] 施顾注卷十三《登望谼亭》题下注：“此诗墨迹乃钦宗东宫旧藏，今在曾文清家，宿尝刻石余姚县治。”又卷三十九《睡起闻米元章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题下注：“此诗及卧阅四印帖，距梦奠才两旬尔，真迹宿尝刻之余姚县斋。”

[38] 《遗芳》卷十八《次韵王庭老退居见寄二首》其二注“右手持杯左捧颐”云：“《晋·毕卓传》：尝谓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庄子·渔父篇》：左手据膝，右手持颐。注：无因得见玉织织，盖戏廷老之侍姬也。”“注”之前的文字完全与现存的施顾注相同，但“注”之后则是《遗芳》的注文，则不应当作施顾注。

[39] 南宋李璧所作的《王荆文公诗注》卷十三《答扬州刘原甫》注中征引了《国史·刘敞传》，可以看到施宿的题左注与《国史·刘敞传》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如李璧注引的《国史》称刘敞为“袁州临江人”，而施顾注则称其“新喻人”。参见卞东波《宋人注宋诗中的宋代文学史料——以南宋李璧〈王荆文公诗注〉为例》，载《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版。

[40] 参见卞东波《宋代诗歌总集新考》中有关《润州类集》的考证，载《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

[41] 如卷十五《百步洪》“欲遣佳人寄锦字”，施顾注引李白《久离别歌》：“李有锦字书，开缄使人嗟。”“李”当作“况”。卷三十七《宥老楮》“张王惟老穀”，施顾注引《毛诗·小雅》云：“爰有树檀，其干维穀。”“干”当为“下”之误。卷三十八《欧阳晦夫惠琴枕》“卧枕纶巾酒新漉”，施顾注引《晋书·谢万传》云：“著白轮巾。”“轮”当作“纶”。

卞东波，南京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 （上接第27页）

[23] 吴雪涛《苏文系年考略》，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4]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25] 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前集卷四律诗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 参见孙民《东坡赋译注》，巴蜀书社1995年版。

[27]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8] 叶嘉莹主编《苏轼词新释辑评》（上册），中国书店2007年版。

[29] 韩偓《横塘》诗：“蜀纸麝煤添笔媚，越瓯犀液发茶香。”杨无咎《清平乐》（花阴转午）：“麝煤落纸生春。只应李卫夫人。我亦前身逸少，莫嗔太逼君真。”

[30] 类似用例，还有贺铸《点绛唇》：“一幅霜绡，麝煤熏腻纹丝缕。”张元幹《菩萨蛮》：“春浅锦屏寒，麝煤金博山。”晁公武《鵞鶡天》：“兰烬短，麝煤轻。”陆游《瑞鹤仙》：“屏间麝煤冷。”唐艺孙《天香》（螺甲磨星）：“海蜃楼高，仙娥钿小，缥缈结成心字。麝煤候暖，载一朵、轻云不起。”

[31] 如蔡伸《满庭芳》：“玉鼎翻香，红炉迭胜”，辛弃疾《虞美人》：“宝钗小立白翻香”，马子严《满庭芳》：“逢解佩、玉女翻香”，方千里《渡江云》：“还暗思、香翻香烬，深闭窗纱”，黄机《水龙吟》：“歌罢翻香，梦回呵酒”，吴文英《西江月》：“添线绣床人倦，翻香罗幕烟斜”，张枢《木兰花慢》：“记剪烛调弦，翻香校谱”，刘埙《六么令》：“锦瑟银屏何处，花雾翻香曲”。

[32] 沈际飞《草堂诗餘》别集卷二，明刊本。

[33] 《全宋词》（第4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词牌当据（清）陶梁《词综补遗》卷七（清道光十四年陶氏红豆树馆刻本）。（宋）赵闻礼《阳春白雪》卷七（清嘉庆宛委别藏本）则题为《翻香冷》。

[34] （清）李雯《蓼斋集》卷三十一，清顺治十四年石维昆刻本。

[35] （清）屈大均《翁山诗外》卷十六词，清康熙刻凌凤翔补修本。

[36] （清）钱芳标《湘瑟词》卷一，清康熙刻本；清蒋景祁《瑶华集》卷五，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37] （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二，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陈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 ——苏轼被贬谪辞、谢表探论

庆振轩

**内容提要** 在苏轼丰富复杂的人生中，其得意与失意之两极最为人们关注。苏轼遇赦北归病逝前对于“平生功业”的总结，与之相关的谪辞、谢表是我们探寻当时政治生态变化和东坡贬谪心态的极佳的切入点。

**关键词** 苏轼 谪辞 谢表 政坛生态 特色影响

研讨苏轼的多彩人生，其人生发展的关键节点格外引人瞩目，后人羡慕称美其仁宗朝科场得意，兄弟双双高中进士之后，又制科扬名；仁宗有“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之赞叹；言及元祐间备受恩宠，苏轼自言：

臣以草木之微，当天地之泽。七典名郡，再入翰林；两除尚书，三忝侍读。虽当世之豪杰，犹未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能副？（《谢兼侍读表》<sup>[1]2749</sup>）

然而苏轼宦海几经浮沉，在辞世前两个月，于游金山寺时作《自题金山画像》<sup>[2]5573</sup>回首总结平生，则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特别强调贬谪生涯对其人生的影响。对于苏轼迁黄、谪惠、渡海的经历、创作、心态，学界研究成果颇丰，本文拟集中探研有关苏轼贬谪的朝廷谪辞、苏轼相关谢表所聚焦的政坛生态及谪辞、谢表之特色影响。琐屑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 一、熙丰年间，反对变法：台谏交攻，神宗惜才，贬谪黄州；谢表流露复杂心绪

苏轼被贬黄州，其要因是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反对变法，东坡自言：“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诽谤，臣遂得罪。”（《乞郡札子》）<sup>[1]3216</sup>；直接的导火索是苏轼在《湖州谢上表》

中发的两句牢骚，说神宗皇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sup>[1]2578</sup>。“新进”、“生事”刺激了一些政坛投机者的神经，引起了台谏弹劾围剿的喧嚣。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回顾说：“先帝眷臣不衰，时因贺谢表章，即对左右称道。党人疑臣复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构造飞语，酝酿百端，必欲致臣于死。先帝初亦不听，而此三人执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狱。”悍吏皇甫遵，“将带吏卒，就湖州追摄，如捕寇贼”<sup>[1]3375</sup>“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一《苏轼因吟诗下吏》<sup>[3]56</sup>）。

苏轼自元丰二年八月十八日在湖州任上被捕入御史台狱，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开释，经历了百余日非人的牢狱生活，“苏轼下台狱，张璪与李定杂治，谋傅致轼至于死，不克”<sup>[4]10570</sup>，这是史传的简约记述；“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周必大《二老堂诗话》引苏颂语<sup>[3]57~58</sup>），这是他人的客观记载；“柏台霜气夜淒淒，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其二<sup>[2]2092</sup>）则是苏轼自己的切身体味。由是可以想知东坡当时的处境和心境。

朝野对于乌台诗案的态度极为复杂。居心叵测，必欲置苏轼于死地，如李定、舒亶辈有之；乘人之危，推波助澜，如王珪者有之；怯懦畏祸，避之唯恐不及者有之。“我穷交游绝”，苏轼一再在诗文中言及，但朝野上下，营救苏轼者也颇有其人。其中既有执政大臣，如吴充、章惇，也有退居老臣如王安石、司马光等。虽政治观点不一，均出援手。

但最终起决定作用，最令苏轼感念的是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态度和作用。关于神宗与曹太后对于苏轼的“国士之知”，宋人多有记载，限于篇幅，仅撷其一二。陈鹄《耆旧续闻》<sup>[3]59</sup>

## 卷二载：

慈圣光献大渐，上纯孝，欲肆赦。后曰：“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时子瞻对薄也。后又言：“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上悟，即有黄州之贬。

曾敏行《独醒杂志》<sup>[5]479</sup>载曰：

东坡坐诏狱，御史上其寄黄门之诗，神宗见之，即薄其罪，谪居黄州。……神宗爱惜人才，不忍终弃如此。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sup>[5]65</sup>亦载：“（苏轼）既付狱，吏必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上终怜之，促具狱，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神宗对于苏轼的态度集中体现在东坡被贬黄州的谪辞中。《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五《尚书吏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制》<sup>[6]462</sup>曰：

敕。具官某。稍以时名，获跻显仕。列职儒馆，历典名城。报礼未闻，阴怀觖望。讪毁国政，出于诬欺。致言职之交攻，属宪司而辩治。诐辞险说，情实俱孚。虽肆宥示恩，朕欲从贷；而奸言乱众，义所不容。黜直方州，以励风俗。往服轻典，毋忘自新。可。

“往服轻典，毋忘自新”一语，令苏轼感激涕零，其《到黄州谢表》<sup>[1]2582-2583</sup>写道：

臣轼言：去岁十二月二十九日，准勅责降臣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臣已于今月一日到本州讫者。狂愚冒犯，故有常刑；仁圣矜怜，特从轻典。赦其必死，许以自新；祇服训辞，惟知感涕。

伏念臣早缘科第，误忝缙绅。亲逢睿哲之兴，遂有功名之意。亦尝召对便殿，考其所学之言；试守三州，观其所行之实。而臣用意过当，日趋于迷。赋命衰穷，天夺其魄；叛违义理，辜负恩私。茫如醉梦之中，不知言语之出。虽至仁屡赦，而众议不容。案罪责情，固宜伏斧锧于两观；推恩屈法，犹当御魑魅于三危。岂谓尚玷散员，更叨善地。投畀麏鼯之野，保全樗栎之生。臣虽至愚，岂不知幸？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德刑并用，善恶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惩而大戒。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中。伏惟此恩，何以为报？惟当蔬食淡饭，杜门思愆，深悟积年之非，永为多士之戒。

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弃物。若获尽力鞭捶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

无怪乎苏轼对神宗感念之情发自肺腑，据有关资料记载，苏轼贬谪黄州期间，神宗欲起用东坡，“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sup>[5]65</sup>

赵葵《行营杂录》<sup>[3]84</sup>亦载：

（苏轼在）神宗朝以议新法不合补外，李定之徒媒孽其诗文有讪上语，下诏狱，欲置之死。上独庇之，得出。方在狱时，宰相举轼诗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此不臣也。上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推求。’时相语塞。

上一日与近臣论人才，因曰：“轼方古人物孰比？”近臣曰：“颇似李白。”上曰：“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屡有意复用，而言者力沮之。一日，忽出手札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因量移临汝。”

神宗一言，有起死回生之效，故苏轼《谢量移汝州表》<sup>[1]2590</sup>写道：

特授臣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者。稍从内迁，示不终弃。罪已甘于万死，恩实出于再生。

……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汤德日新，尧仁天覆……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顾惟效死之无门，杀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口乃穷。徒有此心，期于异日。

正由于苏轼的谢表“归诚君父，如对家人，如语素交，恩惻乃尔。”（陈天定《古今小品》卷二《苏轼谢量移汝州表》）“真情真景，最能感动。”（储欣《东坡先生全集录》卷五《谢量移汝州表》<sup>[1]2593</sup>）所以神宗见到谢表后能感知苏轼的真诚的感戴之心，何薳《春渚纪闻》卷六《裕陵眷贤士》<sup>[5]153</sup>载：

公《自黄移汝州谢表》既上，裕陵览之，顾谓侍臣曰：“苏轼真奇才。”时有憾公者，复前奏曰：“观轼表中犹有怨望之语。”裕陵愕然曰：“何谓也？”对曰：“其言兄弟并列于贤科，与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之语。”盖言轼、辙皆前应直言极谏之诏，今乃以诗词被谴，诚非其罪也。裕陵徐谓之曰：“朕已灼知苏轼衷心，实无他肠也。”于是语塞云。

通过以上对苏轼贬谪黄州、量移汝州有关的台谏围剿、台狱审讯及贬谪、量移的制词、诏命、谢表的梳理，对于苏轼人生重要节点的

聚焦，我们感知到几点讯息：台谏围剿的险恶用心、台狱审讯的情势凶险；皇太后、神宗皇帝对于苏轼的眷顾和庇护；朝廷政治形势复杂但未完全恶化；苏轼贬谪黄州、量移汝州之际的特殊心态。如果将上述种种与苏轼晚年再贬惠州、儋州加以对照，对于研究苏轼贬谪心态以及对于苏轼整体研究当不无启示作用。

## 二、哲宗绍圣，政治生态恶化，贬惠谪儋，直面现实，但求身心安处

曾有一度，学界特别关注苏轼被贬黄州的经历与其仕宦生涯文学创作的关联，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比较分析苏轼被贬黄州与贬谪惠州、儋州时不同的政坛情势、复杂人事和东坡的特有感受，对于东坡贬谪生涯中的心路历程可能有更加深入的认识，而研究的最佳切入点仍是朝廷的谪辞与作者的谢表。

元祐八年（1093）六月，苏轼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除知定州。九月，高太后病逝。十月，哲宗亲政。政事将变，山雨欲来。绍圣元年（1094）二月，中书侍郎李清臣、尚书右丞邓润甫首倡“绍述”之说。四月，渐复熙宁新法，召用新党被贬者，章惇为相，责降元祐旧臣。御史虞策、来之邵言苏轼元祐所作诰词多涉讥讪，诏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责知英州。六月，御史来之邵等复言苏轼罪大罚轻，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旋又改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

政坛巨变，三降谪命，措辞之严苛，前此未有。苏轼责降英州之词乃蔡卞所作，略曰：

讪上之恶，众激厥愆。造言之诛，法谨于近。矧弹章之荐至，孰公议之敢私。  
爰正常刑，以警列位。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行污而丑正，学辟而欺愚。顷在先朝，稍跻清贵。不惟喻德之义，屡貶怀怨之言。察其回邪，靡见听用，遂形怨悱，自取斥疏。肆予纂服之初，开以自新之路。召从方郡，服在近班。弗讹尔心，覆出为恶。辄于书命之职，公肆诬实之辞。凡兹立法造令之大经，皆曰蠹国害民之弊政。虽托言于外，以责大臣，而用意之私，实害前烈。顾威灵之如在，岂情理之可容。深惟积辜，宜窜远服，祇夺近职，尚临一邦。是为宽恩，无重来悔。可特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sup>[7]773</sup>

而苏轼贬谪惠州的制词则出之于林希的手笔，其文曰：

左承议郎新差知英州苏轼。元丰间，

有司奏轼罪甚众，论法当死。先皇帝特赦而不诛，于轼恩德厚矣。朕初嗣位，政出权臣。引轼兄弟，以为己助。自谓得计，罔有悛心。忘国大恩，敢以怨报。若讥朕过失，何所不容。仍代予言，诬诋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我士民，复何面目！乃至交通阉寺，矜诧幸恩。市井不为，缙绅所耻。尚曲典章，但从降黜。今言者谓轼指斥宗庙，罪大罚轻。国有常刑，非朕可赦。宥尔万死，窜之遐服。虽轼辩足惑众，文足饰非，自绝君亲，又将奚憇！保尔余息，毋重后悔。（《苏轼散官惠州安置制》<sup>[7]774</sup>）

与贬谪黄州相比，贬谪英州、惠州之时，朝中御史言官乘风望指，欲置东坡于死地者相近；但贬谪惠州之时，已全然无有皇上“人才难得”的眷顾，也无朝中大臣如王安石、吴充等人的援救；有的只是哲宗的怨望报复之心和章惇之流“以绍述为国是”<sup>[8]448</sup>，“哲宗亲政，宰相章惇托绍述以快私忿”<sup>[8]481</sup>的凶险；更有的是林希之流为权力所诱惑所驱使，见风转舵，落井下石。据史载“（章）惇欲使（林希）典书诰，逞毒于元祐诸臣，且许以为执政。希久不得志，请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贬黜之制，皆希为之，极其丑诋。”<sup>[8]449</sup>

林希其人，与苏轼、苏辙为同年，“在元祐作从官，与东坡为侪辈。在杭则为交承。东坡入翰苑，林以启贺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盖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迈晁董公孙之学。’后东坡谪惠州，林草制词，极其诋訾。”

（《长水日抄》<sup>[3]200</sup>）“行子由谪词云：‘父子兄弟挟机权变诈，惊愚惑众。’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固无足言，先人何罪耶？！’”（王大成《野老纪闻》<sup>[3]200</sup>）后世讥其“一人之身，而前后矛盾若此。”“以一时希意进图，而贻讥后世，权位之能移人若此！”（陆树声《长水日抄》<sup>[3]201</sup>）

揆诸时势，时有所至，事乃必然，苏轼自然心中了然，但即使如此，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面对险恶局势，亦不免悲凉之感从心而生，故谢表中有悲怆之言：“伏念臣草芥贱儒，岷峨冷族。袭先人之素业，借一策以窃名。虽幼岁勤劳，实学圣人之大道；而终身穷薄，常为天下之罪人。先帝全臣于众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于散官永弃之地。恩深报蔑，每忧天地之难欺；福渺祸多，是亦古今之罕有。自悲弃物，犹欲吁天。”但言及言官诬陷攻击之诏诰文字，只是申明自己乃代朝廷立言，尽心国事而已：

“惟上圣纂宗庙之图，方太母听帘帷之政。招延俊义，登进老成。何期章句之谀才，使掌丝纶之要职。凡一时黜陟进退之众，皆两宫威福

赏罚之公。既在代言，敢思逃责？苟不能敷扬上意，尊朝廷于日月之明；则何以耸动四方鼓号令于雷霆之震？故当昭陈功伐，直喻正邪。岂臣愚敢有于私心，盖王言不可以匿旨。当时之天夺其魄，但谓守官；今日之臣肆其言，期于必戮。”

英州之贬，在东坡预料之中，所以谢表文字在恳切洒脱中透出别样风采：“罪虽骇于听闻，怒终归于宽宥。不独再生于东市，犹令尸禄于南州。累岁宠荣，固已太过；此时窜责，诚所宜然。瘴海炎陬，去若清凉之地；苍颜素发，谁怜衰暮之年？恩重丘山，感藏骨髓。”（《英州谢上表》<sup>[1]2822~2823</sup>）

三月数黜，但身黜而志不屈，传东坡见林希所撰制词，仅曰“林大亦能作文章耶”（王大成《野老纪闻》<sup>[3]200</sup>）而已。

苏轼《到惠州谢表》与《英州谢上表》前后相隔半年，时势更趋恶化，东坡谢表先叙及贬谪遭遇，“先奉告命，落两职、追一官，以承议郎知英州军事。续奉告命，责授臣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已于今月二日到惠州公参讫者。”次言处境险恶，“仁圣曲全，本欲界之民社；群言交击，必将致之死亡。尚荷宽恩，止投荒服”。再言无辜不移之心，“伏念臣性资褊浅，学术荒唐。但守不移之愚，遂成难赦之咎”。终言自己贬谪中的态度，“臣敢不服膺严训，托命至仁；洗心自新，没齿无怨。但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精诚未泯，空余结草之忠”。<sup>[1]2782~2783</sup>

苏轼贬谪英州、惠州之谢上表因其相同时势、相近心情，可以对读。其深深打动读者内心之处，诚如王文诰所言：

虞策、来之邵等翻腾旧劾各条，公屡有辩奏，可复检也。此则不惟不辩，率性一肩挑回，故云“固当昭陈功罚，直喻正邪”也。盖前之必辩者，原欲留其身以为国，此则已将一片热肠放下，唯有拼此身听其流转、付诸清议而已。可见其立时勇决也。此状本集不载具官年月，特为补全。俾读之者虽百世之下，犹见其生气凛然也。

<sup>[1]2826~2827</sup>

然而政局进一步恶化，苏轼于绍圣四年闰二月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关于苏轼被贬儋州，后人有不同说法。或谓当政者戏取其字之偏旁，或谓权臣闻公之安于惠。实际上纵观前史，政治权利一旦与权奸结合，种种恶行，是难以用道理解释的。苏轼《到昌化军谢表》记述其由惠至儋行程曰：“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责授臣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臣寻

于当月十九日起离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军讫者。”

苏轼以 62 岁衰病之身渡海远谪，心中哀伤尽见于谢表，如曰“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sup>[1]2785~2786</sup>

对照其渡海前留给王古信中所言，苏轼当时之哀痛应能洞见，信中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与王敏仲书》<sup>[1]6244</sup>）

“所欲言者，岂有过此者乎？”将此书与谢表两相对照，苏轼其时之处境心绪可以想知，故高塘云：“此到军后表。地故在儋耳，非人所居。故篇中写得气象愁惨，不忍卒读。”陈天定云：“读此而不酸心者非人也。彼儋人者亦已太甚！”<sup>[1]2787</sup>

面对海外贬谪之地，直面政敌倾覆之心，凄怆满怀的东坡决然前行。“伏念臣顷缘际会，偶窃宠荣。曾无毫发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依然一副傲骨，傲对群小攻讦，直面人生忧患。

### 三、以谪辞、谢表为聚焦点，可以略窥与东坡晚年贬谪生活相关文体的特色影响

探讨与苏轼迁谪生涯相关谪辞、谢表的创作特色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是我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方面。

有宋一代，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知制诰乃清要之职，因其代朝廷立言，深受重视；至北宋中后期，更因涉及朋党之争，制诰著文，更关切时势及臣僚命运。史料所载为我们透露了个中信息：

章惇尝言：“元祐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所以能振动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会希赴成都，过阙，惇欲使典书诏，逞毒于元祐诸臣，且许以为执政。希久不得志，请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贬黜之制，皆希为之，极其丑诋……读者无不愤叹。<sup>[8]449</sup>

正因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上承王命或秉承权相之命，在复杂的权利之争中，即不能稍有疏忽：

绍圣元年三月诏以苏辙为端明殿学士、知汝州。中书舍人吴安诗草制，有“风节天下所闻”及“原诚终是爱君”之语，帝

怒，命别撰词。苏辙止散官知汝州，吴安诗寻亦罢为起居舍人。<sup>[9]997</sup>

谪辞不能稍有疏忽，谢表就更不能有不妥之处，据何薳《春渚纪闻》卷六《裕陵眷贤士》<sup>[5]153</sup>载：

公《自黄移汝州谢表》既上，裕陵览之，顾谓侍臣曰：“苏轼真奇才。”时有憾公者，复前奏曰：“观轼表中犹有怨望之语。”裕陵愕然曰：“何谓也？”对曰：“其言兄弟并列于贤科，与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之语。”盖言轼、辙皆前应直言极谏之诏，今乃以诗词被谴，诚非其罪也。裕陵徐谓之曰：“朕已灼知苏轼衷心，实无他肠也。”于是语塞云。

由是可知，如果不是神宗“灼知苏轼衷心”，“憾公者”就会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所以苏轼谢表撰文皆深思熟虑之作。

此外，朝中朋党纷争，任职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撰写相关诏诰、谪辞的官员，或意气用事，逞才使气，或受命权臣，恶意报复，无论意愿如何，均需出彩之笔。从代元祐政坛立言的苏轼和代哲宗、章惇立言的林希所撰诏诰都可略窥一二。朱弁《曲洧旧闻》<sup>[3]116-117</sup>卷五载：

吕惠卿之谪也，词头始下，刘贡父当草制。东坡呼曰：“贡父平生作刽子，今日才斩人也。”贡父急引疾而出。东坡一挥而就，不日传都下，纸为之贵。

陈长方《步里客谈》<sup>[3]117</sup>卷一亦载：

(元祐中)东坡行吕吉甫责词曰：“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若转圜。始以帝尧之聪，姑试伯鯀，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又曰：“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视。”既而语人曰：“三十年作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

《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乃东坡得意之作，但从有关资料也可看出，东坡有意气用事之嫌。也正是为此，苏轼元祐期间所撰诏诰成为日后政敌攻击的口实。《皇宋治迹统类》载，绍圣元年四月，“御史虞策言：‘苏轼作诰诏，语涉讥讪，望核实施行。’殿中侍御史来之邵言：‘轼臣先朝，久以罪废。至元祐擢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轼凡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又刘拯言：‘苏轼敢以私忿行于诏诰中，厚诬丑诋；轼于先帝，不臣甚矣。’”<sup>[3]201</sup>

时至绍圣，朝中政治生态日趋恶化，章惇、林希之流得以大行其道。但即使如此，相关制词仍值得关注。《野老纪闻》<sup>[3]200</sup>载：“绍圣初

(林文节)在外制，行元祐诸公谪词，是非去取，固时相风旨，然而命词似西汉诏令，有王言体，于苏子瞻一词，尤不草草。苏见之曰：

‘林大亦能作文章耶！’”以我们今天来看，是非去取，绝非一句“时相风旨”可以了却，林希其人之德行历史已有定论。我们在这里要着重讨论的是苏轼与遭贬相关的谢表的特点。概言之，有关元祐党人特别是苏轼、苏辙兄弟的谪辞，章惇林希处心积虑，用心险恶，而被贬者只有在谢表中申述与表达自己的立场与态度。所以有关谢表不仅仅关涉相关人员仕途前程，更是性命攸关，所以“尤不草草”。

研究苏轼被贬之后的谢表，我们仍将谪黄与贬惠、徙儋期间诸谢表加以对照解析。首先就心理准备心理感受而言，苏轼对于贬谪黄州和后期流贬岭南海外反应迥别。苏轼被贬黄州，

“其始弹劾之峻，追取之暴，人皆为轼危”(《孔氏谈苑》<sup>[3]57</sup>)，但当其时，上有神宗、太后之重视、庇护，中有王安石、吴充、章惇执正之言，外有司马光、张安平等营救，苏轼面对突降之灾，虽有赴死之念，时有惊魂不定之忧，但只是一场虚惊。与之相应的是，“苏子瞻以诗得罪，贬黄州，责词云：‘黜置方州，以励风俗；往服宽典，勿忘自新。’”(吕陶《净德集》<sup>[3]64</sup>)

“元丰末，移汝州团练副使。制词云：‘苏某谪居之久，念咎已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

(《耆旧续闻》<sup>[3]84</sup>)所以苏轼“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谢量移汝州表》<sup>[1]2590</sup>)乃其贬谪心境实写；而其“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生死中。”(《到黄州谢表》<sup>[1]2582</sup>)“稍从内迁，示不终弃。罪已甘于万死，恩实出于再生中。”(《谢量移汝州表》<sup>[1]2590</sup>)则是苏轼对神宗“出于独断”佑护自己的感恩。

后期苏轼贬惠、谪儋的政治生态与处境心境则与被贬黄州之时大不相同，虽依然是台谏交攻，用心险恶，但更主要的是哲宗挟多年对元祐大臣之积怨，新党挟数年被贬斥疏远之积愤，章惇、蔡卞、张商英、赵挺之辈已沦为地道的政客，对于政事、人事，已无是非之念，而多党派倾轧，挟嫌报复之心，于是林希、蔡卞诸人秉承风旨，在制词中对元祐大臣肆意丑诋。一时间政坛翻云覆雨，黑云压城。相关诏诰集中体现了哲宗朝政坛生态恶化的讯息，所以对于政局将变已有预感的苏轼，其所谓谢表更是“著意之作”。其《英州谢上表》言在元祐朝“掌丝纶之要职”，“凡一时黜陟进退之众，皆两宫威福赏罚之公。既在代言，敢思逃责？苟不能敷扬上意，尊朝廷于日月之明；则何以耸动四方，鼓号令于雷霆之震？故当昭陈功伐，

直喻正邪。岂臣愚敢有于私心，盖王言不可以匿旨。”直陈胸臆，直言担责，毫不回护。至若“瘴海炎陬，去若清涼之地”数语<sup>[1]2822~2823</sup>，更见其直面人生坎坷苦难之凛然正气。其《到惠州谢上表》依然显不怨不悔之志，“伏念臣性资褊浅，学术荒唐。但守不移之愚，遂成难赦之咎。”<sup>[1]2782</sup>其《到昌化军谢表》则言谪贬流离之危难，“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sup>[1]2785</sup>

当我们把关注的视点集中在苏轼被贬谪的谢表上，还发现徽宗登基后苏轼遇赦后的谢表，更为集中地反映了贬所生涯的艰危和遇赦后的欣喜感激。如言贬所危难：

伏念臣顷以狂愚，遽遭谴责。……投畀遐荒，幸逃鼎镬。风波万里，顾衰病以何堪；烟瘴五年，赖喘息之犹在。怜之者嗟其已甚，嫉之者恨其太轻。考图经止曰海隅，其风土疑非人世。食有并日，衣无御冬。凄凉百端，颠踬万状。恍若醉梦，已无意于生还。（《移廉州谢上表》<sup>[1]2827</sup>）

如言使命初至时先是忧惧而后惊喜的心情：

使命远临，初闻丧胆。诏词温厚，亟返惊魂。拜望阙庭，喜溢颜面。否极泰遇，虽物理之常然；昔弃今收，岂罪余之敢望？伏膺知幸，挥涕无从。（《移廉州谢上表》）如言对朝廷感激之情：

悯臣以孤忠援寡，察臣以众忌获愆。许以更新，庶其改过。天地虽有化育之德，不能使臣之再生；虽父母有鞠育之恩，不能全臣于必死。报期碎首，言岂渝心！濯去泥涂，已有遭逢之便；扩开云日，复观于变之时。（《移廉州谢上表》<sup>[1]2827~2828</sup>）

海上囚拘，分安死所；天边涣汗，招许生还。驻世之魂，自招合浦。感恩之泪，欲涨溟波。

……今天子发政施仁，无一夫之失所。凡在名籍，举赐洗湔。俾离一海之中，复至五岭之外，拜天恩之优厚，知圣化之密庸。携挈是破家，航以一苇。蛟鳄潜底，风涛不惊。遂齐编户之民，不为异域之鬼。视偕飞走，施谢乾坤。天日弥高，徒极驰心于魏阙；乡关入望，尚期归骨于眉山。残生无与于杀身，余识终同于结草。（《谢量移永州表》<sup>[1]2831~2832</sup>）

七年远谪，不自意全；万里生还，适有天幸。骤从缧绁，复齿搢绅。（《提举玉

局观谢表》<sup>[1]2787</sup>）

从苏轼这几篇谢表中，我们看到了苏轼用极为简洁的文字对平生遭际的回顾，对贬所生涯的控诉，写出了遇赦后的惊喜和对朝廷的感激之情。揆诸实际，虽语句泣血，语气含哀，均是真情。我们不认为这是表面文章，有哀怜自全之意。因为综观苏轼贬黄州、惠州、儋州等一系列谢表，结合与之相关的谪辞，它们确乎集中反映了朝廷政局的风云变化，谢表更集中体现了苏轼面对危难时的特殊心态，其对人生历程的回顾，简洁扼要；其面对流贬的毅然决然，撼人心魄；其对于贬所艰危的叙写，直言不讳，乃是其七年远谪的真实写照，是我们研究苏轼贬谪生涯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其谢表之价值值得特别关注。

在苏轼研究史上，前人已对此有所关注，虽然切入角度不同，但合而观之，颇能启人思致。储欣评《到黄州谢表》<sup>[1]2586</sup>曰：“此表是公著意之作，字筋句骨，语语圆成，学者所常潜心玩味也。”

学者们在对东坡相关谢表潜心玩味中发现，正因为谢表乃东坡用心措意之文，所以用典使事，颇有警策之句，朱翌《猗觉寮杂记》<sup>[1]2586</sup>卷五曰：

东坡《黄州谢表》云：“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中。”至今脍炙人口。盖用《后汉·袁敞传》张俊语曰：“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当死复生。”

巩丰《后耳目志》<sup>[5]646</sup>评东坡过海谢表曰：

（吕祖谦）先生尝爱东坡谢表云：“臣无毫发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而独来。”萧然出四六畦町之外。

有论者在谢表中看到了时势的艰危，章惇们用心险恶，东坡所面对的艰难，陈天定评《到昌化军谢表》云：“读此而不酸心者非人也。彼僭人者亦已太甚！”（《古今小品》卷二）高塘亦云：“此到军后表。地故在儋耳，非人所居。故篇中写得气象愁惨，不忍卒读。”<sup>[1]2787</sup>储欣更曰：“人非木石，读此谁不废书而泣。”<sup>[5]1137</sup>

有论者从谢表之中看到了东坡胸怀坦荡，直面贬途的凛然正气，王文诰云：

虞策、来之邵等翻腾旧劾各条，公屡有辩奏，可复检也。此则不惟不辨，率性一肩挑回，故云“固当昭陈功罚，直喻正邪”也。盖前之必辨者，原欲留其身以为国，此则已将一片热肠放下，惟有拼此身听其流转、付诸清议而已。可见其立时勇

决也。此状本集不载具官年月，特为补全，俾读之者百世之下，犹见其生气凛然也。  
（《苏诗总案》卷三七《罢定州任进谢上表》  
案语<sup>[1]12826~2827</sup>）

也有论者在品味阅读中，发现东坡谢表警策之句的影响，梁玉绳《清白士集》<sup>[5]1439</sup>卷二十三曰：

东坡《谢量移汝州表》：“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范石湖《甲辰人日病中六言诗》：“人应见怜久病，我偏自厌余生。”元遗山《感事诗》：“人皆传已死，吾亦厌余生。”郭钰《晚眺诗》：“饥寒久已厌吾生。”俱用坡语。

更有论者在东坡谢表及相关诗文与前人的比较中，发现了东坡特有的善于处穷，为人叹服的坡仙风范，洪迈《容斋随笔》卷八《韩公潮州表》<sup>[5]523</sup>条曰：

韩文公《谏佛骨表》，其词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监临，臣不怨悔。”坐此贬潮州刺史。而谢表云：“臣于当时之文，未有过人者。至论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逊。而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考韩所言，其意乃望召还。宪宗虽有武功，亦未至编之《诗》、《书》而无愧。至于“纪泰山之封，镂白玉之牒，东巡奏功，明示得意”等语，摧挫献佞，大与谏表不侔，当时李汉辈编定文集，惜不能为之除去。东坡自黄州量移汝州，上表云：“伏读训词，有‘人材实难，不忍终弃’之语，臣昔在常州，有田租给餧粥，欲望许令常州居住。辄叙徐州守河及获妖贼事，庶因功过相除，得从所便。”读者谓与韩公相类，是不然。二表均为归命君上，然其情则不同。坡自列往事，皆其实迹，而所乞不过见地耳，且略无一佞词，真为可服。

袁桷云：

昌黎公潮州谢表，识者谓不免有哀矜悔艾之意。坡翁黄州谢表，悔而不屈，哀而不怨，过于昌黎多矣。然余尝读岭海谢表，有云：“人皆相传其已死，臣亦自厌其余生。”言至于此章、蔡之罪，可胜数哉！  
（《清容居士集》卷三《跋东坡黄州谢表》<sup>[5]875</sup>）

何曰愈《退庵诗话》<sup>[5]1517</sup>卷四亦曰：

韩退之《谏佛骨》一表，维持圣教，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而贬潮州《示侄

孙湘》诗，乃悲怆作楚囚态。诗与文何相悬殊也。白香山贬江州云：“雨露施恩无厚薄，蓬蒿随分有荣枯。”可谓乐天知命。东坡贬黄州云：“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贬儋耳云：“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作达语。三公皆一代名臣，文章学问，倔强遭际，处处多同。而胸襟则不无少间。

无论是东坡谢表中晚年回首对平生遭际的总结回顾，对贬所艰难生涯的控诉，对遇赦后欣喜感激之情的流露，抑或是后世的论者从其谢表的品味解读中服膺的东坡谢表的警策和特色成就，东坡笔下时势艰危和迁客的苦痛忧伤，以及谢表的影响和与前人相比较而展示的特有风范，这一切都说明东坡被贬期间的系列谢表集中浓缩了丰富的文化信息。

研究东坡人生关键节点的贬谪生涯，使我们的目光聚焦在有关的谪辞和系列谢表上，时隔千年，在对一代文化巨人的贬谪生涯的审视中，我们不仅从相关谪辞谢表中触摸到特有时代的脉动，政坛时势的动荡起伏，政坛各色人物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的去就从违中所显示的人格人性；而且能从其精心结撰的谢表中，真切地感受到苏轼在不同时期被贬的心声心态，其直面贬谪苦难的风范，在作者的心声心画中，我们看到了东坡对于神宗、哲宗的不同态度。东坡的一系列贬谪中的谢表，见时代政坛风云变幻，是其贬谪时期精神人格的浓缩，遣词为文，时见警策，影响当代及后世，值得加以关注研讨。

### 注释

- [1]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 [2]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 [3] 颜中其编注《苏东坡轶事汇编》，岳麓书社 1984 年版。
- [4] （元）脱脱等《宋史·张璪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 [5]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 [6] 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 [7] 司羲祖整理《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 [8]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绍述》，中华书局 2015 年版。
- [9] （清）李铭汉撰、张兴武等校点《续通鉴纪事本末》，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庆振轩，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 苏轼与“离铅坎汞”说

胡金旺

**内容提要** 苏轼与朱熹在龙虎铅汞说中提出了龙汞与坎肾相关联，虎铅与离心相关联这种迥然相异于道教通行的结合。从苏轼算起，在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一个学者对他们的这种组合发表过意见。本文正是有感于此而力求探明苏轼与朱熹这种说法所具有的根据和意义。道教经典《周易参同契》与《悟真篇》都一致认为木火为一家，金水为一家，原因之一在于道教的这种内丹说是以外丹为参照和比喻而言的，另一种依据是对四季更替的顺序所进行的划分。苏轼主要是受到了《难经》将心肺与肾肝相连在一起的影响，而朱熹主要是根据五行“生之序”将同为阳的水、木与同为阴的火、金两两结合在一起而分别提出了离铅坎汞说。

**关键词** 苏轼 朱熹 道教 离铅坎汞 离汞坎铅

苏轼在其《续养生论》<sup>[1] 1984</sup>和《龙虎铅汞说寄子由》<sup>[1] 2331~2333</sup>两篇文章中均阐述了龙虎铅汞说，其主要观点是：“龙者，汞也，精也，血也。出于肾，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者，铅也，气也，力也。出于心，而肺生之，离之物也。心动，则气力随之而作。肾溢，则精血随之而流，如火之有烟，未有复反于薪者也。世之不学道。其龙常出于水，故龙飞而汞轻，其虎常出于火，故虎走而铅枯。此生人之常理也。顺此者死，逆此者仙。”<sup>[1] 2331</sup>苏轼这种说法引起笔者关注的原因并非是这种修炼思想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他将龙汞与坎肾相关联，将虎铅与离心相关联这种迥然相异于道教通行的结合。这种与众不同的结合为笔者所侧目。从总体上来说，苏轼与道教在修炼内丹上都同样强调了坎离颠倒，但是对坎离心肾与龙虎铅汞两两结合上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可以概括为苏轼是讲离铅坎汞（即离铅与坎汞分别结合在一起），而道教中的内丹学是讲离汞坎铅（即离汞与坎铅分别结合在一起）。据笔者所知，古代经籍中只有在苏轼之后的朱熹有与苏轼相同看法（详后），而一般的看法都是沿袭了《周易参同契》（下文均简称为《参同

契》）与《悟真篇》所认为的离铅坎汞的看法（详后），这种看法在道教中已经成为共识。而修炼内丹又主要与道教相关，因而离汞坎铅也就成为通行的说法，苏轼与朱熹的观点就淹没无闻了。学者们在看到苏轼与朱熹的这种说法时对于其中存在的与《参同契》的差异都是采取视而不见、不予理睬的态度。从苏轼算起，在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一个学者对苏轼的这种组合发表过意见，就更遑论对其说法的根据和意义进行探究。苏轼与朱熹难道只是随意一说或是乱点鸳鸯谱吗？本文正是有感于此而对此问题进行穷追深究，力求探明苏轼与朱熹这种说法所具有的根据和意义。

—

我们先来看看《参同契》中的离汞坎铅的结合。

“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鬼隐龙匿，莫知所存。将欲制之，黄芽为根。”<sup>[2] 136</sup>这里的姹女是指真汞，“得火则飞”，表明它是与火关联在一起，只有用黄芽之铅<sup>[3] 159</sup>才能将其制服。在此处，《参同契》将离火汞联系在一起，而在另一处地方，《参同契》明确的将金水、木火划为两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龙虎铅汞说，其言道：“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处，木火为侣。四者混沌，列为龙虎。龙阳数奇，虎阴数偶。肝青为父，肺白为母。肾黑为子，心赤为女，脾黄为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归戊己。”<sup>[2] 140</sup>《参同契》在谈到修炼内丹时将金水相合，木火相并，这正是提出离汞坎铅的基础，因为木是汞，火是离；金是铅，水是坎。金水、木火两两相合就是离汞坎铅。而从四季的角度来看，木火是阳，是奇，而《参同契》提出了龙阳数奇，虎阴数偶，因而就是将离龙汞与坎虎铅分别看成了两家。由此可见，《参同契》是主张离汞坎铅说，而不是离铅坎汞说。

而与《参同契》同被视为道教内丹经典的《悟真篇》在坎离颠倒之说上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其中有言道：“好把真铅著意寻，莫教容易度光阴。

但将地魄擒朱汞，自有天魂制水金。可谓道高龙虎伏，堪言德重鬼神钦。已知永寿齐天地，烦恼无由更上心。”<sup>[4] 18</sup>此处也将水金划为一家。“震龙汞出自离乡，兑虎铅生在坎方，二物总因儿产母，五行全要入中央。”<sup>[4] 55</sup>这句话更是明确点出汞龙出自离火，虎铅生自坎水，将离火汞龙划为一家，坎水虎铅划为一家，即是主张离汞坎铅之说的明证。

《悟真篇》的作者张伯端还在《玉清内丹宝篆》中的《坎离说》一节论述了龙虎铅汞如何颠倒炼丹的问题，他说道：“坎者，肾宫也。离者，心田也。坎静属水，乃坎水也。动属火，乃一也。离动属火，乃离火也。静属水，乃一一也。交会之际，心田静而肾府动，得非真阳在下，而真阴在上乎。况意生于心，而直下肾府乎。阳生于肾，而直升于黄庭乎，故曰坎离颠倒也。若不颠倒而顺行，则心火动而不静，大地火坑之意明矣。”<sup>[5] 116</sup>心田静在于离卦中的真阴之故，肾府动在于坎卦中的真阳之故。真阴下沉，真阳上升，因此，阴阳发生交媾，坎离颠倒，抽下之铅以补上之汞。由此可见，坎离从根本上一定会出现上下交媾的情形在于离卦中的真阴在上要下沉，坎卦中的真阳在下要上升。这就是它们上下交媾的根本动力和原因。当然人由于后天心火易升，坎水易流的原因，又总是阻碍这种先天的上下交媾。因而我们就必须修炼，使得坎水上升，离火下降，而其中的真阴真阳保证了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根本依据。因为这种上下交媾才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从先天保证了人这样做的意义所在。

为什么道教经典《参同契》与《悟真篇》都一致认为木火为一家，金水为一家，原因之一在于道教的这种内丹说是以外丹为参照和比喻而言的。因而内丹的分类就是参照外丹的分类而划出的，即内丹对五行进行相近性的分类标准为外丹对五行相近性的分类标准所决定。就外丹修炼而言，铅汞乃为两种实际的矿物质，或是两类矿物质的代名词。因为铅性易沉，汞性易飞，故此以铅制汞，使其凝结，则铅不沉而汞不飞，而外丹成。就内丹修炼而言，铅汞就是两个比喻。因为心火易升，故以汞喻之；肾水易流，故以铅喻之。心火上升，则人之妄念迭起，元神不安；肾水下流，则人之情欲不节，败精伤炁。必得使心火下降，薰蒸肾水，使其与心神为一，化炁而上升，则心火不升，而肾水不流。如是则心肾相交，水火既济，神炁合一，生命可以自主。所以，《参同契》所说修炼内丹中的龙虎铅汞颠倒之说是以外丹作为参照和比喻而言的。心火易升与汞轻易飞，肾水易降与铅重易沉两两具有相似性，因而道教的修炼内丹将它们关联在一起。于是，木汞龙离火心与金铅虎坎水肾分别结合为二家成为道教普遍接受的分类，概言之，即为离汞坎铅。

以上的论述表明《参同契》的根据之一就是仿

照外丹而提出了内丹的修炼，因而将木火与金水分别联系在一起。其实《参同契》五行的分类还有另一种依据四季更替的顺序所进行的划分。根据束景南先生的研究，《参同契》中实际隐含了周敦颐太极图的雏形，其中所论述的坎离交媾与五行内部之间的关系就是太极图的第二层与第三层的图形文字说明<sup>[6]</sup>，这两层图形即是水火匡廓图与三五至精图。因此笔者赞成束先生关于“原本《周易参同契》或徐从事注中有‘水火匡廓图’等道图是完全可能的，毛奇龄说见到过一种彭晓注本的《周易参同契》本子中有‘水火匡廓图’并非虚言”的说法。退一步讲，即便《周易参同契》没有太极图核心部分的水火匡廓图和三五至精图，其文字也隐含了这样的图形。因而周敦颐即便没有看到这样的图，也可以根据其文字说明而将此图画出来。换言之，即便太极图是周敦颐的原创，而不是改易他人之图而来，但也是受到《参同契》的启发而创造出来的。

如果我们认可了《参同契》内在地隐含着周敦颐《太极图》的雏形，则我们就可以依据朱震在《汉上易说》中所提到的周敦颐太极图而认为在《参同契》中包含两种类型的五行观。一种是按照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的顺序而排列出的水、火、木、金、土的五行顺序，这也是从《吕氏春秋》以来所提到的五行观，即三五至精图中从外围右上角的水开始以逆时针方向连成一圈，最后到达中间土的五行观。另一种五行观就是从左侧开始往上，即从木到火，到中间的土，再到右侧的金，然后又往上到达水连成一线，这就是与四季相对应的五行观。而被朱熹改易的三五至精图将水木的连线绕过土，并没有改变原图包含了两种五行观的实质，更不能说这种改变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一种与四季顺序对应的五行观，而原图是没有这种五行观的<sup>[7]</sup>。其实，朱熹改易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土处在木火与金水之间，与它们一样是一种线性的并列关系，这种土对应的是长夏。而朱震所献的原图认为土是寄王于四季，与四季是各个相联的关系。二者根本的区别是前者为了使得四季与五行相配，而增设了一个长夏的季节；后者将五行的关系处理成土可以与其他四行各个结合，最终也能使五行与四季相搭配。

以上的论证表明，无论是朱熹的改易图还是朱震的原图都包含了两种五行观。朱震的《太极图》也同样包含了与四季相配的五行观，这种五行观同样也是隐含在《参同契》的文字之中。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太极图》与《参同契》所表达的思想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

《参同契》将三五至精图中的左侧木火看成一家，将右侧的金水看成一家，土又看成一家。这就是三五，它们都归向虚无之圈<sup>[6]</sup>。而这左右两组又是与第二层水火匡廓图的左右两边是一一对应的，

即木火对应于离卦，金水对应于坎卦。《参同契》正是以这种与四季对应的五行顺序，即以上所分析的两种五行顺序中的第二种为基础提出了龙虎铅汞说。将木火划为一家，因而将离汞相连；金水划为一家，于是坎铅相连。其组合可以概括为离汞坎铅，形成道教内丹修炼史上通行的看法，而苏轼与朱熹的组合是离铅坎汞，与流行的道教组合形成鲜明的对照。

综上所述，《参同契》提出的龙虎铅汞说既参照了外丹的术语和分组，也依据了五行观中与四季相对应的木火土金水这种五行顺序。

## 二

下面在道教龙虎铅汞说的背景下看看苏轼与朱熹看法的依据。首先的依据应当就是前文所分析的《参同契》所蕴含的第一种五行观，即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水、木为天所生，看做一家；火、金为地所生，看做一家。这样火、离、虎、铅成为一组，水、坎、龙、汞成为一组，于是就形成了离铅坎汞说，这可以看做苏轼与朱熹提出这种说法的共同依据。

以下再分别探讨他们所提出这种学说的其他依据。首先看看苏轼的依据，事实上，苏轼在其论述中并没有对离铅坎汞如此组合的原因做出任何解释，即为什么龙出于肾，而不是出于心；虎出于心，而不是出于肾。从木龙（木龙与铅虎分别结合在一起的解释详见本文第四部分）藏于肝<sup>[8] 35~36</sup>而出于肾来看，苏轼将肾肝相联在一起，与此相同也是将心肺相联在一起。这种关联与《难经》中将它们两两关联是一致的。有关心肺与肾肝的关系，《难经》说道：“四难曰：脉有阴阳之法，何谓也？然：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呼吸之间：脾受谷味也，其脉在中。浮者阳也，沉者阴也，故曰阴阳也。心肺俱浮，何以别之？然：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涩者肺也。肾肝俱沉，何以别之？然：牢而长者，肝也；按之濡，举指来实者肾也。”<sup>[9] 8~9</sup>“十二难曰：经言五脏脉已绝于内，用针者反实其外：五脏脉已绝于外，用针者反实其内。内外之绝，何以别之？然：五脏脉已绝于内者，肾肝气已绝于内也，而医反补其心肺；五脏脉已绝于外者，其心肺脉已绝于外也，而医反补其肾肝。”<sup>[9] 75</sup>“三十二难曰：五脏俱等，而心肺独在膈上者何也？然：心者血，肺者气。血为荣，气为卫；相随上下，谓之荣卫。通行经络，营周于外，故令心肺在膈上也。”<sup>[9] 72</sup>在《难经》看来，心肺是呼出，俱浮，是阳；而肾肝是吸入，俱沉，是阴。因此心肺为一家，肾肝为一家。

《难经》这种看法对熟悉它的苏轼肯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以至于在龙虎铅汞说中采用了这种说法，而认为铅虎出于心，而实藏于肺，它们都是阳，是

呼出，是上浮的，如果不加控制就可能出现心外放的情况。而汞龙出于肾，藏于肝，它们都是阴，是吸入，是下沉的，如果不加节制，任由它们放任自流，则坎液外溢。这就是常人的行为，就不能达到养生的目的，在苏轼看来就是“死之道”<sup>[1] 1984</sup>。因此必须对这种放任的情形加以节制，修炼内丹，使得坎离交媾，才能实现“长生不死”的梦想<sup>[1] 1984</sup>。而《难经》本身就是一部医书，因此遵循它的说法与养生的目的是致的。气上浮与坎液外泄是常人的行为，必须颠倒才能实现修养的目的。与《参同契》等道教经典相比，它们也是认为气在上，所不同的是《参同契》等一律主张龙汞气，而不是铅虎气。苏轼之所以认为是铅虎气，根本上是由于同意了《难经》中肺金与心一样是阳是上浮的看法。从苏轼对《难经》的推崇来看，苏轼龙虎铅汞说接受了《难经》的影响而提出这种看法的可能性非常大。苏轼在《楞伽经后》中写道：“心品祖师达磨以付二祖曰：吾观震旦所有经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以为心法。如医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后世达者神而明之，如盘走珠，如珠走盘，无不可者。”<sup>[1] 2085</sup>从这篇文字可见，苏轼对《难经》的熟悉与推崇。加上他精通医学（苏轼有传世的医学著作《苏沈良方》，可证明他在医学上有相当造诣），他将医学知识与内丹修炼融会贯通是完全可能的事情。所以，苏轼将心肺、肾肝两两相连，基本上可以确信其龙虎铅汞说是受到了《难经》的影响。

## 三

朱熹在评价《参同契》中的几对概念的时候说道：“坎离、水火、龙虎、铅汞之属，只是互换其名，其实只是精气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龙也，汞也。气，火也，离也，虎也，铅也。其法以神运精气，结而为丹。阳气在下，初成水，以火炼之，则凝成丹。”<sup>[10] 3002</sup>在此朱熹将坎龙、水木与离虎、火金分别相联。从前文对《参同契》的分析看，很显然这只能代表朱熹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参同契》实际的观点。朱熹的这种看法与《参同契》不同，而与苏轼所见相同。从另外两则朱熹与门人的对话我们可以推测出他之所以这样认为的根据。

在注解《周子通书》中，朱熹说道：“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质具于地，而气行于天者也。以质而语其生之序，则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阳也，火、金，阴也。以气而语其行之序，则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阳也，金、水，阴也。”<sup>[11] 3002</sup>朱熹在此谈到了两种五行观。从“生之序”而言，五行的顺序就是水、火、木、金、土。其中水、木是阳，火、金是阴，它们分别结合在一

起，这与其上所认为的离铅坎汞之说中将水木、火金分别相连是相同的。因而可能朱熹正是从五行“生之序”的角度将水木、火金分别相连而提出了离铅坎汞说。这种五行顺序也是朱熹与苏轼的共同依据，这一点在前文已做了简要交代。

至于为什么水木是阳，火金是阴，朱熹在另一处对话中做了解释。他说：“问以质而语其生之序则曰水火木金土，而水火阳也，火金阴也，此岂就图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谓之阳，火金何以谓之阴。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阳也，二四阴也。”<sup>[12]</sup>卷四十九 朱熹认为水木为阳，金火是阴的依据就是水木为天所生，金火为地所生，而天为阳，地为阴。而在以上所引的第一则对话中，即朱熹提出的龙虎铅汞说中，他所说的“阳气在下，初成水，以火炼之，则凝成丹”，也是认为水木为阳，金火为阴。因为肾水在下，说“阳气在下”，此阳气正是指肾水。由此可见，以上三则对话形成了一个阐述离铅坎汞说完整的论据链。

从朱熹的观点中，我们仍可以揣摩出他提出这种与道教有分歧看法的理由。其关键所在就在上面所提到的“阳气在下，初成水，以火炼之，则凝成丹”这句话中。为什么水木为一家，是阳；火金是一家，是阴。就是因为将在下的坎水与木龙看作阳，则其阳的本性必然要上升；同理，将在上的离火与金虎看作阴，则其阴的本性必然要下降。在上的下降，在下的上升，必然会发生上下交织的情形，这就是坎离交媾，凝而成丹。所以这种将水木划为一组，火金划为一组的观点更能够表明从先天和本性上讲人是一定会发生坎离交媾，结成内丹。只是由于人后天欲望的扰乱，我们总是心火太盛，坎精外泄，因而我们总是难以回复到先天的状态实现龙虎交媾，坎离颠倒。所以，从后天要回复到先天的角度讲，我们必须修炼，祛除内心不当和过度的欲望，回到我们所具有的本来状态。从哲学先天与后天的角度讲，朱熹这种看法是非常有道理的，而且说明了人的本性是善的，本性是可以炼成内丹的。只是由于后天欲望的破坏，人的本性就被淹没了。这种看法与儒家人性本善的看法完全合拍，也是朱熹自身思想的体现。

#### 四

以上所论述的无论是《参同契》的离汞坎铅说还是苏轼朱熹的离铅坎汞说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在金虎与木龙相联上它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因为这种关联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已经成为一种常识。它的来源就是二十八星宿中的四神兽之说，东方七宿为苍龙，西方七宿为白虎，而东方是木，西方是金，所以就形成了木龙、金虎两两的结合。这种说法在《淮南子·天文训》中有明确记载：“何谓五

星？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西方，金也，其帝少皞，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为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sup>[13]</sup>  
<sup>[108]</sup>可见，古代中国文化中东方为木为苍龙、西方为金为白虎的结合最迟在《淮南子》中以文字的形式得以固定下来，因而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成为大家的共识。

与金虎与木龙已经成为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常识相同，虎铅与龙汞也是习惯性地联系在一起<sup>[14]</sup><sup>[13]</sup>。这样木龙汞与金虎铅就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搭配。因而以上所论述到的无论是《参同契》还是苏轼、朱熹的龙虎铅汞之说在木龙汞与金虎铅之相连属上都是相同的。

比较苏轼、朱熹与道教在龙虎铅汞上的差异，可以看出，虽然苏轼是从后天的心肺上浮的特性而认为它们是阳，与朱熹从先天讲它们是阴不同，但都认为后天在上者易浮，在下者易沉，因而强调了要改变这种放任自流的后天特性，实现坎离交媾，凝而成丹。这也是以《参同契》、《悟真篇》为主的道教思想同样主张的思想，即从后天来讲，心火易升，肾水易流，只有勤加修炼才能改变此种现状，提升人格境界与生活品质。

而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朱熹从金火为阴，木水为阳的角度将它们划分为两家的观点最有哲学的深刻性和儒家精神的意蕴。与坤上乾下上下交通才是泰卦一样，在上的阴火金与在下的阳水木也由于阴上阳下才能做到上下交通，当然这是从先天来讲的。但是后天的气又是往上，这样必须回到先天才能产生离坎交媾的现象。《悟真篇》也讲交媾，但只是离中的阴爻下沉使得火下沉，坎中的阳爻上升使得水上升，从而形成上下交通。这样就没有朱熹将火从整体上看作阴必定下沉，水从整体上看作阳必定上浮形成上下交流那么明显和令人信服。而就苏轼的依据而言，从其说可见出修炼内丹与中国古代医学以及心性论之间的关系，因而有学术史的意义。

以上论述的是三家龙虎铅汞说的特点及优长，我们再来看看三家学说分歧的学术意义。从前面对三家学说的论述可以看出五行内部的分组并非铁板一块，根据不同的需要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五行的金木水火土进行两两不同的分组。《参同契》是将木火看做一家、金水看做一家，而苏轼与朱熹是将金火分成一家、木水分成一家，并以此为根据提出自己的学说主张。由于作者所持根据的差异，五行出现不同情况的分类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而可以说，只要这种说法是合理的，也未尝不是一种值得重视的主张。就汞龙铅虎说而言，各家虽然根据有异，对五行的分类不同，但是都强调了离坎交媾，上下交通。（下转第 56 页）

# 论苏轼的反贪与自净（下）

彭林泉

**内容提要** 作为一个官员、诗人和知识分子，苏轼主张反贪，在实践中查处了一些贪官污吏，对曾识拔父亲而后来因受贿而助恶的人长期不提名，这构成了他政治革新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他的民本思想和正直性格有关，更体现了他的反贪文化。同时，苏轼有很强的自净意识和自净能力，以及相对合理的自净结构，使他成为一个勤奋、务实和干净的官员。苏轼的反贪与自净密切相关，在他身上得以和谐的统一，成为他一生为官唯民的真实写照。这对于当下的反贪腐和推进廉政建设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关键词** 苏轼 反贪 自净 廉政 文化

## 三、苏轼的自净

与此相关联的是苏轼的自净。

“自净”一词，出自苏轼的诗《如梦令》（自净方能净彼），即“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这是元丰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苏轼在洗浴时所作。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一首（后一首），另（前）一首词为《水垢何曾相受》，两者词意大致相同。苏轼在序言中说：浴泗州雍熙塔下，作《如梦令》。此曲本唐庄宗制，名《忆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盖庄宗作此词，率章曰：“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因取以为名。这不仅是曲名的修改，更表现了苏轼的意趣。我国学者认为，此词以巧妙诙谐的手法借用禅宗思想和禅宗公案来表现自己高洁的人格，同时蕴含直至心灵本体的审美的人生方式。苏轼所以能够建立这样的人生方式，除了儒家、道家两家的积极影响外，禅宗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13〕495

这里把自净引申出来，意指自我干净或净化，作为他廉洁或廉政的一个重要概念，同时也延伸出自净意识和自净能力等概念，并展开

分析，进一步分析苏轼的自净结构，与苏轼的反贪相结合，以展现全貌。

苏轼是个清官，从未以权谋私，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是那些打击、排斥、攻击、诬陷、迫害甚至想置他于死地的人，也找不到他的不廉洁之处，拿“贪”说事，以廉洁问题来抹黑他；连对他的政治态度持有异议或过去反对、攻击过他的朱熹大儒，在经历晚年的党争折磨后，也一反攻击苏轼的常态，赞赏苏轼的操守，或转而推崇苏轼。我国学者王春瑜在读了《中国反贪史》之后感叹，贪官污吏何其多，清官何其少，改革家怎能忘记赃乱死多门。<sup>〔2〕1-8</sup>苏轼就是这样一个属于“何其少”的清官，尽管人们对清官的内涵有不同的解释。

从自净的角度说，苏轼具有自净意识和较强的自净能力，自净结构是相对合理的，或者说自净要素也是较完备的，这使他成为一个循吏和能吏，以今天的眼光看，是一个忠诚、勇于担当、勤奋、务实和干净的官员。

### （一）苏轼的自净意识

如前所述，苏轼在“自净才能他净”这首词中，提到自净与他净的关系，对自我来说，首先是要自净。这是他净的前提和基础。

他在诗文中，多次谈到廉政问题。如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先圣之贵廉也如此》这篇赋中，以周代用人六事为切入点，对官员的廉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六事指善（善良或善心）、能（能干或才能）、敬（恭敬或敬业）、正（正直或公正）、法（守法）、辩（明辩或辩是非）。苏轼认为，朝廷通过官吏的六事考察，都应当冠以“廉”字，正所谓“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朝廷当先以这六事制定标准，并用这样的标准选用人才，又根据这样的标准和表现任用官员。不仅如此，朝廷还应当以这六个标准作为官吏的行为规范，教育教训官员队伍，使他们明确了解、把握这些规范行为的操守、准则，使他们砥砺节操而勤政履职。同时还要严明纲纪，制

定奖励的措施，惩恶扬善，奖励先进，树立良好的为官、治吏的风尚。他提出了“贵廉”的主旨：“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这已成为一句至理名言；“绩效皆烦，清名至美。故先责其立操，然后褒其善理。是以古者之治，必简而明，其术由此。”

苏轼实践这一思想。他视富贵如浮云。嘉祐五年（1060），苏轼与弟苏辙在怀远驿站立下了及早退隐的誓言。本来，入仕是为了实现人生的理想，在当时，这是读书人的一条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路径。刚入仕，就有退隐的念头，这对于一个有理想抱负的年轻人似乎不好理解，但这是事实。苏轼一向把荣华富贵视同天上的浮云。嘉祐六年（1061）冬季，二十六岁的苏轼离开汴京赶赴凤翔任所，刚刚踏上仕途的苏轼在郑州西门外与弟弟苏辙挥泪告别，想起夜雨潇潇，便写下了一首诗：“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莫苦爱高官职。”告诫兄弟不要贪恋高官厚禄，体现了一种高洁的情怀。后来，他与苏辙又在官场相遇，彼此提醒在诗中曾有此“风雨对床”之约。

这决非投机的表现，恰恰相反，体现了苏轼的正直、刚烈和勇行的品格和独立精神。过去有人指责苏轼是投机派，这与事实严重不符。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sup>[4] 912</sup>中回忆熙宁间的往事说：“是时王安石变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自惟远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负心，欲具论安石所为不可旅行状，以裨万一。”究其原因是“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元祐三年（1088），苏轼在所上的《乞郡札子》<sup>[4] 827</sup>中，回顾了元祐初年的形势：

恭惟陛下践祚之始，收臣于九死之余。半年之间，擢臣为两制之首。方将致命，岂敢告劳。特以臣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致使台谏，例为怨仇。臣与故相司马光，虽贤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骤迁，在于人情，岂肯异论。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实以为未便，不免力争。

这种拙于谋身、锐于报国的情愫，这种只考虑国家利益而丝毫不计个人得失的情怀，正是苏轼政治品质中最为耀眼的闪光点，而受人称颂。苏轼以平淡、从容的心态看待官职的升迁或黜降，真正做到了“得何足喜，失何足忧”？这与他的循理无私有关，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进行分析。

在杭州期间，在为太守的诗写序中，说“求官”的目的在于得，否认这一点是虚伪的。但“得”与“道”发生矛盾时，不要为了得到高

官厚禄，就放弃自己所学的“道”。苏轼“有作犹非圣，无私乃是天”（《大行太皇太后高氏挽词二首》）<sup>[14] 1977</sup>，“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思无邪斋铭》）<sup>[4] 574</sup>，“自江徂海，浩然无私”（《洞酌亭》）<sup>[14] 2366</sup>。苏轼病逝世时，只有随身的三本书，即《东坡易传》、《论语说》、《书论》，而无多少财产。

## （二）苏轼的自净能力

自入仕为官以来，苏轼有很强的自净能力。这里仅就苏轼的为官与用权，酒、诗书与性，收入与住房三个方面作一分析。

### 1. 为官与用权

苏轼为官数年，既有在朝廷工作的经历，也有在地方工作的经历。其中，在地方任的时间为13年半，超过在朝上的时间。他先后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登州，颍州、杨州、定州等地担任签判、通判和知州，凤翔签判的时间最长，有三年之久，登州知州时间最短，到任五天便奉命调离。也就是说，先后任过杭州、密州、徐州等八个地方的太守，三个州的佐官副职，官至吏部、礼部、兵部上书，还任过端明殿学士、龙图阁学士、知制诰等，大到三品大官，相当于现在的部级。从官职的分类来看，苏轼任过行政、司法和军事官员，拥有一定的公权力。如在地方，当过兼职的司法官，作过专门的司法官，如开封府推官、大理寺评事、知登闻鼓院等。在使用这些权力时，苏轼很慎重，从未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诚如有人所说，在此期间，都是清正廉洁、两袖清风的。“即使有些积蓄，也是用于捐资修桥、施善他人，救济朋友等，以至于在难、贬谪时身无分文，靠朋友接济！”<sup>[15] 49</sup>

在用人上，苏轼从未以权谋取私利。苏轼在《上仁宗皇帝书》中提出，当务之急是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这涉及用人的问题。在用人方面，苏轼很谨慎。有一个挚友请苏轼在定州给某人安排一个官职，苏轼给他讲了一个笑话：有个人穷得没法了，就去盗墓。费了好大力气挖到棺材，却看见一脸饥色的人裸身坐在棺材里，对他说：“你没听说过这叫首阳山吗？我是饥死的伯夷，哪有财物给你呢？”盗墓者悻悻然，只好往别的地方去挖，刚挖了一半，前天裸坐在棺中的伯夷从后面拍着他的背劝道：“别挖，别挖，这是我弟弟的墓，也没有油水。”<sup>[3] 133</sup>他在《与李方叔书》<sup>[4] 1420</sup>中，回绝了求官之约，告诫：“深愿足下为礼仪君子，不愿足下丰于才而廉于德也。”李方叔与苏轼有多年的交情，但还是被拒绝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轼也推荐有才识的人，如秦观。有人认为，一般人有词才，

而秦观有词心，这很了不起。苏轼欣赏他的才华，希望他有所作为。元丰七年（1084），苏轼量移汝州，到南京拜见王安石，后来在致王安石的一封篇幅较长的书信中，明确地向王安石极力推荐秦观，表彰秦观的几大优点：“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习医药，明练法律”（《与王荆公二首》其二）<sup>[4] 1444</sup>。苏轼深知王安石的影响力巨大，只要他肯在公开场合夸赞秦观几句，世人就会重视秦观的才华和品德。经苏轼的揄扬，王安石的赏识，后来，秦观考上了进士。宣仁太后执政后，回到朝廷的苏轼推荐秦观，把他从外招回京城做事，这很不容易。秦观病逝后，苏轼很伤心。

与那些做官捞钱，做更大的官就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不同，苏轼做太守的时候，从未卖官，不然的话，怎么会“俸入所得，随手辄尽”呢？事实上，在当朝担任重臣期间，有人送他锦帛好礼与茶叶，苏轼除留一包茶叶外，如数退还当事人，以婉谢。贵重的礼品、赠品，苏轼也坚持不收。他在给友人范纯夫的书札中说：“三辱示谕，鄙意不移。公休之馈，人子之心也。不肖之辞，夙昔之分也。某已领其意而辞其物，物有齐量，意岂有穷哉！昔人已聘还圭璋，庶几此义。”（《答范纯夫十首》其二）<sup>[4] 1454</sup>当然，在贬谪期间，也接受好友的生活接济，以艰难度日。

在项目建设上，苏轼从不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索贿受贿。在徐州，在抗洪获胜后，苏轼为了确保徐州的长治久安，向朝廷递交了修建徐州防洪大堤的计划与预算报告，争取资金。第二年，朝廷给徐州拨款两千四百一十万钱，准许徐州动用地方财政六百三十四万钱，米一千八百余斛，用工三千二十人，修筑大堤。

（事载苏轼《奖谕敕记》）。苏轼将所拨的资金全部用于水利工程。八月中旬，徐州防洪大堤竣工，苏轼特别在大堤旁修建了一座十丈高的楼台，取名黄楼，成为一个见证和景观。

在杭州西湖整治工程中，花了多少钱？据《宋史》记载，总共花钱一万缗、粮一万，外加剃度僧人一百份，这实际上也是钱，这个工程概算可能是苏轼上报的，有些保守，实际花费要远远大于这个数。但苏轼全数用于工程建设，没有发现有御史对苏轼不廉洁的检举。这为其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官声和民心。

无论是抗灾还是向上要钱要物要政策，或者通过别人争取的钱物，凡是经他之手的钱财，他从未以权谋取私利，在工程项目和用人上搞权钱交易，总是公正地、慎重地行使权力。在

惠州，他甚至不顾官场忌讳，通过表哥程之才，向上要钱，用于兴建民生工程（桥和路）。他将赏赐的钱物捐出，还写信求弟媳史夫人捐钱。

## 2. 酒、诗书与性

苏轼喜欢喝酒，但酒量不大。在《书东皋子传后》中，他写道“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五合等于半升，宋朝一斗将近6000毫升，半升相当于3000。他喝的也是低度酒，稍饮辄醉。他说“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但他深得酒中之理，曾说：“吾酒后乘兴作数十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出。”酒对于他的艺术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名词《水调歌头》就是在大醉后产生的。

苏轼酒后写的书也多有变化。这从苏轼书写的《大江东去》越写越潦草，可以看出。苏轼也喝醉过，在贬谪期间，也失态过，甚至在城门下睡觉，没回家的事。

但他喝酒不乱性。在酒、诗书和性这三者之间，苏轼从未迷失在情欲中。在宋朝，是相当开放的。苏轼先后有两位妻子一位侍妾，并且在杭州等地与宗教、和尚和女人（包括妓女）交往。应歌妓的要求，他提笔在其披肩上或纨扇上写诗，诸如“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之类。林语堂先生说，对于苏轼而言，他之不能忘情于女人、诗歌、猪肉、酒，正如他之不能忘情于绿水青山，同时，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会染上浅薄尖刻、纨绔子弟的习气。因为他深究儒学，故也不能为醉汉。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也对生活太珍惜，自然不愿把生活完全消耗于醇酒妇人之间。他是爱自然的诗人，对人生抱有一种健康的神秘看法。

苏轼对性持开放、快乐和诙谐的态度，常拿性的问题与朋友开玩笑。在《东坡志林》中，他记述了一个笑话：

太守杨君素、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坐中论调气养生之事。余曰：“皆不足道，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啮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穷居海上，而况洞房绮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为录之。（《记张公规论去欲》<sup>[4] 2375</sup>）

这里的“啮雪啖毡，蹈背出血”，指苏武的故事。此时，苏轼在黄州，过着被贬的生活。对于养生，在苏轼看来，其他的都不重要，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是祛除欲望，这里的欲望实指的是性欲。过去他有过“皓齿娥眉，伐性之斧”之说，对欲望持消极和敌对的态度。这时

苏轼的态度有了改变，他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人的性生活的，他“爱其语有理”中的理在于，即便以牧羊为生、和饥寒相伴的苏武，解决性的问题也是生存之需，是人之常理。至于苏轼对此的回应，这一小记中没有记载，可能是出于对新死之人的忌讳或者是什么目的，尚待进一步的考证。

### 3. 收入与买房

北宋官员的“月俸”包括货币、粮食、绢、薪、蒿、炭、盐、茶、纸等物品。“奉录自宰臣而下至岳渎庙令，凡四十一等。”其中货币收入，最高的“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最低的吏大约每月货币收入为 500 钱。<sup>[6]</sup>王安石变法时，为了反贪腐，还提高了官吏的薪酬。苏轼在地方任上和朝上的收入并不低，属于高收入群体。以凤翔、杭州和密州三地的收入为例。

苏轼任凤翔签判时，每月薪水 20 贯，此外还有 400 亩的职田，出租给佃户，每年收租大约在 800 贯左右。这两项加起来，他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了 1000 贯。苏轼任杭州通判，月薪涨到了 30 贯，职田增加到 700 亩，年收入大约在 1800 贯左右。苏轼知密州时，薪水又涨了一次，年收入已经超过了 2000 贯。这个收入水平在北宋是很高的，意味着他存上年钱，买房是不成问题的，或能在京城买一所花园住宅，可是他在这三个地方都没有买房，借住在官府。

从苏轼一生的经历来看，他只购买过一套房。1084 年，苏轼将近五十岁时，为了让家人有个安身之所，在江苏宜兴买下第一所房子，也是最后一所房子。这回他跟他的父亲苏洵一样付不起房款，只好向身居高位的弟弟苏辙借了 7000 贯。实现了过去想在常州居住的愿望。他买房少、时间晚，且不在京城和曾经任职过的地方买房，最终病死在别人家里。

当时，汴京（开封）的房价高，就是像欧阳修这样的高官，也买不起住房。他一钱不取，一文不贪，跟白居易一样带着一家大小，在背街小巷租房子住。他在诗中写到：“嗟我来京城，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间。”苏轼有钱时，买得起房，至少在有的地方买得起房，但没买，似乎没有兴趣或觉得不合适，他的收入用于何处呢？经梳理，主要用于三个方面：

一是用于还父亲买房的债和父亲的收藏。嘉祐六年（1061）二月，苏轼与苏洵、苏辙等人抵达京城，暂住西冈，不久迁杞县城南居住。苏辙后来对此作了解释，他在《辛丑除日寄子瞻》中说：“居梁（开封）不耐贫，投杞（杞县）避粮覈。城南斋痒静，终岁守坟籍。酒酸

未尝饮，牛美每共炙。”林语堂先生说，他们买了一栋房子，附有花园，约有半亩大，靠近宜秋门。其实，不是他买的，是苏洵借钱买的。在京城开封宜秋门外，苏洵花费 8000 贯买了这栋漂亮的花园住宅。当时，苏洵每月只有 7 贯铜钱的收入，靠他的收入远远买不起这所住宅。主要是跟二哥苏涣借钱，苏涣进士出身，时任利州提刑，官位和收入远远高于苏洵。苏轼把自己在凤翔的收入，用来替父亲还购房的债了。还用于苏洵的收藏。苏洵虽为布衣，但喜欢名画。苏轼在凤翔任上曾以“钱十万”，购得吴道子的“阳为菩萨，阴为天王”的四块门板，献给他的父亲。在苏洵收集的一百多幅画中，此“为甲”。

二是用于家人和亲戚的生活开支。苏洵在逝世前，向苏轼兄弟交待，长兄苏澹早亡，子孙未立，要他们照顾。与杜垂祐结婚的姐姐，死后尚未安葬，要他们安葬等。苏轼兄弟依遗言执行。苏轼在杭州任上，与他一起生活的有妻子和儿子，奶妈任采莲，以及他的侄媳妇和两个侄孙。苏轼是个很看重亲情的人，苏轼后来得知某个堂姐死了丈夫以后，还慨然承担了供养堂姐及其子女的重任，直到堂姐的女儿出嫁，都是他出钱做的嫁妆。慷慨好施的苏轼靠一人之力养活了一大群亲戚。开销太大。

三是用于济贫。密州发生瘟疫，穷苦百姓没钱买药，苏轼捐出 50 两黄金，在密州城里建了好几所福利院，免费给百姓治病。在知杭州期间，建立公立医院。苏轼调拨杭州地方财政一千缗，又自掏腰包五十两黄金，在杭州城区建立了一个医馆，也就是公立医院，免费为群众看病治病。医院所需钱粮由杭州府筹集，医院的医生、人员的工资也由杭州府支出。有人说，这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件很具开创意义的事，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五十万黄金也不是小数目。苏东坡做官时，收入全靠俸禄，相信家里不会有太多的积蓄，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这一方面说明苏东坡修建公立医院的心情是迫切的，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苏东坡仗义疏财的文人性格，透露出他看淡钱财的金钱观”。

可以说，他的收入主要用于亲人和穷人，他是先人后己的绅士，是伟大人格的典范。

在贬谪后，薪水不断下滑，职田也被没收，就算他想买房，也已经买不起了。在贬谪期间，也修建过三次住房。苏轼在黄州期间，在东坡盖房五间，由于竣工时正下大雪，于是题名为“雪堂”，以安身度日。在惠州，王朝云在嘉祐寺病倒后，苏轼得知北归无望后，决定在白

峰山上修建住房。在此地盖起的住房是一个南方园林庭院，有二十多间，环境优美，苏轼很喜欢，但住了没有多久，就被贬谪到更偏僻的地方。刚到海南时，苏轼住在一个破败的官屋中，不久被撵出。在当地贫寒士人黎子云兄弟的慷慨帮助下，苏轼建起了桄榔庵，暂时解决了住房问题。

### （三）苏轼的自净结构

在笔者看来，苏轼的自净结构涵盖素质、知识、能力和经验，是相对合理的，结构要素也是相对完整的，换言之，苏轼具有知识、能力、经验、人文修养、廉洁自律的道德品质、价值观念，这使他成为一个廉吏、循吏。考虑到前文已对苏轼的自净能力作了分析，这里着重分析他的自净知识、经验和价值观念。

#### 1. 对法律及惩治赃罪规定的熟知，使苏轼具有自净的意识

通常知识包括通识和专识。由于自净涉及廉洁问题，从自净来看，很重要的一点是关于法律以及惩治赃罪或贪官污吏的法律规定了解。苏轼在《戏子由》一诗中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过去对此存在误解，以为苏轼读书不读法律，其实不然，这是对子由说的。批评子由，子由到晚年，也说自己耻于读律，说明苏轼说的是对的。苏轼所说的从法律的角度看出，苏轼也是个法学家，不仅有法律意识，而且在诗文中对法律提出了不少深刻见解。对惩治贪官污吏或治官员赃罪的制度规定，也是熟知的。宋朝存有对贪污贿赂犯罪的严惩。宋朝的立法基本沿用唐律，但又有自己的特点：一是对贪污行为的防范和惩治更加严密，如《宋刑统》除了重申唐律对贪污行为的规定外，还利用“准敕”、“臣等参详”的形式，加强了对赃罪的法律规定，以“枉法赃”、“不枉法赃”两条为例，《宋刑统》在照录《唐律疏议》的相应条文后，连附五条“准敕”和一条“臣等参详”。二是对赃罪官员实行连坐制。官员犯赃罪，追究举荐者的连带责任。三是制定了严厉的惩治贪污的单行法规。如宋代有颁行于神宗熙宁三年（1070）的“诸仓丐取法”，该法规定：“应受千仓界并粮纲钱物，并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一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过致并与者（指帮助仓吏运送钱粮的人和参与者），减首罪三等。徒罪配五百里外牢城，满罪皆配千里外，满十年即受赃为首者配沙门岛。若许赃未受，其取与过致人，各减本罪一等，为首者依上条内合配沙门岛者，配广南牢一城。”<sup>[16]</sup> 赃满二千钱即流二千里，

比刑律中的监守自盗五十匹判流二千里要重得多。后来此法又扩展到许多部门，如中书、审官东西三班院、枢密院、三司府、开封府等，“受贿者皆以仓法论”。苏轼对这些法令熟知，具有这方面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可以说知法懂法守法，增强了自净意识。

#### 2. 对言官制度的认知与恶劣的政治生态，使苏轼自觉抵制不廉洁的经验

在宋朝，御史和谏官合称言官，宋太宗曾立下誓碑，不杀言事官，使监察官无性命之忧，敢于大胆进谏弹劾，因此，宋代的官场风气较其他朝代相对清廉、贪污贿赂之风有所收敛。<sup>[17]</sup>

<sup>[17]</sup> 尽管在某一时期也比较严重。宋代的监察制度基本沿袭唐朝，其职能之一负责监察百官，扮演着反腐的角色，而不是仅仅反映情况。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这篇重要的奏议中说，基于君权民授和为政当容清议，连用木与根，灯与膏，鱼与水，农夫与田，商贾与财四个比喻，强调了人心之于人主的重要性，认为可畏。应容许自由表示意见，“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在他看来，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则，有御史监察制度，便是具体的做法。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民主政治体制表现于党派间政见之歧异。他明确分析了监察机构存在的必要性、理由与基本原则。监察机构代表的是真正的公众意见，应发挥自由功用，不惧利害。“今日物议沸腾，怨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但苏轼感知，在数度对新政的指责之后，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心，皇帝本人及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在苏轼全面反对王安石变法后，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说苏氏兄弟运父灵柩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于是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柩所经各地，向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收获。苏轼也许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法。对此，苏轼保持沉默。英宗治平三年（1066）四月二十五日，苏洵因病逝世，引起朝廷上下震动。英宗诏赐银捐，韩琦赠银三百两，欧阳修赠银二百两，苏轼均婉言谢绝，只求赠官。这样挟法诬告，是“某为权率所嫉久矣。然抢拾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而且苏轼、苏辙多次遭到弹劾，苏轼更是因言获罪，因“乌台诗案”险些丧命，后来心有余悸。

在苏轼从政时，存在恶劣的政治生态。苏轼在朝上，多次力求外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政治斗争。在所谓的竞争之中，其实根本不存在蜀党，既没有蜀党的组织形态、人员和行为等，也没有政治利益的考量，只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但严峻的政治形势和恶劣的政治生态使苏轼感到压力和威胁。元祐六年，刘挚执政，其党羽王岩叟，苏辙为尚书右丞，刘挚忌苏辙威胁到自己的相位，便阴使其徒伺机排挤。所谓君子小人之争已见端倪。所以，此时苏轼从杭州召还，极不愿与刘挚同朝，不断上章请辞外任，并上状陈情：“右臣近奉诏书及圣旨札子，不允臣辞免翰林学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而臣终不免患难者，以左右疾臣者众也。”（《杭州召还乞郡状》<sup>[4] 911~914</sup>）王文诰在《总案》中进一步揭示了苏轼不断上章请辞的原因“元祐之世，贤奸杂进，乃君子道必消，小人道必长时也”，又说“及刘挚代纯仁为相，王岩叟为枢密使，梁焘为礼部尚书，刘世安久在谏垣，号殿上虎，招来羽翼益众。朱光庭、杨畏、贾易等，失其领袖，皆附朔党以干进。挚擢易为侍御史，使驱公，意在倾子由也”<sup>[18] 557</sup>。东坡兄弟自知势不能立朝，所以力求请辞。这就是元祐初年的政治生态：小人忌恶君子，阴谋排挤打击。所以苏轼上章陈情直言：“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者，所从来远矣……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虽蒙二圣深知，亦恐终不胜众。所以反复计虑，莫若求去。”

（《杭州召还乞郡状》<sup>[4] 914</sup>）在他们感到威胁到自己及下属的利益时，会设法排挤打击苏轼，这对苏轼而言，须小心行事，这就是当时官场的政治斗争。在这种背景下，元祐六年（1091）五月十九日，苏轼为了全身远祸，上书哲宗皇帝，乞请到“重难边郡”，报国之心，死而后已，以避免党人猜忌，引起祸患。这在客观上使苏轼具有自觉抵制不廉洁的经验。

### 3. 价值观念

价值观包括是非、荣辱、对错、好坏等。张志烈教授在谈到苏轼时认为：

苏轼的精神世界广阔丰厚，但自有其核心价值观存在。研究苏轼的全部著作和其立身行事，我们可以大致看到贯穿他全部意识形态中最根本、最基础的东西，简略言之，即爱国爱民、奋励当世的崇高理想；求实求真、探索创新的认识追求；信道直前、独立不惧的处世原则；坚守节操、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我认为这些就是苏轼毕生坚持、维护的最高价值追求和生活信念。<sup>[19] 3</sup>

这一洞见对于我们认识自净有启发。从价

值观的角度讲，苏轼的自净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理想主义、循理无私和求真唯民，这使苏轼的自净结构相对合理完善。

理想主义。作为士大夫，苏轼具有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或者说有忧国爱民的理想。早年，就有“奋厉有当世志”。在年少时，在母亲程夫人的教导下，愿做像范滂那样为国牺牲的人。这种从小树立理想抱负，影响了一生。他也实现了自己早年的承诺。换言之，他志存高远，“致君尧舜”，以天下为己任，或以保持品格高洁为追求，不与世俗同浮沉，虽经磨难而不稍移。在《上神宗皇帝书》时，在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职，一切情势都呈现不利的情况下，苏轼知道，即便自己不遭大祸，至少将遭罢黜，是必然无疑之事，但他还是进言，表达了自己的革新主张和理想。苏轼在不同的场合表现或流露出爱国情操，“忠臣体国知无不为之义也”（《答李琮书》）、“为国者终不顾家”（《陈公弼传》）、“报国之心，死而后已”

（《杭州召还乞郡状》）、“圣人视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这些展现了作者崇高思想境界和光辉精神品格的金石之言，足可以与“先天下之忧而忧，乐天下之乐而乐”相媲美。

循理无私，出自苏轼的《东坡易传》，但在不同的文本中断句迥然不同，有的是“君子之顺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有的是“君子之顺，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有的是“君子之顺，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这里采用“君子之顺也，岂有他哉，循理无私也”的断句。这是他在“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中提出的。“君子之顺也，岂有他哉，循理无私也”中的“理”是指什么？是规律，是天理，还是本性，长期以来，少有解释。

“理”，从语境来看，是指本性。“物固有是理，患不知。”苏轼在《与虔倅俞括奉议书》中说，这是因为有的人不去探究和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自然就会认识不清物我之间的正负关系，受到私心杂念的干扰，走向反面。为此，苏轼又在《上曾丞相书》<sup>[4] 1319</sup>中进一步阐述循理与无私的关系说：“以为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乎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称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苏轼在这里特别强调为官者一定要潜心研究事物发展的变化规律，真正掌握事物的本质，才能真正成为无私无畏、廉洁从政

的好官。成为一个不被他人所左右、不被私欲所困的智者。廉洁从政，苏轼认为这是为官者的最高准则，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它体现一个官员的思想素质、精神境界、道德操守。苏轼在说“君子之顺也，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的同时，指出，“循万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东坡易传》）。苏轼在《赤壁赋》中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sup>[4]6</sup>意在不贪份外之财，不取份外之物，不可沽名钓誉等。这是《易经》上“进德修业”的观点，也是苏轼的循理无私的表现。这与道德和正义性有关。

求真唯民。苏轼对当时的形势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认为“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针对“两积”、“三冗”的弊端，苏轼提出了政治革新主张，并在《思治论》中，对财乏、兵弱和官滥的现象，提出要以犯其至难而图其远的勇气，决心革除“三患”。在变革什么和方式上，与王安石变法不同，于是，经历了升迁——贬谪——升迁——贬谪的过程。他“一肚子不合事宜”，“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

（《思堂记》<sup>[4]363</sup>）他进士及第，还考中了“制科”中的“贤良方正直方极谏”，而且入三等（宋代最高等），这种身份决定了苏轼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纠偏补弊的政治意识。在《晁绎先生诗集叙》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言必中当世之过”的观点，并践行，可以说“忠谏敢言，痛击时弊”。陆游指出：“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当所取法也。”<sup>[20]174</sup>其实，苏轼借鉴了庆历新政失败后，吏治严重腐败这一教训。对此，重视吏治，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革新的关键问题。在地方任上，他因法以便民，成为一个勤奋务实、有实际才能的循吏。有论者认为，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大帝国，苏轼生在这个知识广被推重，文化达到巅峰的时代，故能以生长于西南偏僻之地的一个草野，一入京朝，立即崭露头角；但是宋代的文化虽已烂熟，而士大夫所操持的现实政治，却并不理想，使一个原想出山来为世用的凤凰，成了人人厌恶的乌鸦”。<sup>[21]311</sup>但苏轼求真唯民的价值观念，以及在地方任上关心民间疾苦的作为，使他成为一个利民惠民的大写的人。

#### 四、结语

以上详细、深入地分析苏轼反贪与自净的思想与实践。其实，苏轼的反贪与自净密切相

关，缺一不可，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构成了其独特的反贪廉政思想。两者和谐地统一在苏轼身上。如果说反贪主张是言的话，那么，查处贪官是行，对曾热情推荐自己的父亲后来因受贿而助恶的人长期不提名也是行，自净也是行，苏轼做到了言行一致，也是他一生为官唯民的真实写照。不像有的呈现“人格分裂”、“两面人”的习气和作法，口头上反贪，行动上在大肆贪污。因此，对苏轼清廉和自净的尊崇是必要的。

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一文中提出的“功废于贪，行成于廉”，阐述了功与贪、行与廉的关系，将两者的辩证关系作了揭示，对于人们正确认知廉洁，避免贪污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苏轼除了行善、节俭和自净以外，还劝以奢侈闻名的友人蒲宗孟，要慈善和节俭。这在客观上印证了他的反贪清廉。

反贪与自净还涉及到权与法、权与利的关系。苏轼在从政几十年的经历中，对权力的认知，特别是在皇权下行事，有着深刻的感悟，而且通过自己的权力和他人手中的权力，以及自己的才能、智慧为民服务，这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苏轼是一个官员、诗人，也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在笔者看来，它是指有智慧和见识的人。知识分子不仅有知识，而且有见识、智慧，有社会道德，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对于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或决策，勇于坚持，不惧风险，属于这样的人：“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原则和既定的人生道路，不因政敌的反对、打击和个人遭受的磨难、艰辛而放弃，与尔虞我诈、蝇营狗苟格格不入，超脱于流俗之上，清浊异路，是非分明，守正不阿，特立不群。”

在“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贪腐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当下，在从党和国家高度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新形势下，在探讨苏轼的为官之道和苏轼的廉政思想与实践中，研究苏轼的反贪与自净，对于当下的反贪腐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 注释

- [1] 苏灿、张忠全编著《苏轼的为官之道》，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 [2] 王春瑜主编《中国反贪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 [3] 桂园《苏东坡官场笔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 [4]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诗文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 [5] 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文集》卷二十三，《论财利疏》，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正编本。
- [6] 《宋史》卷 163，《职官志》。
- [7] 苏辙著，高秀芳、陈宏天点校《栾城集》，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 [8] 曾枣庄《苏轼图传》，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 [9] 徐芬《苏轼与他的大宋朝》，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2 年版。
- [10] 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 2009 年版。
- [11] 《孔凡礼文存》，中华书局 2009 年版。
- [12] [美] 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
- [13] 冷成金《中国古代十大词人精品全集·苏轼》，大连出版，1998 年版。
- [14] 《苏东坡全集》上册，黄山书社出版。
- [15] 王影聪《苏东坡的情怀》，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5 年版。
- [1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
- [17] 徐晓光、路保均《中国古代反腐倡廉法律制度述要》，载《现代法学》，1998 年第 4 期。
- [18] 王文诰撰、林冠群校点，《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第三十三卷，海南出版社 2012 年版。
- [19] 潘殊闲《叶梦德与苏轼序》，巴蜀书社 2009 年版。
- [20] 贾志成著《书朴斋》，2013 年版。
- [21] 李一冰著《苏东坡传》，九州出版社 2006 版。

彭林泉，四川省眉山市人民检察院专委、高级检察官，四川大学兼职研究员。

(上接第 48 页) 从修养层面讲，就是要控制心火的易升之气，节制肾水的易泄之精，这在三家的内丹修炼中是共同的，可谓殊途同归。

所以，对于龙虎铅汞说要灵活掌握，不能持僵化呆板的态度。同时如果我们对这种修炼内丹的说法有一种全面和超越个别之见的宏观视野与认识，则我们就能对道教复杂的修炼之

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可以从另一侧面来观照道教的修炼，有利于破除对它的神秘感和迷信。

### 注释

- [1]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 [2] 任法融《周易参同契》释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 [3] 《参同契》中提到了“黄芽铅”，表明黄芽是指铅。其言道：“阴火白，黄芽铅，两七聚，辅翼人。”参见任法融《〈周易参同契〉释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 [4] 王沐《悟真篇浅解》，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 [5] (宋) 张伯端著、姜子夫主编《悟真篇》，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
- [6] 束景南《太易图与太极图——周敦颐太极图渊源论》，《东南文化》，1994 年 1 月。
- [7] 有论者认为原图只有第一种五行观，朱熹的改易是力图在太极图中寻求出与四季对应的五行观，从而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能够匹配起来，实现图说结合，以此证明图说为一人所作。从二图都表达了两种五行观。我们是不能否认原图也表达了这种与四季对应的五行观，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图与说不能匹配，进而不能由此而否认图与说非一人所为。所以，从朱熹将连线绕过土的改易是不能证明的，朱熹的目的是要证明图说为周敦颐一人所作的结论，因为朱震之原图与朱熹的改易图都包含了两种五行观。参见曹树明、田智忠《〈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五行说”比较研究》，《周易研究》，2003 年第 3 期。
- [8] 有关五行中的木、火、金、水与人体器官相配的说法来自《难经》，这种说法是各家的共识，成为他们相关立说的基础。针对这种相配，《难经》说道：“十五难曰：……肝，东方木也，……心，南方火也，……肺，西方金也，……肾，北方水也……。”参见孙理军主编《全注全译黄帝八十一难经》，贵州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 [9] 孙理军主编《全注全译黄帝八十一难经》，贵州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 [10]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八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 [11] (宋) 朱熹、吕祖谦编，江永注《近思录集注》，上海书店 1987 年版。
- [12] (宋) 朱熹《晦庵集》(卷四十九)，四库全书。
- [13] (汉) 刘安著、陈广忠注译《淮南子注译》，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年版。
- [14] 至迟在《周易参同契》中，已有木龙为汞、白虎为铅的明文记载。参见容志毅《〈周易参同契〉与外丹铅汞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

胡金旺，宜宾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 苏轼陆路出蜀路线考探

尧军

**内容提要** 史籍和各家著述，对苏轼这两次陆路出蜀的路线的说法主要有“经阆中出褒斜”和较为审慎模糊的“过剑门至凤翔”二说。本文通过考察蜀道的变迁（部分为实地考察），结合“三苏”与蜀道少量有关资料和苏轼同时代前后人物的蜀道诗文，试图对苏轼当年这两次陆路出蜀的路线作初步的探索和还原。

**关键词** 苏轼 陆路出蜀路线 考探

## 引言

苏轼一生凡三次出蜀，二次返蜀，陆路和水路都走过。嘉祐元年（1056）三月，三苏父子赴京出蜀；熙宁元年（1068）冬，服父丧满，与弟辙一起还朝，两次均走陆路。还有一次陆路归蜀，为嘉祐二年（1057）夏，苏轼兄弟一举成名时，母程夫人故，父子三人仓惶离京，回乡奔丧，此次陆路归蜀史料甚少，本文不做探讨。

遍览史籍和各家著述，对苏轼这两次出蜀的路线说法不一。究其原因，除了苏洵有早年历蜀道回忆之作《忆山送人》外，苏轼（包括三苏父子）这两次“北行”无《南行集》那样行程中的纪实诗文（或尚未发现）可供后人考探；其次，宋代秦蜀通道（以下简称“蜀道”），历经战乱、修整、改道等近千年变迁，部分路段或湮没沉寂，或另僻新径。

笔者查阅资料发现，有关苏轼两次出蜀路径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经阆中出褒斜”和较为审慎模糊的“过剑门至凤翔”二说。

持前者观点的有：（清）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曾枣庄著《苏轼评传》、台湾学者李一冰著《苏东坡大传》。

持后者观点的著述如：孔凡礼著《三苏年谱》“洵父子发成都，过剑门，经凤翔府，眉县横渠镇，游崇寿院，经扶风”，“过益昌，轼辙晤鲜于侁，时侁漕利路……至凤翔”；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自蜀赴汴，有两条路：陆路北上出汉中，穿越秦岭的一些山谷，到达关中，然后东折；水路沿长江出三峡”，“苏轼续娶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为妻，到十二月……还朝……先至长安过年，次年二月才到汴京”；林语堂《苏东坡传》“父子便自旱路赴京，迢迢万里，要穿剑阁、越秦岭，为时须二个月余。”

王水照编《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及大部分苏轼诗文校注、苏学专著均未述及苏轼陆路出蜀具体路线。

“经阆中出褒斜”观点之始应为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该四十余卷的总案既是近代苏诗校注的重要成果也是“苏轼年谱”的扩编，该总案“多可考究，也有谬说”<sup>[1]</sup>。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孔凡礼点校本《苏轼诗集》即以《集成总案》为底本，校以宋刊本集、施顾注本等、以及近代校勘批语，校勘汇集而成。孔老在修订其著《苏轼年谱》基础上所编《三苏年谱》并未采用王文诰的观点，王水照、朱刚先生所著《苏轼评传》中也未言及“经阆中出褒斜”。

本文通过考察蜀道的变迁（部分为实地考察），结合“三苏”与蜀道少量有关资料和苏轼同时代前后人物的蜀道诗文，试图对苏轼当年这两次陆路出蜀的路线作初步的探索和还原。

## 关于苏轼莅阆问题

宋时出蜀的正驿路为金牛道（后文详述），

发眉山、成都，过剑门至利州益昌（昭化）北上。还有一条路程较远但通达的“东川道”（文同诗注中谓之“南路”），此路从成都经梓州（今四川三台）、阆中，在昭化汇入金牛道。那么苏轼两次出蜀是走哪条路线，从一开始就成了问题。

除王文诰言“经阆中出褒斜”，迄今其他史料和地方文献均未明确记载。阆中史为状元之乡，北宋出“三陈”（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兄弟）名震天下。苏涣中进士吏阆，乃苏家之荣耀，阆中是不多的与苏轼家族关系密切之地。然确未见本籍贤才述及苏轼莅阆之事，虽多有地方学者和近代出版物言及此问题，大多是疏理和推测，也有的是地方为打造文化名城善意为之。如刘友竹先生《眉山五苏与阆中》、杨林由先生著《阆中名胜古迹考释》、2013年6月16日《南充晚报》《苏轼赴京赶考留宿阆中》、李家驹《阆苑仙才鲜于侁》等。笔者2013年曾赴阆，同当地学者李家驹先生有过交谈，并实地造访贡院、读书岩（状元洞）及昭化古城。

主张苏轼莅阆说者，多以省亲（伯父苏涣曾吏阆）、题刻（读书岩“将相堂”）及苏辙诗《寄题蒲传正学士阆中藏书阁》为据。

经考，苏轼两次出蜀时段伯父苏涣未在阆。嘉祐元年，苏涣尚在衡州（今湖南衡阳）任上，嘉祐二年十月任满回京，而熙宁元年（1068），苏轼兄弟出蜀时伯父已辞世六年（苏涣1062年去世，时轼有祭文，辙有《伯父墓表》）。苏轼兄弟同伯父相处较长时间段分别为，庆历七年（1047）苏涣返乡奔父丧并丁忧（苏轼祖父苏序该年去世）和嘉祐五年（1060）南行返京时期，伯父“言及为政之方”。<sup>(2)</sup>

《舆地纪胜》载：“宋元祐中，雍子仪家于阆州将相坊，筑会经楼（史上阆中学道街状元街交界处建有会经楼，为阆苑十二楼之一）<sup>(3)</sup>，集京本、蜀本、浙本各一本，总三万余卷，苏公轼为题阁额，范百禄以下皆有诗，蒲宗孟为记。”《舆地纪胜》作者王象之，庆元二年（1196）进士，宝庆三年（1225）前后知潼川府（今四川三台），与苏轼生活年代相去不远，所述应可信，只是苏公元祐所题阁额语焉不详。拙见，既苏轼所题只与将相坊、会经楼有关，读书岩之题刻“将相堂”系苏轼莅阆仰三陈<sup>(4)</sup>之作存

疑，现岩上苏题极可能是应后人之托所题，或集苏迹上石，为阎苍舒《将相堂记》成文之后事<sup>(5)</sup>。若当年苏轼实地造访宋真宗赐名御书“紫微亭”（《舆地纪胜》“紫微亭”条，未言及宋真宗赐书<sup>(6)</sup>），岂敢冒讳侧题。《舆地纪胜》阆州景物“捧砚亭”条下：“司马温公侍亲游三陈读书岩题名”<sup>(6)</sup>。司马光与苏轼为同时代名人，岂有只列其一之由。至于此题落款，有后人纪念苏轼效三陈出蜀中举时辰之意。

被较多后人提及的苏辙诗《寄题蒲传正学士阆中藏书阁》为苏轼兄弟莅阆之证。该诗地方史籍有载，《阆中县志》误作《寄题蒲学士藏书阁》漏了关键的人名、地名，全诗如下：

朱栏碧瓦照山隈，竹简牙签次第开。  
读破文章随意得，学成富贵逼身来。  
诗书教子真田宅，金玉传家定粪灰。  
更把遗编观得失，君家旧物岂须猜？

蒲宗孟（1022~1088），字传正，阆州新井人（今四川南部县），1053年进士，翰林学士，多有著述。在家乡建有清风书楼，是蜀中最早的私人图书馆。蒲与苏氏家族交往密切并有姻亲关系<sup>(7)</sup>。苏洵去世之后写有《老苏先生祭文》，苏轼两次出蜀时蒲任职夔州和馆阁，《宋史》有传。

该诗前两句被认为是苏轼阅阆赏楼亲见之述。笔者认为，实为诗人应景酬颂之语，“朱栏碧瓦”、“山隈”、“竹简牙签”非实地所睹，欧阳修《永州万石亭》诗句：“作诗示同好，为我铭山隈”<sup>(8)</sup>，梅尧臣《寄题滁州丰乐亭》有诗句：“引水开石池，结宇覆碧瓦”今考，蒲氏藏书阁清风楼旧址位于四川省南部县宏观乡，当地无苏轼兄弟到游之载。

笔者较为关注的是苏轼兄弟与鲜于侁的交往、唱和。其中兄弟二人的《和鲜于子骏益昌官舍八咏》等诗文，物象纷呈，有许多内容值得深入研究。

苏轼兄弟与阆人鲜于侁的交往不仅时空跨度大，唱和内容也十分丰富<sup>(9)</sup>。熙宁元年冬，苏轼兄弟返京出蜀时与之有益昌之晤<sup>(2)</sup>。益阆咫尺，时鲜于侁又返乡为官，二苏与之同游阆苑再行北上不是不可能，此次返京，苏轼兄弟从容漫游，沿途多有造访，加之携家眷避剑门之险，走东川道<sup>(10)</sup>经阆至益昌北上合乎情理。

文同《阆州东园十景》诗下有注：“古时入蜀到成都，避剑阁之险者，往往自朝天驿（今广元朝天镇）舍陆觅舟至阆中，复舍舟而陆，西行通达，谓南路。”<sup>(11)</sup>《续资治通鉴》卷十七载：宋时吏部尚书宋琪上书中言“利州最咽喉之地，西过桔柏江（即昭化），去剑门百里，东南去阆州水路二百余里”，表明阆利间早已水、陆二通。

透过以上资料，笔者认为苏轼两次出蜀是否到过阆中问题，仍需着力挖掘新的材料，期待新的发现。嘉祐元年“三苏”出蜀，有过剑门关史料确载<sup>(12)</sup>。嘉祐之初，携伯乐之托书，赴京备考的苏轼，自阆中绕阆剑道（阆中至剑阁）北上的可能性小。反倒是熙宁元年冬，为避剑门之险，携眷从容返京游阆的可能性较大（待考）。

### 关于苏轼问道“褒斜”问题

自古出入秦蜀通道（本文简称“蜀道”）的史料和行道者诗文丰富，历代对蜀道的兴修、战乱、驿程、变迁记述详实，唯独“褒斜”或褒斜道（谷），语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及具体地理路径所指差异很大。

褒、斜本为源于秦岭南北两侧之流，斜水北出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入渭，褒水出褒谷（今汉中市褒城县境）入汉，二水上中游一带沿河谷地势低缓，褒斜古道即由此通过。史上穿越秦岭的四条栈道为“子午、傥骆、褒斜和陈仓故道”（又称散关道、嘉陵道、兴州道，本文统称“故道”）<sup>(13)</sup>，褒斜和故道据史载为最早的越岭通道。而由唐、宋沿用至清末的官驿路，只有故道<sup>(14)</sup>。

故道所经路线，自今宝鸡市（古陈仓县），至略阳县（古兴州），基本上与现宝成铁路（或嘉陵江）走向相伴（少许路段除外），历代变化不大。褒斜古道（汉晋褒斜道）路线也十分明确，是一条利用天然地形所僻，路程近捷的越岭之路。《梁州记》记载：“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长四百七十里”。具体路线为：自汉中（古兴元府）褒城出褒口，穿石门，经故三交城（今留坝西江口镇附近），登太白五里坡，下山经下寺，沿石头河，出斜口至眉县境。

故道之名，始见于《史记》，开辟利用却早于此。《史记·河渠书》记述：汉武帝开汉晋褒斜道的原因之一是“抵蜀从故道、多坂、回远”<sup>(15)</sup>。这说明汉前故道已是入蜀要道之一，因其绕道太远，又多山岭，故复修不翻大山的褒斜（谷）栈道。二条古道，一条蜿蜒多坂，水路并通（因伴嘉陵江而修，行者常水陆并用）；一条近捷天然，但无嘉陵之易，一直延续多年，只是一个驿路（故道），一个非驿路而已。此二古道，史上功用各异，驿程也不同，却又相互补充，甚至纠结附合，兴废共荣，同时也造成“褒斜”（道、谷）一词含义变化多异，这给我们厘清苏轼两次出蜀行迹路线制造了不小的困惑。好在相关史籍著述并不缺乏，只须着力用心罢了！

唐中叶后（开成四年前后始），汉晋褒斜道屡加修治，线路变动很大。致使北段离开了原旧道，另僻自兴元（今汉中）北上新路，并在凤州合于宝鸡、散关、凤州间的故道，此道仍称为“褒斜道”或“斜谷道”。而这正是唐“褒斜道”（或称“斜谷道”）之始。有关此间改道的史料可参见王开主编的《宝鸡古代道路志》。

唐中后期一些方家、诗文多称凤州至褒城间的道路为“褒斜道”或“斜谷道”，后人稍不察，即误为指汉晋旧道。刘禹锡《途赵中丞参山南幕府》诗云“绿树满褒斜……县道过黄花”，时黄花县在凤州北故道上，诗中“褒斜”无疑是指凤褒间的唐褒斜道。路线大体走向与今宝汉（宝鸡到汉中）省道公路相近。<sup>(15)</sup>

经实地考察，袁永冰《栈道诗钞》中大量晚唐、宋代诗人经唐褒斜道的作品中，与上述情形一样，也是指唐褒斜道（宋此道变化不大，只是驿置有所调整），实地考察所经地望基本准确。但苏轼出蜀时期入川正驿官道仍为故道，这一时期从蜀道北段这两条道路上人物、诗文的数量差异也说明这一点。

从《宋会要辑稿》记载可知，北宋熙宁九年（1077）前，入蜀大驿路使用的是故道，但唐斜谷路并未废塞，“久来使命客旅任往来”。朝廷一番争论后，自熙宁九年后，盖以唐代斜谷道为大驿路。后不久又改回故道。<sup>(14)</sup>

元、明、清时期，故道与唐代斜谷道地位转换，后者为大驿路，而故道仍并行为辅。故

道的影响也逐渐下降。而此时，原汉晋褒斜道，虽北段仍通行旅，南段则已阻塞不通。<sup>(13)</sup>

史上也曾将明、清时期“连云栈道”称为“褒斜道”<sup>(16)</sup>。“连云栈”一名始见于元<sup>(16)</sup>。“从褒、凤出者，为今之连云栈道，汉王之南郑由之”<sup>(13)</sup>。而一般认为明、清以来所称的“连云栈道”指整体秦蜀通道，分“北栈”和“南栈”两大路段，“北栈”北段（凤州以北）借用故道，“北栈”南段（武关驿以南）借用汉晋褒斜道；“南栈”大部分借用“金牛道”入蜀路线，道间多山岭，有连接云表，连通各驿之意。

根据以上史料分析，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中“出褒斜”泛指蜀道尚可意会，言苏轼当年经褒斜道（汉晋故道或唐斜谷道）出蜀至凤翔府，则不确。理由有三：

1. 苏轼本人有诗《入赣》句：“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并自注：“错喜欢铺，在大散关上。”<sup>(12)</sup> 毕沅《关中胜迹图志》：“错喜欢铺，在大散关上。”苏轼凤翔诗《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灭决囚禁……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中有“南山连大散，归路走吾州”句；苏轼为官凤翔期间曾多次到过“斜口”，并有诗《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是日至下马碛，憩于北山僧舍。有阁曰怀贤，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诸葛亮所从出师也》，诗中无言忆及曾道出“斜口”。

2. 苏辙当年使辽路上有忆及蜀道诗《古北道中》<sup>(17)</sup>，诗中有“仿佛梦中寻蜀道，兴州东谷凤州西”句。“凤州西”直道出当年行迹的方位与走向，与故道路径相符。变迁后的唐宋斜谷道方位在凤州以东。部分学者对诗中的兴州、凤州地望有异议，认为“古北道中”，今河北滦平一带古时也有兴州、凤州。今查史料和《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时辽圣宗置北安州（治今河北隆化附近），金方始称兴州，与苏辙使辽时间不符。

3. 除《褒城县志》录有一首《赠牛头石明上》诗（此诗《苏轼诗集》、《全宋诗》未收，是否为苏轼的作品尚待考证）外，汉中各史籍里均无苏轼到过兴元府（今汉中市）之述。更无经“褒口”览“石门十三品”之记载。

“褒斜”（道、谷），因其古老和史上有的

各种传奇（特别是三国时期），加之变迁中复合其他道路（如故道北段），同时又是元、明、清时期以来一直采用的驿路，俨然已成蜀道北段，乃至整体秦蜀通道的代名词，其影响在近代超过了唐宋时的故道。清王文诰以简洁的“出褒斜”三个字述及苏轼出蜀路线（对苏轼熙宁元年出蜀路线更简言为“自阆中至凤翔”），是可以理解的。但对本文所讨论的苏轼出蜀具体路线问题，仍需实事求是，以客观、详实之材料加以分析考证方可还原历史，获得可信结论。

### 苏轼陆路出蜀具体线路初探

大多史籍、地理方志在叙及蜀道及其驿程时，均采用以都城、府城（如唐长安、宋汴京）为基点，自北而南（即入蜀的方向）载述。本文为行文方便，结合史料引文的顺序，将以先“北栈”后“南栈”之序讨论有关苏轼行于蜀道的路径（与出蜀的路径走向相反），但对许多所引诗文作者而言，这又与此期吏蜀官员、文人墨客的入蜀路线走向吻合，这一点特别提醒读者留意。

苏轼兄弟诗中“错喜欢铺”和“凤州西”是我们考探苏轼两次出蜀路线北段的重要参考指引。宋代川陕交通路线使用最多的是嘉陵道（其北段即陈仓故道），被置为入川正驿，且汉唐以来，在其中一些路段，水陆都取用甚多。如唐郑谷自蜀至陕，有《兴州江馆》<sup>(18)</sup>诗，知其取故道，水路有江馆之设。《方舆胜览》：“嘉陵江源出大散关之西，去凤州九十里。”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故道水）经凤县北、徽县东、两当南、略阳西，迤逦而入川江，滩石险恶，至渔关（今徽县虞关）始通舟楫”，与《通志》所述无异。

这表明苏轼两次出蜀路线北段走向是沿宋时故道自兴州（今略阳）北上至凤翔府。至于沿嘉陵江而行路段是否水陆并用，不得而知。从苏洵早年历蜀道诗《忆山送人》中所述，老苏早年曾行经故道。

苏洵《忆山送人》<sup>(19)</sup>（节选）云：  
渐渐大道尽，倚山栈夤缘。  
下瞰不测溪，石齿交戈鋋。  
虚阁怖马足，险崖摩吾肩。

左山右绝涧，中如一绳悭。  
傲睨驻鞍辔，不妨驱以鞭。  
累累斩绝峰，兀不相属联。  
背出或逾峻，远骛如争先。  
或时度冈岭，下马步险艰。

苏轼有《送运判朱朝奉入蜀》诗句：“梦寻西南路，默数长短亭。似闻嘉陵江，跳波吹枕屏。”表明苏轼曾沿江而行，是在蜀道北段的故道，还是在蜀道南段的金牛道不详。

根据现知唐宋驿路驿程史料<sup>(13)</sup>，蜀道北段的故道自凤翔府起至兴州（今略阳）的置驿情况如下：

陈仓驿（今宝鸡）、遵涂驿（近大散关）、黄花驿（凤州北）、两当驿（今两当县东）、河池驿（今徽县西）、青泥驿（今徽县青泥岭）、长举驿（今略阳白水江附近）、兴州顺政县（今略阳）。此路线中最为引起笔者关注的是青泥驿。因苏轼嘉祐元年（1056）出蜀时，正值故道中这段不长的青泥岭路<sup>(16)</sup>，为新修白水路取而代之之时。现立于徽县与略阳县交界处，徽县大河乡石崖上的雷简夫《新开白水路记》题刻（俗称大石碑）清晰记载了此次改道。

本人近至徽县、两当、略阳等地实地考察，感谢袁永冰、曹鹏彦、王自立等当地专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和考证文章。但对长举驿地望的考证各方观点有所不同。故址位置为徽县大河乡，还是略阳县白水江镇，或是白水江镇长峰村，专家观点各异，主要原因是历代地理史籍所述驿程与现今实地多有差距导致（如雷简夫文中“五十里有半”与实地考察差距较大），待考。

雷简夫（1001~1067），字太简，同州郃阳（今陕西合阳）人。孝先子。仁宗庆历二年（1042），杜衍荐为校书郎、秦州观察判官。简夫在雅州时，识眉山苏洵，二人相见恨晚。洵携其二子拜谒简夫，以师事之。简夫遂以书信投老友益州太守张方平、文坛泰斗欧阳修、韩琦等人，推荐“三苏”父子，使其脱颖而出。知雅途中，经汉中府，时朝廷拨银修筑古蜀道青泥岭段，嘱记此盛事，遂撰文并书《新筑白水路记》碑。老苏有《雷太简墓铭》。从雷简夫此记，我们可知以下几点：

1. 新开白水路的原因，是因故道这段翻越

青泥岭的旧道“高峻、泥泞、路远”<sup>(16)</sup>。

2. 新开白水路，建成可通行时间为嘉祐二年（1056）秋，“至秋七月可其奏，秋八月行者已走斯路矣”。

3. 新开白水路的起点、终点、长度：“自凤州河池驿（今徽县西）至长举驿五十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sup>(20)</sup> 比旧道减少一驿，而且减少了岭下绕行路程。



今考，旧青泥路需自现徽县南上岭，自青泥岭（今青泥店子），至太和庵下岭，绕岭下小道自嘉陵江边虞关。《关中胜迹图志》有“白水路”条“在略阳县北”，《通志》“宋至和中开”；浊水“在略阳县北百二十里”。<sup>(21)</sup> 苏轼两次出蜀，当新旧二路各行一次。即嘉祐元年春行旧路（新路未成），而熙宁元年冬新路已可行矣。苏轼恩师张方平，蜀中清吏赵抃，至和年间、熙宁前后有行经此段道路诗作。

张方平（1007~1091），字安道，号“乐全居士”，谥“文定”，北宋应天府南京人，有《乐全集》四十卷传世。张方平是三苏最早的支持者、推荐者和政治上的支持者、保护者。曾在成都热情款待苏轼（待以“国士”），而苏轼终身敬重张方平。《乐全集》序即为轼所作。至和元年（1054）七月，张方平为户部侍郎知益州，十一月到任。

《乐全集》载有张方平“赴益州路中诗作二十六首”<sup>(22)</sup>，信息量非常大，其中十七首含有明确地望方位或时间坐标，可成为我们考察苏轼当年蜀道行迹的重要参考。这些诗反映张方平赴益（今成都）走的是故道，青泥岭段走的是开白水路前的旧道（回程待考）。在故道北

段存诗有：经两当驿时有《过张真人洞》，过青泥岭时有《青泥岭》、《鱼关诗》，抵兴州前有《药水岩》、《兴州长举县飞石阁》。其《青泥岭》诗云：

斗峻凌霄出混茫，东西秦蜀此分疆。  
萦纡断涧千寻曲，回合危峦万叠苍。  
烟外孤村通鸟径，云间盘道绕羊肠。  
朝家方面非轻寄，何事徘徊望故乡。

蜀道南段以及日后回忆诗作还有：《杜鹃》、《宿龙门洞》、《飞仙岭阁》、《筹笔驿》、《过嘉川驿》、《剑门关》等。这些作品中，自注部分资料丰富，如《药水岩》诗下，既有方位之标“长举县东十里”，又有时间之序“时甲午十月二十三日”。《宿龙门洞》诗下：“在三泉县西，即古葭萌。”《鱼关诗》诗下：“青泥驿西二十里，危峦叠嶂，曰鱼关山。”

赵抃（1008~1084）字阅道，自号知非子。衢州（今浙江衢县）西安人，其生平见于《宋史》卷三一六，《东都事略》卷七十三。苏轼作有《赵清献公神道碑》。赵抃治蜀政声卓然，有《四库全书》收录《清献集》，今存诗781首（《全宋诗》），其中和蜀地、蜀道有关的诗近两百首。

赵抃一生四次入蜀，前两次均水路入川，第三次为治平二年（1065）和第四次为熙宁五年（1072）均经陆路入川。有《题御爱山》、《题张果老洞》、《熙宁壬子至节夕宿两当驿》、《过青泥岭》、《过岭回寄张景通先生示邑下同人》、

《乙巳岁渡关》等蜀道诗作。赵抃《过岭回寄张景通先生示邑下同人》云：

二年官役愧能名，贤得斯人幸合并。  
几度孝廉交郡辟，一生文行出乡评。  
君庐皂水江头远，我马青泥岭顶行。  
西首胡为书以赠，欲持同邑寄诸生。

此诗为赵抃在江原（今四川成都崇州）任满后（1052）出蜀过青泥岭“旧路”时所作<sup>〔23〕</sup>。

苏轼两次出蜀前后时期，许多重要文人、吏客的蜀道诗也值得认真研究，如张咏、文同、宋祁、王素，甚至晚期的陆游等人的作品。文同《长举驿楼》诗：“爽气浮空紫翠浓，隔江无限有奇峰。君如要识营丘画，请看东头第五重。”大画家文同的诗至少告诉我们：长举驿位于江（嘉陵江）边，江峰景物透着水墨画般的美。文同过故道北段时还有《过大散过寄子骏》、《夜

发散关》、《大热过散关因寄里中友人》等诗作。

苏轼兄弟均有诗言及兴州（今陕西略阳）古东池。苏轼《寄题兴州晁太守新开古东池》、苏辙《兴州新开古东池》。二诗均为凤翔时期所作，距苏轼兄弟首次出蜀过兴州时间不远，苏轼诗中“百亩新池傍郭斜”对古东池面积、方位走向似有亲历之忆，苏辙诗中“西还过此须终日”句，则有当年尚未开浚，匆匆而过之憾。

北宋时期，自兴州入蜀，即为本文所要考探的苏轼出蜀路线南段。兴州自古为要津，除嘉陵之便外，史上有明确记载：宋代故道作为正驿，从兴州皆南下接金牛驿至利（广元）<sup>〔14〕</sup>，唐宋金牛驿即今陕西省宁强（宋时大安军）县大安镇烈金坝。至于为何不利用嘉陵之易沿水路修栈或舟行，待考。

《舆地纪胜》有“金牛镇”条：“在军东六十里。昔张仪、司马错从石牛道伐蜀，取之。”

“金牛驿”条：“扬雄《蜀王本纪》：蜀令五丁力士牵石牛还成都，秦随牛伐蜀焉。”

唐金牛驿起点在兴元府（今汉中），据严耕望《唐金牛道成都道驿程考》，昔金牛道自兴元府西经西县（今勉县西）、烈金坝至蜀。北宋时期，由兴州至金牛驿的这段蜀道，相对唐时绕经勉县、兴元府路线有所变动，烈金坝至利州（广元）段也非今天经金牛峡（滴水铺）、宁强县、七盘关、朝天镇到广元、昭化路线（此路线应为元以后路线）。

王开《古代宝鸡道路志》认为：北宋时期，兴州至金牛驿的这段蜀道，不经由西县（今勉县西）。太平兴国五年（980），改由飞仙岭（今略阳东南）、经陈平水道直达金牛驿，接合金牛道入蜀。略阳学者王自立文章<sup>〔24〕</sup>对此作了考证和说明，文中除少数所引诗文有待商榷外，观点基本符合史实，即《永乐大典·梗韵·岭》卷11981：“飞仙岭，有阁道百余间，横之半空，即入蜀大路也。此路旧由西县（今勉县西）过，经由沮水，宋太平兴国五年（980）移改于飞仙岭。”此改原因不详，待考。也许与乾德二年（964）王全斌伐蜀等变故有关。此道比沮水道（原从兴州东行沿沮水至勉县旧道）节省路程百余里（省三驿四铺），途中仅有一驿（方骞驿），其具体路线与今天略阳至宁强的公路走向一致，即自略阳县东南的接官亭翻分水岭，沿

导岭河(故称陈平水)、经庙坝至大安(金牛驿)，全程约八十里。此路唐时已有，只是后改移又复用。苏廷(670~727)有《晓发兴州入陈平路》诗，杜甫(712~770)乾元二年(759)自同谷经兴州入蜀有诗《飞仙阁》，作者自注：“飞仙阁在兴州东南，徐佐卿化鹤于此，故名，上有阁道百间。”张方平、赵抃诗《飞仙岭阁》、《和六弟过飞仙岭》均言此道。

八十年代，著名蜀道学者蓝勇教授对金牛道有过深入考察和研究。近年四川、陕西学者雍思政、孙启祥也有对金牛道历史变迁的考证文章<sup>[25]</sup>。蓝勇先生曾实地考证唐金牛道(宋时基本上沿用)沿途驿站(具体地望参见蓝勇著《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

《舆地纪胜》载：“自(利州)城北至大安军，管桥栏、阁共计一万五千三百一十六间，其著名者为石柜阁、龙洞阁。”“自蜀至京师行四千里，天下山水之可喜者莫如三泉。自利至兴行五百里，几半蜀道，而岩洞之可喜者莫如龙洞。”大安军三泉县是宋时朝廷直辖之地，治今宁强县阳平关镇，苏轼当年应寻恩师张方平足迹，道经三泉，游赏龙洞，只是不知是否也像张益州“宿龙门洞”。

又据《舆地纪胜》卷184《利州路》谈到孝宗时利州开马道，“皆不由剑阁，别架栈……以引商贩。”马道当为剑阁道另有他径。

对金牛道的变迁研究，可以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1. 苏轼出蜀时期，自金牛道出蜀路线是：自昭化、广元、沿嘉陵经朝天北上三泉(今阳平关镇)，东经代家坝至金牛驿。有学者指朝天至三泉间路线基本上沿现嘉陵江东岸朝阳(朝天至阳平关)公路而行。

2. 金牛道朝天以北路段及利剑(广元到剑阁)段有间道，唐宋以来多有异动，如：王全斌攻蜀(964)后，留下的“罗川道”、朝天以北五盘岭、九井附近的小路、剑阁附近的马道等。

3. 元代起(参见元李祖仁《广元路复行古道记》)，金牛道朝天驿以北不再沿嘉陵江上行宋三泉县(今宁强县阳平关)，而是经朝天驿东北镇宁站(今宁强)、金牛峡(滴水铺)

到金牛驿。此线路为明、清、民国所沿用，即今川陕108国道路线。

4. 对近代金牛道驿站考<sup>(14)</sup>得知：除个别区段，有少量线路异动，金牛道南段路线一直较为稳定。当年苏洵落榜归蜀，其兄有诗送别“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灵关稳跨驴”(“灵关”或为“鹿关”之误)。今德阳(古旌阳驿)北的鹿头关位于入成都平原的故金牛道上。陆游有《鹿头关过庞士元庙》诗。

苏轼出蜀年代前后，许多文人武吏在金牛道沿途留下有大量诗文，其中以剑门之咏和广元北嘉陵江畔路之叹为最。少量诗文言及广元北至宁强间道，如宋代郭英诗：

大漫天是小漫天，小漫天是大漫天。

一人大小漫过天，遂使生灵入四川。

诗文中景物与以上研究所指正驿上的有关地望吻合，有的至今还是当地著名景点景区。如张方平《宿龙门洞》、《雨中登筹笔驿后怀古亭》、《蟠塚》；文同《过朝天岭》、《过嘉川驿》；陆游《老君洞》、《自三泉泛嘉陵至利州》、《剑门道中遇微雨》；赵抃《乙巳岁渡关》等。

张方平《宿龙门洞》诗云：

路到葭萌古道边，层崖垒磴入苍烟。  
忽逢方丈在平地，何意中途过洞天。  
四面浓岚围碧嶂，半空急雨逆飞泉。  
一宵身世离尘境，却抚征骖懒下鞭。

文同《过朝天岭》诗云：

双壁相参万木深，马前猿鸟亦难寻。  
云容杳杳断鸿意，风色萧萧行客心。  
山若画屏随峡势，水如衣带转岩阴。  
生平来往成何事，且倚钩栏拥鼻吟。

陆游《自三泉泛嘉陵至利州》诗云：  
日日遭途处处诗，书生活计绝堪悲。

江云垂地滩风急，一似前年上峡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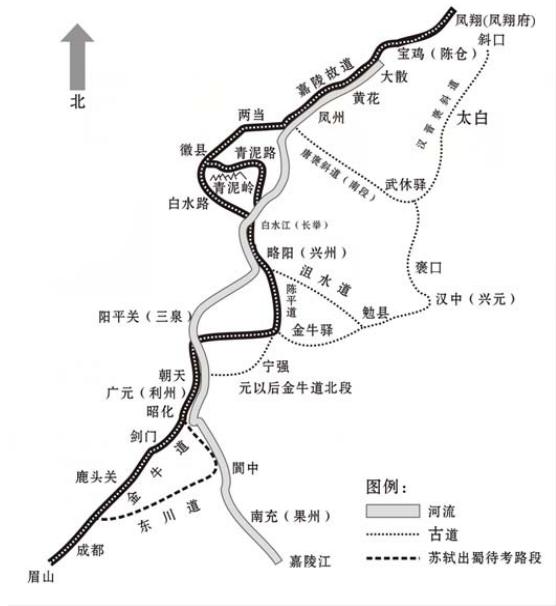
赵抃《乙巳岁渡关》诗云：

谁云蜀道上天难，险栈排云彻万山。

我愧于时无所补，十年三出剑门关。

从张方平、赵抃和陆放翁诗句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三泉风物绝佳令人留连而宿，北宋的剑门关南北是绵绵栈道，南宋时期阳平关至广元可顺流江行，比文同所言“自朝天驿舍路觅舟”南下还要便利舒适。

### 苏轼两次陆路出蜀路线示意图



### 小结

历时多年，行于蜀道，求教于沿途各地方家、史籍及学者，尽力梳理还原苏轼两次陆路出蜀的大体路线。即苏轼两次出蜀非行经褒斜道（谷）而是由宋金牛道，自眉山、成都过剑门关、利州（今广元）、沿嘉陵江上三泉（今宁强县阳平关镇）、经金牛驿（今宁强县大安乡），北上陈平道至兴州（略阳）、由长举县（待考，示意图标注位置从大多资料所载）越青泥岭（首次由旧青泥道，后由白水新道）经河池驿（徽县）、两当驿（今两当县东）、凤州、大散关至凤翔府。按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甘肃省也是“飞鸿”踏雪掠过之地（今徽县、两当县属今甘肃省陇南市）。

成文期间，费事困扰较多的考察是：大散关关址、长举驿地望之考。青泥岭路段考察也多有艰辛。在今宝鸡市大散关风景区、略阳县白水江镇嘉陵江边、宁强县阳平关镇龙门洞，上下求索，谨言慎行。在同当地学者的交流中，对有争议的地望，在无一手史料或史料混乱时，既坚持己见，又充分尊重，甚至相约日后待考（如与袁永冰先生论及大散关、长举驿地望问题）。

古代道路变迁复杂，“切不可以今证古！”

（袁先生语）何况这是一次材料少、线路长，跨越千年的苏轼出蜀行迹考探。本文对苏轼两次出蜀路线，通过旁证和少量线索做史海钩沉，期间收集、整理、消化蜀道变迁资料的工作过于庞杂，查阅相关人物、诗文资料难免有误，不当失实之处难免，留予日后订正。

此次专题考探完全是业余爱好者利用工作之余所为，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把握和厘清得十分准确。考探中尚存大量问题和疑惑，有待新材料的发现和专家学者的完善突破，如：苏轼兄弟熙宁初为何无诗文存留问题、苏轼莅阆问题、大散关关址、长举驿（甚至宋河池驿）地望、宋代嘉陵故道虞关以下（利州以上）水路交通情况、宋代故道长举驿至兴州段驿路路线问题、北宋金牛道朝天驿以北段、剑阁段支道和间道研究，都有待进一步考证和研究，本文未敢轻做臆断。

### 注释

- [1]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 [2] 孔凡礼《三轼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 [3] 杨林由《阆中名胜古迹考释》，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年版。
- [4] 刘友竹《眉山五苏与阆中》，《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4 期。
- [5] 《苏轼赴京赶考留宿阆中》，《南充晚报》，2013 年 6 月 16 日。
- [6] （宋）王象之撰、李勇先校点《舆地纪胜》，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7] 《阆中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8] 刘扬忠选注《欧阳修诗词》，中华书局 2014 年版。
- [9] （宋）梅尧臣《梅尧臣编年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 [10] 李家驹《蜀道雄镇》，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年版。
- [11] 何增鸾、刘泰焰选注《文同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 [12]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 [13] 王开主编《宝鸡古代道路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 [14] 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15] 《陕西省志·第二十六卷（一）·公路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下转第 67 页）

# 读《东坡志林》（十二）

徐 康

## 超凡脱俗的道家之“道”

张君持此纸求仆书，且欲发药<sup>[1]</sup>，君当以何品？吾闻《战国》中有一方，吾服之有效，故以奉传。其药四味而已：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sup>[2]</sup>。夫已饥而食，蔬食有过于八珍<sup>[3]</sup>；而既饱之余，虽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sup>[4]</sup>。若此可谓善处穷者矣，然而于道则未也<sup>[5]</sup>。安步自佚，晚食为美，安以当车与肉为哉<sup>[6]</sup>？车与肉犹存于胸中，是以有此言也<sup>[7]</sup>。

——《赠张鷦》

### 注释

[1] 发药：见于《庄子·列御寇》：“列子提履（提着鞋）跣（xiǎn，光着脚）而走，暨（到，至）乎门，问曰：‘先生既来，曾不发药乎？’”意思是：“列子（御寇）提着鞋子，光着脚就跑了出来，到了门口问道：‘先生既然来了，竟不说一句善言劝人、批评指教的话么？’”发药，原意指开发药方治病；此指给人劝诫、教诲、开导，以（当药石）纠正缺点。

[2] 其药四味而已……四日晚食以当肉：《战国策·齐策四》，齐宣王欲尊颜斶(chù)为师，颜斶不乐为官，曰：“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显矣，然而形神不全。愿得赐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自安，自得安宁）！”译为白话，意为：齐宣王想拜颜斶为师，颜斶却不乐于做官，辞谢而去，说：“璞玉生在深山之中，经过玉匠加工，破璞而取玉，其价值并非不宝贵，然而璞玉本来的面貌已不复存在了；士人生于偏僻乡野之地，经过推举选拔而被任用，享有禄位，他并非不尊贵、不显赫，然而他的形体和精神已不齐全了。我（颜斶）希望（您齐宣王）赐我回归乡里，我可以做到：晚些吃饭权当吃肉，悠闲散步权当乘车，不犯王法权当富贵，清静纯正以求得安宁，自得其乐！”

[3] 八珍：八种珍贵的食物。古以龙肝、凤髓、豹胎、鲤尾、鷀(xīāo，猫头鹰一类的猛禽)炙、猩唇、熊掌、酥酪蝉为八珍。此处泛指珍贵食品。

[4] 而既饱之余，虽刍豢(chú huàn)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喂牲口的草料称“刍”，此处代指

牲口；豢，豢养，此处指喂养的牲畜。这句是说，如果已经吃饱了饭菜，那么，虽有牛羊犬猪（肉）之类的美味摆在面前，你恐怕也会吃不下去而让它们离开的吧（“不持去也”）。

[5] 若此可谓善处穷者矣，然而于道则未也：此，指前面谈到的“既饱之余”，百食不思。此句意为：这可以说是“善处穷者”，即会过穷困日子的人；然而，却“于道则未也”，即未必符合自然规律。道，规律。

[6] 安步自佚，晚食为美，安以当车与肉为哉：佚(yì)，逸。这句是说，散步虽然也可说安逸，但能与坐车相比么？晚上素食虽好，又怎么能与吃肉相比呢？

[7] 车与肉犹存于胸中，是以有此言也：心中还想着坐车与吃肉，所以才会有这番言语。

### 赏析

这篇文章讲的是：有一位叫张鷦(è)的（“张君”）拿着一张白纸求我给他书写一段话，要求这段话要可以当做善言劝人、疗人心病之药石。张君问曰：那么你（苏轼）应当用什么品味的药呢？吾（苏轼）于是告诉他，听说《战国策》书中有一剂良方，而且我“服之有效”，所以恭奉给你。这方子中，“药”不过四味而已，哪四味呢？“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原来，这是一服“养生之药”。就以饮食为例吧，如果在饥饿的情况下进食，蔬菜之类食品的功效超过民间所谓“八珍”；若是在吃得很饱的情况下，虽然各种牛、羊肉之类的美味满满地堆在你面前，唯恐其不能消受而只好放弃呢！如果说这就叫做善于对待穷困的话，然而在道德修养上却还未到家。如若安步当车而自感逸乐，晚些吃饭而当做美事——那么，你心中仍然存在着“坐车”与“吃肉”的念头，正因为你胸中仍然想着“车”与“肉”，才会发出这种感叹。这说明你始终未能脱俗，因为道家主张生死、荣辱都应置之度外，怎么能心中常常想着“车”与“肉”这些俗事呢？

这篇文章，应看做苏轼追求道家哲学的一种至高境界。无事当贵、早寝当富、安步当车、

晚食当肉，这四“当”，本指处于穷困境地的人善于对待困境，已经蛮不错了，道家都视为至高境界了——然而苏轼却仍然认为“于道则未”，即在道德修养上还没有到家。他所谓的修养“到家”，是指“彻底忘掉”坐车、吃肉等“人欲”，甚至将生死、荣辱等都置之度外。对于世间凡人，这种主张似乎有点玄妙、虚妄，有点拔高得不切实际或不着边际。而实际上，苏轼一生也未能做到，对这种超凡脱俗的道家之“道”，他也只能口头倡扬或“心向往之”而已。

### 谜样的文章，活泼的口语

公昔遗余以暖肚饼<sup>[2]</sup>，其直万钱<sup>[3]</sup>。我今报公亦以暖肚饼，其价不可言。中空而无眼，故不漏；上直而无耳，故不悬；以活泼泼为内，非汤非水；以赤历历为外，非铜非铅；以念念不忘为项<sup>[4]</sup>，不解不缚；以了了常知为腹，不方不圆<sup>[5]</sup>。到希领取，如不肯承当，却以见还。

——《谢鲁元翰寄暖肚饼》<sup>[1]</sup>

### 注释

[1] 谢鲁元翰寄暖肚饼：鲁元翰，名有开，字元翰，宋代亳（bó）州谯（今属安徽亳州）人。参知政事鲁宗道之侄，好《礼》学，通《左氏春秋》，治州县，有政绩，官至中大夫。暖肚饼：疑为宋时的一种药膳；在本文中，又似以此暗指某种为人处世的哲理。本篇是对鲁元翰寄赠暖肚饼的答谢。

[2] 公昔遗余以暖肚饼：公，苏轼对鲁元翰的尊称。遗（wèi）余，赠送给我（暖肚饼）。

[3] 其直万钱：直，通“值”，价值。万钱，万贯钱，言其值钱也。

[4] 项：颈，脖子。

[5] 以了了常知为腹，不方不圆：了了，聪明、明了，古语有“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一说。常知，常常都很明白。“以了了常知为腹”即腹中（心中）聪明、明了。不方不圆，很会处世，既不古板拘谨，也不圆滑世故。

### 赏析

若要读懂此文，须先解题。这篇文章是一篇答谢之文，“谢”什么？是谢谢一个叫鲁元翰的人寄赠给我（苏轼）“暖肚饼”。接着读题下正文，再进一步“解”下去：“公”当然指的鲁元翰，即鲁有开，是苏轼同时代的仕人，好《礼》学，通《左氏春秋》，曾任杭州通判，颇有政绩，官至中大夫。正是这位鲁元翰，赠送我（苏轼）一种独特的礼品，叫做“暖肚饼”，其价值可不菲，要值万贯钱哩。而我呢，回赠他也同样用这种暖肚饼，那价值高得简直不可

言说。这“饼”中间是空的，却看不见洞眼，所以不会漏（水）；上方是直的，却没有“耳朵”，所以难以悬挂。这饼内部活活泼泼的，却既非汤又非水；外边亮亮闪闪的，却既不是铜又不是铅。（这饼）以念念不忘为颈脖，却不用解开也不需捆缚；（这饼）以聪明和知晓日常事物为腹，却既不方也不圆。这东西送到时要及时领取；若是你不肯接受，望请付还给我。

初读似有不解——这似乎是一篇“谜”一样的文章，读来读去，也不知“暖肚饼”为何物，似乎被“搅”糊涂了。苏东坡与鲁元翰，二人送来送去的都是这种奇奇怪怪的“暖肚饼”。此物似有形又似无形，似为实物却更像虚拟之物。那么，苏轼获赠和赠人的“暖肚饼”究为何物呢？我们不妨理解为一种隐伏于“谜语”之中的虚拟之物；或者理解为生性诙谐的苏东坡拿这种谜语似的虚拟之物与朋友开了个玩笑。当然，也可能是“暖肚饼”实有其物，送来送去，却被苏东坡将其虚拟化、隐喻化了，也即将它“异化”为一种处世哲理，一种人生哲学了。通篇文章幽默中寄寓形象，似乎这种虚拟的“饼”虽然不能吃在嘴里，却可以暖一暖朋友的心。“不漏”、“不悬”、“活泼泼”、“赤历历”、“非汤非水”、“非铜非铅”、“不解不缚”、“不方不圆”，真是稀罕之物、古怪之物、异形之物、虚有之物啊！然而又是寻常之物、活泼之物、赤诚之物、难忘之物啊！这个“谜语”很难猜透，却寄寓着苏轼对友人的厚爱之心、友善之心。从内容上，似只能这样理解。而从语言上，则可从中学到不少形象可感、铿锵有力、饶有情趣、富有哲理的民间口语，以及这些口语在宋朝那个年代，在当时文人们笔下的活用。

### 辟谷之法，焉能解饥？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测。有人堕其中不能出，饥甚，见龟蛇无数，每旦辄引首东望<sup>[2]</sup>，吸初日光咽之，其人亦随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复饥，身轻力强。后卒还家，不食，不知其所终。此晋武帝<sup>[3]</sup>时事。辟谷之法以百数<sup>[4]</sup>，此为上，妙法止于此。能服玉泉，使铅汞具体<sup>[5]</sup>，去仙不远矣。此法甚易知易行，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则？虚一而静者，世无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贵，吾方有绝粮之忧<sup>[6]</sup>，欲与过子共行此法，故书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记。

——《辟谷说》<sup>[1]</sup>

## 注释

[1] 此篇系苏轼于元符二年（1099）四月十九日作于儋耳。

[2] 每旦辄引首东望：每旦，每日清晨。辄(zhé)，便。引首东望，昂起头向东方张望。

[3] 晋武帝：即司马炎，晋朝的建立者，字安世，司马昭长子，继昭为魏国相国、晋王。不久代魏称帝，建立晋朝。灭吴后统一全国，是为西晋。

[4] 辟谷之法以百数：辟谷之法，有百种之多。古称行导引之术，言辟开（不食）五谷，可以长生。道家附会为神仙入道之术。以百数，有百种以上。

[5] 能服玉泉，使铅汞具体：玉泉，据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卷十：“服玉泉法，坚齿发，除百病。玉泉者，舌下两脉津液也。”又，铅汞，《金丹大要》序云：“铅汞归鼎，身心不动”。道家以铅及汞入鼎炼丹，谓服之可以长生，因亦谓炼丹之事曰铅汞。使铅汞具体，使唾液中所含的铅、汞等元素以及精血之类能够具备于体中。

[6] 僮耳米贵，吾方有绝粮之忧：其时苏轼谪居儋耳“蛮荒之地”，已达四年。其生活日窘，以至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时政敌董必察访广西，遣使臣过海，把苏轼父子逐出官舍，遂买地筑屋，居于陋室“桄榔庵”。“墨灶火大发，几焚屋，救灭……余松明一车，仍以照夜。”值儋耳米贵，轼有绝粮之忧。其时轼已六十四岁，垂垂老矣，与子苏过相依为命，艰辛度日。

## 赏析

元符二年（1099），苏轼正谪居儋州（儋耳），处境甚为窘迫，生活亦感艰难。适逢儋耳粮米昂贵，以至家中有绝粮断食之忧。苏轼想到，以前曾听人讲授“辟谷”之法，似能“疗”饥。于是将此法书写出来，授予随行儋耳的幼子苏过，父子欲“共行此法”以度饥荒。

“辟谷”是怎样的一种方法呢？简言之，古代行导引之术的人，“辟开”（不食）五谷，以求长生，称为“辟谷”。后来一些方士、道家便加以总结，附会为神仙入道之术，使之在迷信的人们中间传播。最早的说法，是洛阳（洛下）发现一个深不可测的洞穴，有人不慎坠落洞中，而没法爬出。此人极度饥饿时，发现有数不尽的龟、蛇，每天早晨便昂起头来往东方张望，吸纳初升太阳的光芒而吞咽之。于是坠落洞中的这人便仿效着这些龟、蛇“引首东望”的方向，不停地吸纳。如此便不再饥饿，且变得身轻力壮。后来此人终于回到家里，从此不吃不饮，最后不知去向。这则传说，是晋武帝司马炎当政的西晋时代（265~290）的事。这种“辟谷”之法，古人称为行“导引”之术，不食五谷，亦可长生。道家附会为神仙入道之术。此法总有上百种之多吧，而前面故事中的这种说法是比较畅行的，最妙的办法亦不过如此。坠井而久饿不死，是因为此人能吞咽口中

的津液，使唾液中所含的铅、汞等元素以及精血之类能够储备于体中，这就离修行成仙不远了。然而这种奇妙的方法，表面看来易知、易行，可惜普天之下，知者甚少，甚至无人能知；而知道的人又往往不能付诸行动，这是什么原因呢？能做到老子倡导的“虚静说”，即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人，天下几乎没有啊！

这种“辟谷”之法，本是道家、方士宣扬的长生之术，难免带有夸大其作用的神秘色彩。不过，行“辟谷”之法的修行者，常常在一段时间内尽可能少地依靠外物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用“辟谷”使自己达到神清气爽的境地。作为宋代人的苏东坡，亦难辨识其“养生”之外的迷信部分，这正是他的局限性。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苏东坡当时地处偏远儋耳“瘴疠之地”，适逢儋耳米贵，致使饥寒交迫，几近绝粮；他不禁记起这种解饥疗渴、不食五谷的“辟谷”之法，想与幼子苏过“共行此法”以度饥荒，便书写下来，传授给苏过。这确是出于无奈的辛酸之举，值得后人理解与同情。

徐康，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职称。

## （上接第64页）

[16] (清)毕沅撰、张沛校点《关中胜迹图志》，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

[17] (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18] (清)彭定求等编、陈尚君补辑、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中华书局1999年版。

[19] 曾枣庄《苏洵图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0] 曹鹏雁《青泥岭与青泥古道的文化内涵》，2013年10月在陇南师专文史研讨会上的专题发言。

[21] 谨案：浊水即白水也，宋时依之开路，谓之白水路”。今“十天高速”（十堰至天水）有路段依“白水”（今洛河）而行于山间，路旁的“大石碑”石刻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

[22] (宋)张方平著、郑涵点校《乐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3] 彭清宜《赵抃入蜀及蜀中诗歌创作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24] 王自立先生《史苑钩沉：方騤驿与陈平道》。

[25] 孙启祥《蜀道——金牛古道演变考》，《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尧军，华夏苏东坡文化传播中心理事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 我与三苏祠

## ——《三苏评传》又序

曾枣庄

我想，很少有一个人，在数十年前偶然着手一项影响他一生的工作时，能想到他已经与一座祠堂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很少有一个人，毕生的研究耕耘，会与一座离他不远的祠堂，有完全分不开的关系；很少有一个人，一生的景仰和探寻，其实冥冥之中就是源于一座祠堂；很少有一个人，一生的努力，会得到一座祠堂如此不遗余力的支持；很少有一个人，会认为他一生的心血和积累，只有回归一座祠堂，才有回家的感觉，像堂主之一东坡先生所说——“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个幸运的人是我，这座祠堂就是先贤诞生之地——四川眉山三苏祠。

其实这个人不仅仅是我，是世界上所有景仰三苏的人，是世界上所有膜拜三苏祠的人；这座祠堂，也不仅仅是三苏祠，是三苏父子足迹曾经到过的每一个地方，是三苏父子曾经歌咏赞美过的每一寸土地。

我，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不过是千千万万热爱三苏、膜拜三苏祠的人群中的一员，微不足道，却不能不说三苏祠：

三苏祠，位于四川西南眉山市中心城区纱縠行南段，分别距成都、乐山八十公里，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故居。元代延祐三年（1316）之前，三苏故居即改宅为祠，建有规模较小的三苏堂，祭祀三苏由此始。明代洪武二十九年（1396）增修扩建。《四川通志》载：“三苏祠，在川治西南，即纱縠行苏洵故宅，元代为祠，洪武间重修。”不幸明末毁于兵燹。清康熙四年（1665），在原址上模拟重建，现已成为占地百余亩的古典式园林。三苏祠庭院，一直是文人墨客和民众拜祭先贤三苏的地方，经数百年营造，红墙环抱，绿水萦绕，荷池相通，古木扶疏，小桥频架；堂馆亭榭，错落有致，掩映于翠竹浓荫之中，形成“三分水，二分竹”的岛居特色。其楼台亭榭，古朴典雅；其匾额对联，词意隽永。祠内有苏洵、苏轼、苏辙、程夫人、苏八娘等人的塑像，

供奉着眉山始祖苏味道的塑像和列代先祖君的牌位。有木假山堂、古井、洗砚池、荔枝树等苏家遗迹；有宋、明、清及近代碑石 150 余通（《苏祠漫步》记录为 155 通），其中苏轼手迹刻石 80 余通（《苏祠漫步》记录为 83 通），收藏有上万件有关三苏的文献资料和文物。三苏祠是蜀中最负盛名的人文景观，是国内规模最大、唯一具有本源性的三苏遗迹，是全世界热爱三苏的人们以及苏氏宗亲的圣地。所以元人欧阳玄说：“眉山昔日生三苏，一山草木为之枯。”清代宰相张鹏翮说：“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朱德元帅说：“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嵋共比高。”

如果说要尽我与三苏祠的点点滴滴，那么这部《三苏评传》恐怕要改名《三苏祠传》，点到为止吧：

自 1980 年至今三十多年，三苏祠历任馆长胡惠芬女士、周华君先生、王志超先生、宋奔先生、李伟先生、杨常沙先生、陈仲文先生，均对我个人及所有海内外苏学研究者、三苏爱好者和苏氏宗亲的工作和诉求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借此深表谢意！

1980 年，三苏祠与当时的县文化局、四川省社科院文研所、四川大学中文系联合成立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首次会议于九月十二日在三苏祠飨殿内举行，首批会员来自全国各地，共六十一人，著名学者杨明照先生任首任会长。我有幸亲临盛会，有幸为杨先生代笔撰稿。重要的是，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成立，一步步奠定了苏轼研究全国化、国际化、周期化的模式，成果斐然。

2009 年，苏洵诞辰一千周年之际，三苏祠协助举办了全国首届苏洵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苏洵研究——全国首届苏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结束了长期以来三苏研究中重东坡、轻老泉（苏洵）的局面。

（下转第 79 页）

# 一读一回新

## ——简评《重编三苏〈南行集〉》

胡先酉

《重编三苏〈南行集〉》是眉山本土苏学专家张忠全先生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完成的一本编著，该书于2014年10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志烈先生在为该书所写的《重编三苏〈南行集〉》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断断续续地看书稿(即《重编〈南行集〉》之书稿)。这些诗文，我几十年来全部读过，但现在读来，却冒出不少新的感受。我忽然想到冯至先生1981年在《草堂》创刊号上的文章中说到杜诗“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上白帝城二首之一》)时，提出一个观点：“杜甫含变态，一读一回新。”冯至先生说：“杜诗能变吗？当然不会变。但由于它的内容太丰富了，读者不能一览无余，这次看到这一方面，那次看到那一方面，所以使人感到‘含变态’，但杜诗本身还保持它的‘万古春’。此外，时代在变，读者的思想也在变，由于时代不同以及个人思想的转变，对于杜甫也有不同的看法。”《南行集》中的诗文，我以前读，是作为他们著作的一部分来作面上了解的，现在读，是把《南行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所以我自然地套用冯至先生的话，感到“苏诗含变态，一读一回新”了。

张志烈先生的这段话，既是谈自己读了《重编三苏〈南行集〉》书稿的感受，也可以说是对这本书的高度评价。我在读了忠全先生的这本书后，的确感到《重编三苏〈南行集〉》最鲜明特点就在“一读一回新”的“新”上面。

《重编三苏〈南行集〉》的“新”首先体现在对《南行集》篇目的“求其全”上，关于这点，笔者着重以《重编三苏〈南行集〉》中的《南行前集》来说明。苏轼在《南行前集叙》中说：

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奕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谓之《南行集》。

苏轼的这几句话透露了关于《南行前集》的三个信息：一是说明了该集是苏轼亲自编辑而成的，而且很大可能是苏轼自己编的第一部诗文集；二是说明了《南行前集》写作的时间及相关的情况；三是说明该集所收诗文的总篇目数为“一百篇”。可是这本由苏轼亲手编的第一部诗文集竟然失传，后人仅从三苏的其他诗文集中搜到七十一篇。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一说“所云凡一百篇而截止于十二月八日以前作者，已佚去二十九篇矣”，“不可求其全”了。

“不可求其全”，这毕竟是一件憾事，而《重编三苏〈南行集〉》不同于其他编注本之处，就在于其尽力弥补这一遗憾。就以苏轼在《南行前集》中的诗文来看，笔者比较了《重编三苏〈南行集〉》中《南行前集》所编的篇目与曾枣庄、舒大刚二位先生所编的《三苏全书》(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和三读藏图书馆所编的《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相关篇目，就看出有着明显的不同。《三苏全书》《苏东坡全集》的相同之处是都把《南行前集》置于苏轼诗文的开首，且都是“自郭

纶》起至《咏至喜堂》止”，不同之处是《苏东坡全集》中的《南行前集》只有四十首，比《三苏全书》少了《严颜碑》《永安宫》两首。《三苏全书》的编者在《苏轼诗集叙录》中说：“本书想为苏轼研究者提供较全面的研究资料，故以纪昀《评苏文忠公诗》为底本，因为纪昀是以查注为底本进行评论的，而查注是清初比较重要的苏诗注本。”由此可见，《三苏全书》中的《南行前集》之所以是四十二首，正是因其以查注为底本，这与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一说苏轼在《南行前集》中的诗“查注据外集从邵本续补遗采编卷一者，自《郭纶》起至《咏至喜堂》止，凡四十二首”是一致的。而三读藏图书馆所编的《苏东坡全集》对所编诗文取于何处，却无一字说明，所以其所编《南行前集》以什么为底本，何以只有四十首，也就不得而知了。

《重编三苏〈南行集〉》在《南行前集》选有苏轼的诗文五十一篇（不含《南行前集叙》），比《三苏全书》中的《南行前集》多了九篇，在“求其全”上尽了最大的努力。这增加的九篇是：《书烂柯洞》、《治易洞》、《万州太守高公宿约游岑公洞，而夜雨连明，戏赠二小诗》、《滟滪堆赋》、《和张均题峡山》、《戏题巫山县用杜子美韵》、《屈原庙赋》、《题三游洞石壁》、《雪诗八首》。对于何以要将这九篇收入《南行前集》的理由，编者也分别作了说明。对何以要编入《书烂柯洞》，编者说：“苏轼的诗，选集不载。三苏父子在准备南行时，游龙岩，探烂柯洞也就十分可能。嘉州也有烂柯洞，这是方志上说的。所以，编者也将此诗选编入《南行前集》中。”对编入《屈原庙赋》的理由，编者说：“《东坡集》及郎晔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均把此赋编在《昆阳城赋》之前；而《昆阳城赋》肯定作于这次南行赴京，途经昆阳（今河南叶县）时作，有苏洵的《昆阳城》诗可证。‘浮扁舟以适楚兮’与苏轼《南行前集叙》‘侍行适楚’用语与也相同，可见此赋当为南行途中所作。故编者将此赋亦编于《南行集》中。”再如对于把《雪诗八首》编入《南行前集》的理由，编者更是作了详尽的说明：“冯应榴说：

‘《锦绣万花谷·雪类》载：东坡以“声、色、气、味、富、贵、势、力”为八章，仍效欧阳体，不使“盐、玉、鸥、鹭、皓、鲜、白、素”等字。考先生《南行集》内，有《江上值雪效欧阳体》。此八章或系同时作，故云仍效也。但《万花谷》所采诗家姓氏，舛误甚多，未可全信；且诗意浅俗，不似

先生手笔，故查氏不采耳。今姑附录。’（《苏文忠公诗合注》卷五十）可见冯应榴对此诗持保留态度。但‘但《万花谷》所采诗家姓氏，舛误甚多’，不足以证明此诗作者姓氏必误；‘诗意浅俗’，这正是历代《竹枝歌》风味，与苏轼《南行集》的《竹枝歌》九章有些相似。特别是《锦绣万花谷·雪类》说‘仍效欧阳体’的‘仍效’二字，更证明此诗是继《江上值雪效欧阳体》而作。此外，诗中用语亦多与《南行集》中诗用语类似，如‘山林酒价高’，即《出峡》所谓‘新滩阻风雪，……茅屋洁林酿’；‘惠山泉冷酿泉清’，即《虾蟆背》诗所谓‘岂惟煮茶好，酿酒应无敌’；‘天工呈瑞足人心’，即《江上值雪》所谓‘岂有一天天工为’，‘天工临轩喜有麦，宰相献寿嘉及时’；‘平地今闻一尺深’，即前诗所谓‘沙上盈尺江无澌’，‘下满坑谷高陵危’。用语相似，说明描写的为同一环境，这八首诗为苏轼所作是大体可以肯定的。”

《重编三苏〈南行集〉》在增选篇目而“求其全”中，笔者觉得做得好的另一点是对同一篇目出现在不同作者的集子里时，并没有一味地肯定它们就只属于苏轼的，而是采取一种客观的态度将其情况说出来，让读者自己去评判。如对《万州太守高公宿约游岑公洞，而夜雨连明，戏赠二小诗》作说明时说：“此二诗载苏轼诗集卷五十，又见《黄山谷集》，为他集互见诗。因题中有戏赠二字，若为苏轼所作，‘春江一夜雨连明’则应非指时令，故编者将其编入《南行前集》诗中。”又如在对《戏题巫山县用杜子美韵》作说明时说：“此题只有苏轼有诗。原诗亦载《山谷集》。查慎行注苏诗：‘按杜集《巫山题壁》诗所云“卧病巴东久，今年强作归”，即此诗韵。’

三苏的诗文数以万计，光苏轼的诗就有数千，编者要在如此众多的作品中为“求其全”而寻找出《南行集》里的诗文，其所用心力之巨，真令笔者钦佩。

《重编三苏〈南行集〉》的“新”还体现在编者的《前言》中。选集的《前言》，通常是对所选作品的作者基本情况、创作背景、主要内容及其价值作说明。而该书除了做到这一点外，其不同于一般《前言》之处就是在（三）、（五）这两部分中，对《重编三苏〈南行集〉》中编者认为特别重要的诗文、三苏父子不同的诗风作了说明，体现出该书“一读一回新”的独特视角。

在（三）里，编者主要对《南行前集叙》、《州中听大人弹琴》这两篇诗文作说明。编者首先指出：“苏轼的《南行前集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论，它扼要地阐明了三苏父子一系列重要的文艺主张。”接着便进行分析：“苏洵的《与杨节推书》已经强调了文章应该是现实的真实反映，应该是‘耳目相接’的产物。苏轼此《叙》进一步强调文艺作品不只是现实的反映，而且还应是现实触动了作者的心弦而抒发出来的感情，‘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文艺作品应以情动人，离开了‘有触于中’，现实还没有打动自己，是无法用以感动别人的。在这篇《叙》中，苏轼集中阐述了文贵自然的思想。他们反对为文而文（‘勉强所为之文’），他说他们‘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认为‘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古之圣人有不能自己而作者，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花实，风水相激之波纹，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都是‘不能不为’，‘不能自己’的产物。在南行途中，苏轼兄弟作有《屈原塔》诗，《屈原庙赋》，苏轼还作有《阮籍啸台》、《夷陵县欧阳永叔至喜堂》诗。这些古今‘为文者’的光辉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不能不为’、‘不能自己’之作。”而对《州中听大人弹琴》，编者说：“苏轼兄弟的《州中听大人弹琴》诗表现了三苏父子的艺术趣味，他们都爱好古代的雅乐：‘《风松》《瀑布》已清绝，更爱《玉佩》声琅珰。……江空月出人响绝，夜阑更请弹《文王》’（苏轼）；他们都不满世俗的‘新曲’：‘世人嚣嚣好丝竹，撞钟击鼓浪为荣。安知江琴韵超绝，摆耳大笑不肯听。’（苏辙）苏辙诗中还讲了一个伯牙沧海学琴的故事，也表现了三苏崇尚自然的文艺思想。伯牙学琴，‘学之三年终无成’，后来随师过海，闻海水激荡，林鸟悲鸣之音，受着大自然的陶冶，‘翻回荡潏有遗韵，琴意忽从从此生’，遂成为著名琴师。”在以上分析之后，编者作总结说：“以上这些观点，特别是《南行前集叙》中的观点，既是《南行集》创作的指导思想，也是三苏父子一生遵循的写作原则。”

编者在《前言》（三）里的这些分析，既体现了“一读一回新”的新视角，也引导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三苏诗文。

对于三苏父子不同的诗风，在《前言》（五）中，编者一开始就指出：“《南行集》现存的诗文中，除赋五篇、书两封、墓志铭两篇、叙赞各一篇外，其

余都是诗，且有不少是同题分韵，我们可以据此比较三苏的不同诗风。”接下来，就分别以《南行集》中的诗，对“三苏的不同诗风”作具体说明。

对苏洵的诗风，编者先引用叶梦得《避暑录话》中对苏洵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的评价，然后举出《南行集》里的《题白帝庙》，简要分析后指出“确实堪称‘精深有味’”，再举出《昆阳城》，作了简析后说：“所谓苏洵诗皆有为而作，‘语不徒发’，就是指这一类诗篇。”

对于苏轼兄弟的诗风，编者先用“《南行集》中诗，对苏洵来说已是晚年之作，对苏轼兄弟来说却是少作，是他们存世最早的诗篇。但这些少作在立意谋篇，造语炼字上已表现得相当成熟”这几句话来指出苏轼兄弟在《南行集》中体现出的“立意谋篇，造语炼字上已表现得相当成熟”诗风共同点，接着，就举出兄弟二人在《南行集》中的同题诗，分析其不同的诗风。编者在对苏轼兄弟所作的《竹枝歌》作简要说明后就举出《入峡》来分析，先指出苏轼的《入峡》诗是“结构严密，不紧不慢，舒缓有致，给人以一唱三叹的节奏感”，然后用“苏辙的同题诗也是一篇精心之作，无论写峡中景色，还是写夏禹治水的传说，都形象生动，语言峭拔，但不如苏轼诗的‘宽然有余’”来说明兄弟二人的不同之处。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苏轼兄弟的不同诗风，编者在引用张耒《赠李德载》“长公波涛万顷海，少公竦泗千寻麓”、方回《瀛奎律髓》“子瞻浩博无涯，所谓诗涛汹涌之也”“子由诗静淡有味，不拘字面事料之丽，而锻意深，下句熟”对苏轼兄弟诗风的评价后，又举出《郭纶》这一同题诗分析：“苏轼的《郭纶》，是一篇长达二百九十字的五古，……全诗确实写得来‘静淡有味’，……堪称‘锻意深，下句熟’。苏轼的《郭纶》是七古，仅五十六字，立旨与苏轼诗相同，而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完全不同，……全诗气势磅礴，语言凝练，与苏轼娓娓叙事的手法迥然不同。”此外，编者还举出《舟中听大人弹琴》《江上看山》等同题、同体诗来说明苏轼兄弟的不同诗风。

《前言》（五）中对三苏的不同诗风的分析，对读者赏析《南行集》是有较大帮助作用的。

《重编三苏〈南行集〉》的“注”也是其“新”的一个方面。古诗文“注”的作用在于用今天的简明语言将古语解说得浅显易懂。将三读藏图书馆所编的《苏东坡全集》与《重编三苏〈南行集〉》的“注”

作比较，明显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做得好。如苏轼《郭纶》诗的注，《苏东坡全集》是在八句诗的每句末尾作注，共八个注，但很少对句中的词语用现代汉语作解说，大多是说这句中的某个词语出自前人的某篇作品，这样一来，让读者既不能弄清意思，又觉得该篇好像是将前人的作品剪下来拼凑而成；该书的注基本上是这样的。而《重编三苏〈南行集〉》虽然也基本上是在每句诗末尾作注，但在解说时，则是对该句中需要解说的词语用简明易懂的现代汉语来解释。如苏轼《郭纶》共十一个注，其中第一个注解说诗题，其余十个注是用简明易懂的现代汉语对诗中的词语作解说，让读者一看就懂，即便是有引用解说的地方，都是先用现代汉语将其意思解说后，再作引用，以佐证其解说。正如张志烈先生《重编三苏〈南行集〉序》中所说：“本书注释文字，都精省扼要，简明直捷。”这个评价，笔者十分认可。

而《重编三苏〈南行集〉》的“注”的“新”更充分的是体现在其诗文标题所作的注上。仍引张志烈先生《重编三苏〈南行集〉序》来说明：“第一条注大都指出诗（文）章词语段落，点明全篇主旨，给读者提供理解参考。”能在诗文标题注中“指出诗（文）章词语段落，点明全篇主旨，给读者提供理解参考”这点，就笔者所读过的各种编著中，并不多见，这也体现其“新”之处。

张志烈先生还对该书在“注”中对“有疑惑的地方，照直说出，与读者坦诚交流”这一点十分首肯，他还特地举出对苏辙《巫山庙》注中的“此诗似作于治平三年秋苏辙兄弟扶父丧返川时，而非

《南行集》中诗。因这次是自蜀至楚，似不应说‘入楚泝巴蜀’；时间是冬天，也不应当说‘秋水高’；是出川，不应说‘归来’。但《栾城集》为苏辙所手定，而各种版本的《栾城集》，此诗都排在《入峡》及《巫山庙》之间，故仍录于此”这一注语给予说明。

而“有疑惑的地方，照直说出，与读者坦诚交流”这点，的确显得与众不同。对此，笔者再举几例说明。如对苏洵《初发嘉州》“心期京国十年还”中的“十年”的注说道：“‘十年’疑有误，此次赴京距嘉祐二年（1057）离京仅两年；若指苏洵景祐四年（1037）沿江东下，再陆行北上赴京，至此时已二十三年；故‘十’似为‘二’或‘廿’之误。”又如对苏辙《题仙都观》“道士白发尊，面黑岚气

染”的注说：“一二句写仙都观道士发白面黑。八年后苏轼兄弟扶父丧返川，‘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阴真君《长生金丹诀》石本相示。’不知这次所遇道士是否为同一人。”再如对苏轼《和张均题峡山》的注说：“张均：未详其人，苏洵有《答张子立见寄》，或为一人。”上述三例，第一个是对时间的解说，其余两个是对人物的解说，解说中用“疑”“似”“是否”“未详”“或”这类并不决断的词语，体现出“有疑惑的地方，照直说出，与读者坦诚交流”的态度，这样的情况，在其他编著中是极少看见的。

此外，《重编三苏〈南行集〉》还在书中配有三十多幅图，多为《南行集》中所涉及地点的风景名胜图，这既与诗文的内容有机结合，又让读者在阅读时边赏析诗文边观赏风景名胜，真可谓是该书的又一“新”意。

胡先酉，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 韩国苏轼研究述略（七）

〔韩〕洪瑀钦

附下面的《东坡诗抄》17首：

- (1) 同正辅表兄游白水山、(2) 次正辅游白水山韵、(3) 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留待风水洞、(4) 过江夜行武昌山闻黄州鼓角、
- (5) 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了不相知至梧闻其尚在藤作诗示之、(6) 将至筠州先寄迟适远三犹子、(7) 中秋见月和子由、(8) 九日黄楼、
- (9) 定惠院月夜偶出、(10) 次前韵、(11) 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12) 安国寺寻春、(13) 游径山、(14) 游道场何山、(15) 武昌西山、
- (16) 再用前韵、(17) 大雪寄孔周翰。

2.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本《东坡源流》上下卷：

《东坡源流》上：

- (1) 欧阳修、(2) 梅尧臣、(3) 苏舜钦、
- (4) 蔡襄、(5) 余靖、(6) 赵抃、(7) 林逋、
- (8) 石延年、(9) 张先、(10) 刁约、(11) 滕元发、(12) 张方平、(13) 谢绛、(14) 曾巩、
- (15) 刘敞、(16) 贾收、(17) 李觏、(18) 张景、(19) 王安石、(20) 王安国、(21) 王钦臣、
- (22) 郑侠、(23) 吕惠卿、(24) 刘景文、(25) 郭祥正、(26) 王逵、(27) 王介、(28) 蔡肇、
- (29) 王珪、(30) 蔡挺、(31) 蔡确、(32) 章惇、(33) 元绛、(34) 苏洵、(35) 苏轼、(36) 苏辙、(37) 黄庭坚、(38) 秦观、(39) 秦觏、
- (40) 张耒、(41) 晁补之。

《东坡源流》下：

- (1) 文同、(2) 赵令畤、(3) 孙贲、(4) 陈慥、(5) 王诜、(6) 王巩、(7) 孔文仲、(8) 孔武仲、(9) 孔平仲、(10) 李廌、(11) 晁冲之、(12) 陈师道、(13) 米芾、(14) 李伯时、
- (15) 佛印禅法师、(16) 辩才、(17) 释道潜(參寥)、(18) 僧仲殊、(19) 周韶、(20) 杨杰、(21) 张舜民、(22) 贺铸、(23) 胡致隆、
- (24) 潘大临、(25) 谢逸、(26) 徐俯、(27) 饶节、(28) 僧惠洪、(29) 李清照、(30) 朱淑真、(31) 韩驹、(32) 晁说之、(33) 张商英、
- (34) 王安中、(35) 唐庚、(36) 邢居实、(37) 孙觌、(38) 汪藻、(39) 周紫芝、(40) 陈师锡。

附《东坡诗抄》17首，与汉城大学本同。

3. 成均馆大学本《东坡源流》上下卷：

介绍的人名与上面的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本一样。所附《东坡诗抄》亦与汉城大学本同。

4. 琴氏本《东坡源流》上下卷：

《东坡源流》上：

- (1) 欧阳修、(2) 梅尧臣、(3) 苏舜钦、
- (4) 蔡襄、(5) 余靖、(6) 赵抃、(7) 林逋、
- (8) 石延年、(9) 张先、(10) 刁约、(11) 滕元发、(12) 张方平、(13) 谢绛、(14) 曾巩、
- (15) 刘敞、(16) 贾收、(17) 李觏、(18) 张景、(19) 王安国、(20) 王钦臣、(21) 郑侠、
- (22) 吕惠卿、(23) 刘景文、(24) 郭祥正、
- (25) 王逵、(26) 王介、(27) 蔡肇、(28) 王珪、(29) 蔡挺、(30) 蔡确、(31) 章惇、(32) 元绛、(33) 苏洵、(34) 苏轼、(35) 李颐。

《东坡源流》下：

- (1) 苏辙、(2) 黄庭坚、(3) 秦观、(4) 张耒、(5) 晁补之、(6) 文同、(7) 赵令畤、
- (8) 孙贲、(9) 陈慥、(10) 王诜、(11) 王巩、
- (12) 孔文仲、(13) 孔武仲、(14) 孔平仲、
- (15) 李廌、(16) 晁冲之、(17) 陈师道、(18) 米芾、(19) 李伯时、(20) 佛印禅法师、(21) 辩才(22) 释道潜(參寥)、(23) 僧仲殊、(24) 周韶、(25) 张舜民、(26) 杨杰、(27) 贺铸、
- (28) 胡致隆、(29) 潘大临、(30) 谢无逸、
- (31) 徐俯、(32) 饶节、(33) 僧惠洪、(34) 李清照、(35) 朱淑真、(36) 韩驹、(37) 晁说之、(38) 张商英、(39) 王安中、(40) 唐庚、
- (41) 邢居实、(42) 孙觌、(43) 汪藻、(44) 周紫芝、(45) 陈师锡。

附著《东坡诗抄》、自《天目山不闻雷震》至《和赵景贶栽桧》共133首。

5. 洪氏本《东坡源流》上下卷：

《东坡源流》上：

- (1) 欧阳修、(2) 梅尧臣、(3) 苏舜钦、
- (4) 蔡襄、(5) 余靖、(6) 赵抃、(7) 林逋、
- (8) 石延年、(9) 张先(10) 刁约、(11) 刁麟、(12) 滕元发、(13) 张方平、(14) 苏轼。

《东坡源流》下：

- (1) 苏辙、(2) 黄庭坚、(3) 秦观、(4)

秦观、(5)张耒、(6)晁补之、(7)文同、(8)赵令畤、(9)陈慥、(10)王诜、(11)王巩、(12)孔文仲、(13)孔武仲、(14)孔平仲、(16)李廌、(17)晁冲之、(18)陈师道、(19)米芾、(20)佛印禅法师、(21)辩才(22)释道潜(参寥)、(23)僧仲殊、(24)周韶、(25)胡楚、(26)龙靓、(27)张舜民、(28)杨杰、(29)贺铸、(30)胡致隆、(31)潘大临、(32)谢逸、(33)徐俯、(34)饶节、(35)僧惠洪、(36)李清照、(37)朱淑真、(38)韩驹、(39)晁说之、(40)张商英、(41)王安中、(42)唐庚、(43)邢居实、(44)孙觌、(45)汪藻、(46)周紫芝、(47)陈师锡、(48)苏洵、(49)曾巩、(50)刘敞(原父)、(51)刘攽(贡父)、(52)贾收、(53)李觏、(54)张景、(55)王安石、(56)王安国、(57)王钦臣、(58)郑侠、(59)吕惠卿、(60)刘景文、(61)郭祥正、(62)王逵、(63)王介、(64)蔡肇、(65)元绛。

附《东坡诗抄》13首，与汉城大学本同，而末尾5首缺落。

上面5种书所分上下卷、记述的人名及人数，排列人名的次序，只有小小的差异，而在全体人名和人数上没有什么大差异。附录的诗也是琴氏本以外诸本都一样。所以，这5种写本《东坡源流》，一定是以一个原本为底本而抄写的。

另外一种岭南大学本《东坡源流》，简单地介绍苏轼的年谱、文学作品、有关苏轼的奇闻逸事等，凡348个题目：

(1)苏轼年谱抄略、(2)率子廉传(上有方山子传，原书无“山”字)、(3)僧圆泽传、(4)思堂记、(5)答李端叔书(上有游桓山记)、(6)答秦太虚书、(7)答毕中举书、(8)答刘沔都曹书、(9)与叶庭叔书、(10)邵茂诚诗集序、(11)观宋复古画序、(12)祭韩魏公文、(13)祭陈君式文、(14)徐州祭枯骨文、(15)祈雨吴山文、(16)六一泉铭、(17)参寥泉铭、(18)陆道士墓志铭、(19)乳母任氏墓志铭、(20)保母杨氏墓志铭、(21)天石砚铭、(22)龙尾砚铭、(23)端砚铭、(24)凤喙砚铭、(25)迈砚铭、(26)裙靴铭、(27)菩萨泉铭、(28)孔北海赞、(29)桂酒颂、(30)羹颂、(31)后杞菊赋、(32)服胡麻赋、(33)洞庭春色赋、(34)中山松醪赋、(35)志林杂流、(36)记刘原父诰、(37)伤春词、(38)刘廷式取盲女、(39)书孟德后传、(40)书欧阳公黄牛庙诗后、(41)书韩魏公黄州诗后、(42)书蒲永昇画后、

(43)药颂、(44)跋王氏华严经解(上有太息说)、(45)酒经、(46)文定知人(张方平别集)、(47)奏展科限、(48)两宰相、(50)诗戒莫吟、(51)杨妻送词、(52)狱中昼寐、(53)得二文士、(54)诗寄子由、(55)见书吐血、(56)辙食嗟叹、(57)发书大笑、(58)宿逍遙堂、(59)黄楼羽衣、(60)玉带留镇、(61)琴调参禅、(62)判妓牒、(63)论琴诗、(63)醉翁琴、(64)破琴十三弦、(65)五祖后身、(66)前身僧、(67)毛法曹、(68)苏公堤、(69)文甫兄弟、(70)李琪乞书、(71)参寥诗、(72)藕花诗、(73)梅花步月、(74)三养、(75)水调歌、(76)红友黄封、(77)三人同梦、(78)徐凝恶诗、(79)庐山结缘、(80)穷泰不二、(81)辨广武叹、(82)狱吏慚惶、(83)莲烛归院、(84)抱石救溺、(85)都下纸贵、(86)与可墨竹、(87)紫薇花诗、(88)捧腹大笑、(89)司马牛、(90)叔孙制礼、(91)道衣南行、(92)换羊书、(93)大畜小畜、(94)诗送李廌、(95)寄子由诗、(96)仇池、(97)黄冠叱虎、(98)朝云诗、(99)悼朝云、(100)苏黄、(102)惠州绝佳、(103)白鹤新居、(104)惠州不在天上、(105)南迁二友、(106)贫儿暴富、(107)蚁浮于芥、(108)哭巢谷、(109)别相厮怀、(110)圣俞凤、(111)鹤南飞曲、(112)金山书偈、(113)放杖笑、(114)荷叶杯、(115)焚卷还屋、(116)别抄云云、(117)中州气象、(118)术士破字、(119)胡妇生子、(120)作文之法、(121)海外三书、(122)生气勃勃、(123)紫府押衙、(124)奎宿奏事、(125)六丁收卷、(126)奖论苏诗、(127)奖惜人才、(128)饭睡不足、(129)食言江神、(130)同参玉版、(131)八阵图诗、(132)蛮布琴囊、(133)子裴论文、(134)平生二事、(135)四脚棋、(136)人中龙、(137)野狐精、(138)唐人佳句、(139)而立古布、(140)诗中有画、(141)琢玉郎、(142)卯君、(143)林下风味、(144)前山后驱、(145)文举多事、(146)青灯佳趣、(147)二老亭、(148)来苏渡、(149)与可草书、(150)郊寒岛瘦、(151)嗜指、(152)摩腹、(153)三不如、(154)密云龙茶、(155)掀髯鼓掌、(156)鹿报客、(157)送渴文忠、(158)流水行云、(159)道山在惠州、(160)

维阳设客、(161)谈谐放荡、(167)黄面瞿昙、(168)白团扇、(169)虚白堂、(170)有美堂、(171)湖上待太守、(172)梅花上元、(173)苕溪桑田、(174)别抄云云、(175)石芝、(176)聚星堂、(177)冷泉亭、(178)雪浪石、(179)玉楼银海、(180)西湖长、(181)乞居吾常、(182)舍如舟、(183)莲步梅桩、(184)三苏、(185)气候不常、(186)朱元经炉药、(187)异人有无、(188)大还丹诀、(189)龙虎铅汞说、(190)待其公气术、(191)李若之布气、(192)仁祖盛德、(193)真宗信李沆、(194)英宗惜臣才、(195)神宗恶告讦、(196)永洛事、(197)彭孙谄李宪、(198)范文正谏止朝正、(199)溪洞蛮神事李师中、(200)曹玮知人料事。(201)吕公弼招致高丽、(202)黄庭言高丽通北奴、(203)范景仁定乐上殿、(204)张士逊中孔道辅、(205)杜正献焚圣语、(206)蔡延庆追服母丧、(207)王钦若沮李士衡、(208)王伯庸知人、(209)盛度责钱维演诰词、(210)韩缜酷刑、(211)韩狄盛事、(212)温公过人、(213)文忠公相、(214)张安道比孔北海、(215)刘贡父戏介甫、(216)以乐害民、(217)史经臣兄弟、(218)陈辅之不娶、(219)子由幼达、(220)马正卿守节、(221)唐允从论青苗、(222)黎檬子、(223)本秀二僧、(224)钟守素、(225)朱照僧、(226)记神清洞事(以下俱异事)、(227)空塚小儿、(228)太白山神、(229)华阴老姬、(230)猪母佛、(231)池鱼自达、(232)费孝先卦象、(233)幸思顺服盗、(234)王平甫梦灵芝宫、(235)广利王召、(236)梦弥勒殿、(237)应梦罗汉、(238)仙姑问答、(239)王翊救鹿、(240)黄鄂之风、(241)陈昱再生、(242)徐问真从欧公游、(243)道士锻铁、(244)师续梦经、(245)宰相不学、(246)广州女仙、(247)鬼附语、(248)陈太初尸解、(249)黄仆射得道、(250)寿禅师放生、(251)处子再生、(252)记先夫人不发宿藏、(253)记先夫人不残鸟雀、(254)记钱塘杀鷀、(255)记故人病、(256)记岭南竹、(257)记赵贫子语、(258)记张君宜医、(259)畏威如疾、(260)常德必吉、(261)禄有轻重、(262)德有厚薄、(263)事不能两立、(264)记先夫人二红饭语、(265)三老人论年、(266)螺蚌相语、(267)

东林第一代广惠禅师赞、(268)唐画罗汉赞、(269)水陆法像赞、(270)海月辨公真赞、(271)参寥子真赞、(272)无名和尚颂观音偈、(273)送寿星圣聪长老偈、(274)朱寿昌梁武忏赞偈、(275)十二时中偈、(276)颂海印禅师偈、(277)寒热偈、(278)佛心鉴偈、(279)王晋卿再生图偈、(280)东坡居士过龙光求大竹肩舆得两竿竹……乃留一偈、(281)南华长老示四颂事忙只还一偈、(282)密州上谢表、(283)辞免翰林学士第二状、(284)辞历日表、(285)东坡丙辰中秋欢饮大醉作《水调歌》都下传唱、(286)公守杭颍二州皆有西湖后谪惠州亦有西湖、(287)书李伯时山庄图后、(288)题赵孟頫屏风与可竹、(289)公在徐州参寥自钱塘访之、(290)跋蒲传正燕公山水、(291)跋与可画竹、(292)书陈怀立传神、(293)右军研脍图、(294)雪堂义墨、(295)记夺鲁直墨、(296)书石晋笔仙、(297)书名僧令休砚、(298)书醉翁琴操后、(299)书仲殊琴梦、(300)记公择天柱分桃、(301)书遗垂虹亭、(302)记焚山、(303)记赤壁、(304)书刘梦得、(305)记与安节饮、(306)记游定惠院、(307)书蜀公约邻、(308)书浮玉老师买田、(309)赠别王文甫、(310)泗岸喜题、(311)书鲁直浴室题名后、(312)书赠柳中矩、(313)题名杭州、(314)题万松岭惠明院壁、(315)题广州清远峡山寺、(316)书卓锡泉、(317)题罗浮、(318)记游白水岩、(319)题白水山、(320)记游松风亭、(321)记朝斗、(322)题合江楼、(323)书北极灵蘂、(324)书笠、(325)书谤、(326)书南海风土、(327)书上元夜游、(328)书城北放鱼、(329)书赠刘折僧、(330)书合浦舟行、(331)梦南轩、(332)天华宫、(333)赠古氏莊、(334)名容安亭、(335)书游灵化洞、(336)赠王元直、(337)书王定国赠吴帖、(338)书许敬宗砚、(339)衡山神禹碑跋宸翰、(340)佛经抄、(341)太古书迹(壬戌腊月念小终)。

(未完待续)

[韩]洪瑀钦，韩国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文学博士。

# 一位当代作家对苏轼的凝视

## ——郑秉谦的苏轼研究

山流水

郑秉谦是建国初期涌现的作家之一，与四川省著名作家高缨一道。高的名作是《达吉与他的父亲》，郑的名作则是《柳金刀和他的妻子》。这两个作品，60年后的现在，也常常被人提起。他是文学创作者，后来却闯入了文学研究的领域，成为苏轼研究专家。但他的研究也是为了创作，他正在写作他的历史长篇小说《东坡三贬》。

今年6月19日，郑秉谦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清泉同志，刚才我联系赖正和同志，他的家人告诉我，他一周前逝世了。可惜！可惜！真是没有想到啊！”我说：“是啊！赖先生本打算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十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不料却在6月11日会议开幕之时去世了。”郑老经常用电话联系身处眉山的我和赖正和。

2009年，我刚刚调到《苏轼研究》编辑部，宋明刚副主编把郑秉谦的信转交给我，并说他是浙江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温州大学兼职教授，是高缨介绍认识的，已把我的联系方式告诉他。由此，郑秉谦先生陆续把他的论文发给我在《苏轼研究》上刊载，计有《“乌台诗案”剖析》《东坡居士与赤壁》《东坡“朝云诗”考释》《玉雪为骨冰为魂》《谈东坡九用“吾生如寄耳”》《试谈苏轼价值观的三境界》《苏轼贬逐生涯初探》《东坡〈和陶诗〉琐谈》《东坡屡变归老地寻因》等十多篇。他的论文特色，正如《上海文学》原负责人赵自所说“写得生动活泼，不带学术论文式的呆板气”。

2011年8月26~29日常州举办“全国第十七届苏轼学术研讨会”，我才与郑秉谦先生相见，他身材颀长、身板硬朗，有军人风范，而他年轻时确实是个军人；那年虽然81岁了，但是精神矍铄，一点也不显老。他说家族有长寿基因，父辈、祖父辈都长寿，所以现在身体并无大的问题。

他说为了参加这次苏轼学术会议，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的。我问为什么，他说老伴生大病走不开，好不容易才安排妥帖。大约过了半年吧，他打电话说，住了三个月的医院，因为老伴逝世了，自己伤心过度也生病了。他在《〈苏海一瓢〉后记》说：“自从妻子去世，我只以纸笔为伴，整年忙忙碌碌，不得一日闲暇。写出来的文章，也许可能有益于读者，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后代，但它们首先有益于我自己——使我不致日益沉沦于我与妻子的往事，不致沉沦于一生的悲思。‘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呜呼！只有纸与笔才能使我超越这种情绪，使我生活过得充实。”由此可见，郑老的性情有苏轼风范。

去年10月下旬，我因创作《湖州惊魂》到湖州考察苏轼遗迹，27日顺便到杭州看望病愈出院的郑老，约定的餐馆已歇业，我们一同走到临近的“知味观”用餐。初看去，他变化不大，与四年前相比，仅头发更白而已。但他说他已有较大病患在身。他说：“组织上和朋友们担心我的《东坡三贬》还没有完成，留下遗憾。但我自己有信心活到完成的那一天。”他又说：“随着更系统深入地研究苏轼的价值观，我有了新的心得，小说已经写成的部分须作大修改。”我问什么时候可以完成，他说：“因为身已有病，恐怕得两三年吧。但我的苏轼研究文集《苏海一瓢》明年就可以出版，算是给我的研究工作画一个句号吧。”他还送了一本他前几年写的长篇传记文学《寻找英雄》给我，以作《湖州惊魂》修改之参考。

常州会议期间，赖正和先生与他一起开会，由此相交；会议结束后，赖先生还随他同去杭州。赖是去西湖游览与考察苏轼遗踪的。今年春节刚过，郑老电话告诉我，《苏海一瓢》即将出版，并将由

出版社直接寄给我四百册，请中国苏轼研究学会转赠给本学会中从事苏轼研究的一些学者。我欣然应允，并向他约稿：“我们拟在《苏轼研究》‘苏学专家’栏目，发一篇介绍你的人物通讯；此外还准备发表一篇关于《苏海一瓢》的评论。”他说杭州没有苏轼研究会一类的组织，很难找到合适的人写作书评，但他早与赖正和先生谈妥，拟请他写。我回眉山后，不久就收到他寄来的《苏海一瓢》校样，说给我写通讯时参考，并叮嘱我：“此校样用后请用平邮寄还，因我故乡的‘郑秉谦文学档案库’要保存。”但评论没有写，赖正和就去世了。通讯也没有写，因我杂事缠身，脱不开。后来，我又请郑老再提供一些材料给我，他4月3日给我一封长信，谈他研究苏轼的一些情况。现摘录如下，以代替我的叙述。他在信中说——

我的研究工作的特点是：一是因想写历史长篇小说《东坡三贬》而开始这一研究的，也就是说，是从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两个角度接近苏东坡的。因此此书副标题为《一个当代作家对九百年前大师的凝视》。二是由于苏海无涯，而我是在文学创作之余进行研究的，因此研究时间前后拖延25年，并且仅侧重于一个片面，即东坡的三次贬逐；当然兴之所至，有时也涉及了其他方面。

研究的问题有大有小。所谓大，在一个作家来说，主要指的是东坡的性格与命运。举两例：

一是用价值观来判断人，这是最重要的。而叙述价值观，不用简单的结论，而用生动的境界，或说不用理论思维而用形象思维。王国维论词，“词以境界为上”，“境界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我们论人，更其如此。东坡三贬中，胸中存在浩然、超然、廓然三个境界。浩然之气使他继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尊主泽民”。它发源于他童稚时读石介诗文而“奋厉有当世志”，初步知道正气在人的身上种种表现。贬黄州，又懂得“士以气为主”，“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惠儋之行前又完整地形成《韩文公庙碑记》的思想，开启了百余年后文天祥《正气歌》。超然之度，则使他能游于物外，不以物伤性，使自己能够“有待”于再用于世，以超然手段达到不那么超然的目的。廓然之思，则使他在惠的绍圣三年写出“吾身本无待，俯仰了此世”；使他在儋的元符三年写出“丈夫贵出世，功名岂人杰”。后一句，他是因听到苏过的读书声而作的。封建社会中读书本为求取功

名，但此时他却将这功利性的事化为无功利性的廓然。所谓廓然，无滑先无脚，无痛先无身，无尘先无镜，不死先“无死无生”，都是釜底抽薪。在整个三州贬逐时期，这三个境界都存在他心里，这是稳定性与丰富性；但不同时期却有它的变化性与侧重性，主次不同。

二是用当时的社会因素与个人天性，来判断苏轼命运多舛的原因。他一生从宦45年，其中放逐与流离道路15年。其他时期亦纷纷扰扰，不得一天安宁。一般读者都归咎于他“不能忍”的天性。这没有错，他自己就说过他心中有什么事便“如食中有蝇”，尽吐而已，“自笑平生为口忙”。他为改正自己这一致命的缺点，做尽翻案文章，说是汉高祖得天下即因他接受了张良“忍”的告戒，贾谊改革失败原因就是“不能忍”。文章虽这么写，但他自己仍是个大不“忍”者。我在承认这一因素外，更指出他的命运多舛，还有社会因素。这因素就是宋朝重文，宰相、枢密使、出兵主帅、地方官均用士人；科举取士的次数、人数比唐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太祖在寝宫立秘碑，不得杀士人及上书言事者。特别是当时的皇帝、太后们都十分欣赏苏轼，这加强了苏轼的知遇感与认同感。而知遇感、认同感越强，他便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上宋代在北西两方，一直存在强敌，统治者心理薄弱，容易以言罪人。这与强盛的大唐不同，《长恨歌》中指点本朝皇帝（“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裂土”），《石鼓歌》指点万世师表（“陋儒编诗不收入”），都没有关系；但宋朝不行。

以上是从大里说。而从小里说，我研究些什么？也举二例：

一例是东坡二妻一妾的性格异同。东坡与王弗同清贫，与王闰之同富贵共患难，与王朝云共患难，他笔下三者都是好的人生伴侣。但走入东坡内心，他们却各有深浅。……另一例则是对三首“朝云词”的判断结论与对三首《南歌子》的系年认定。……以上两例，均涉及东坡的感情领域。

郑秉谦先生的苏轼研究概况，此信已说得清楚，我就不再絮叨了，就此打住。

山流水，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 寻访望湖亭

刘清泉

八月初，渡彭蠡湖，至吴城山望湖亭，有题。  
——孔凡礼《苏轼年谱》

2012年4月17日上午，我与尧军飞抵南昌，驱车前往吴城，寻访苏轼遗迹。

吴城即吴城驿，是江西四大名镇之一。苏轼贬谪岭南，曾舟抵吴城驿，足登吴城山，题诗望湖亭。尧军说：“去吴城，夙愿得偿，快哉！”说毕，朗诵苏轼的《望湖亭》诗曰：

八月渡长湖，萧条万象疏。  
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  
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  
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

出南昌，至建昌（今永修），沿修水，转乡间。尧军一边开车一边说：“鄱阳湖狭长达200多公里，吴城在其南端。”他已经踏访了500多处苏轼遗址遗迹，行程已达4万公里。我们独来独往，边走边问，时走时停。许久，见到“中国第一大湖泊——鄱阳湖”的标志建筑，这儿应该是鄱阳湖管理处吧！

车跃过鄱阳湖的堤坝，进入湖区。湖盆里没有水，只有一望无际的草坪。草坪中间有罕见的河道或者水坑，只见四五人在路边远眺、水边钓鱼、草丛采摘。当地俗语云：“鄱阳湖中的草，南昌桌上的宝。”他们是在采摘藜蒿吧！鸟儿在野草丛中觅食、嬉戏、繁衍，坦坦然，悠悠然，欣欣然，时时可见飞窜的身影，时时可听鸣叫的声音，时时可感幸福的欢乐。也望见成群的鸟儿飞起落下，但未见野鸟数千的场景。

那条所谓公路，由卵石累积而成，仅高出草坪约1米，是临时性的湖中之路吧！车摇摇晃晃，很难行，问路人，曰是通往吴城镇唯一的公路。我想，

可能半岛的另外一侧有路，但绕太远吧！通过湖盆，上到岛上，便是水泥路了。不久，即到湖亭路，望湖亭就在吴城山顶，三楼一底，四角攒尖式顶，高大雄伟。

在这个曾经舟船密布、货运繁忙、人声嘈杂的码头驿站，现在几乎见不到人影。上山有几级平台、几十级台阶，我们便逐级攀登而上。来到山门，门楣上有“西昌大观”四字。再上至望湖亭，才发现这里是吴城的最高处，也是望湖的最佳处。眼前，岸边停靠着几只小木船，湖面行驶着两艘机动船。北望，湖面狭长，行船点点，有些像江面；西望，草坪辽阔，绿草如茵，有些像草原；东望，浑然浩渺，楼影迷茫，有些像县城。尧军说对面就是传说苏轼遗侍女碧桃的都昌县城，苏轼有诗云：“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望湖亭应该有诗碑吧！我离开底层，去台阶下边看那儿的碑，居然只有《重修望湖亭记》碑。诗碑在哪儿呢？我们登上二楼、三楼、四楼，也未曾看见诗碑。没有苏轼的诗碑，也没有其他的诗碑，很失望吧！值得欣慰的是，在我们造访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居然有另外两拨人来此登亭、望湖、怀古。

我们来此登亭、参观、拍照、朗诵、感应、体会、谈论，很有些雅趣吧！

尧军说：“‘康时’应该是社会安定之时吧！”我说：“当时，社会很安定啊！如此说来，‘康时’不就是当时吗？‘康时’是否是起用苏轼之时、挽救危难之时的意思呢？还得再查一查有关资料。”尧军说：“据《石门文字禅》记载，苏轼渡彭蠡时，发运司知有后命，派人拦截夺舟，要收回官方供给的坐船。苏轼乞求之下，才许诺送至豫章（南昌）。

在此如此背景之下，苏轼尚有以身许国之心，实在难得啊！”我说：“苏轼的报国之心何曾熄灭过呢？贬谪惠州如此，再贬儋州如此，仙逝常州亦如此。雷州渡海时，与苏辙相别，笑谓曰：‘岂所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者耶！’你看！苏轼宁可乘桴浮海、浪迹海外、向死而生，也绝不动摇自己的信念之本、治国之策、报国之志。临终遗表，为兴利除弊直言敢谏，亦可见其尽忠职守、鞠躬尽瘁、披肝沥胆。”

我欣然命笔，把《望湖亭》诗，写意如下：

八月的湖面，烟波浩渺，万象稀疏的影子，  
渐渐融入萧条的暮色。肃杀的秋风，在一片风帆的伤痛里劲疾，渡过湖面的暮霭，让一座孤山踩着自己的影子踽踽独行。

以身许国之心，在生命的灰烬里，孕育不熄的火种；挽救危局之策，在坎坷的岁月里，尘封治国的方术。万里之外的老家，让岷峨的秀色日日守候，不知漂泊在外的游子到老还能否归去。

之后，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吴城，原路返回永修县城，在“新味阁”酒店订餐，等待从成都开车过来一行人共进晚餐，共同品尝永修的“东坡肉”和“藜蒿炒腊肉”。永修的“东坡肉”为什么要用稻草拴起来呢？酒店经理告诉我们，不管是城里还是乡下，永修的宴席上“东坡肉”不可少。用稻草拴起，是因为买肉、煮肉之时都是用稻草拴起的，这样做出的“东坡肉”才会有稻草的清香呢！

“永修”者，“泮临修水，永蒙其利”也。岂独修水也哉？东坡是也。

刘清泉，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上接第68页）

2012年，苏辙逝世九百周年之际，三苏祠又协助举办了全国首届苏辙学术研讨会，编辑成《苏辙研究——全国首届苏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眉山市委书记李静女士作序，认为：“此次学术研讨会成果丰硕，赋予了三苏文化更丰富的内涵和更鲜明的时代感。公开出版《苏辙研究——全国首届苏辙

学术研讨论文集》，填补苏辙研究学术空白，可喜可贺。”结束了长期以来三苏研究中重东坡、轻颍滨（苏辙）的局面。两次盛会，我均有幸亲临，受益匪浅。

记得2006年8月，我偕我的学生，当时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教授唐凯琳博士、日本中央大学副教授池泽滋子博士，再次造访三苏祠。我说我的生日与苏东坡非常巧合，年月同庚，生日只差一天；唐凯琳教授也说，她与苏东坡也是同年同月生：莫非我们真的与东坡有缘？其实崇敬才是缘，热爱才是缘，努力才是缘，执著才是缘。就像这几十年，谁说得清三苏祠接待了多少海外的三苏研究者、爱好者？恐怕三苏祠也难以有准确的记载吧！这就是世界文化名人东坡先生的魅力所在。

2013年，我把所有的藏书和手稿分两次无偿捐赠给三苏祠，前眉山市委副书记苏灿先生、当时接任三苏祠博物馆馆长不久的陈仲文先生，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在博物馆财政吃紧的状况下，为广大三苏研究者和爱好者打造了一个具备良好阅读环境的“曾枣庄三苏研究室”，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藏书。

这两年，全国各地很多三苏研究者和爱好者，兴匆匆赶到三苏祠，却吃了“闭门羹”。原来芦山地震后，三苏古祠受到极大破坏，各级财政拨款和社会捐助近一亿元，对三苏祠进行了有史以来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维修维护。我们不知道这两年三苏祠全体工作人员和所有眉山人是如何辛劳的，但今年四月十九日这天，三苏祠重新开馆，我又再次来到这里，见证了一座几乎与初建一样，仿佛从来没有受到过损坏的三苏祠，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最后，还要在此感谢上海书店出版社，在我八十之际出版这部《三苏评传》，尤其是社长许仲毅先生、责任编辑孙莺女士，为本书的出版花费了大量心血，使我从三苏出发的学术生涯，又回到了三苏和三苏祠。

二〇一六年四月于成都文理学院

曾枣庄，四川大学古籍整理与研究所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

# 第 21 届苏轼国际学术会议征文启事

由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平顶山学院主办，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平顶山学院文学院、伏牛山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第 21 届苏轼国际学术会议暨苏轼逝世 916 周年学术研讨会”定于 2017 年 8 月下旬在河南平顶山举行(会期约四天，具体时间及地点以最后正式邀请函为准)，热忱欢迎您届时携大作光临。

## 一、征文范围

国内高等学校、科研单位、文博单位、新闻出版部门、苏轼遗址地从事三苏文化研究的学者及有志于苏轼研究的社会人士。

## 二、征文主题

1. 苏轼与中原文化；
2. 苏轼的哲学观（心性论、生死观、宗教观等）；
3. 苏轼的文学艺术和文艺思想；
4. 三苏家风、家规、家训，以及其他有关苏轼的研究。

## 三、参观考察

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郏县三苏园，具体包括三苏纪念馆、三苏坟、广庆寺、三苏祠、东坡碑林、苏轼布衣塑像、东坡湖、苏仲南夫妇墓和梁氏墓等景观。

## 四、征文说明

论文要求：作者可围绕征文主题自拟题目。内容须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深入、逻辑严密、语法规范，着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

调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论文内容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文责自负。严禁抄袭、剽窃，坚持原创，确保能符合学术不端检测要求，避免著作权纠纷；内容提要 50~100 字，关键词 3~5 个，注释采用尾注；页面设置：A4 纸，题目 2 号黑体，正文 5 号宋体。在稿件左上角注明“应征稿件”字样，在稿件末尾注明真实姓名、单位名称、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或者 QQ，以便联系。优秀参会论文将推荐至《平顶山学院学报》、《苏轼研究》等刊物发表。

## 五、论文提交时间

征文时间从征文启事刊出之日起到 2017 年 7 月 20 日止，请将大会论文的电子文档发到指定邮箱：[wwyletter@163.com](mailto:wwyletter@163.com)。

## 六、会务联系

会务联系人：

刘清泉：028-38299092 18990304628  
QQ:806704385

通讯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纪念馆三楼 312 室，邮政编码：620010。

王维玉：15837510198 Email：[wwyletter@163.com](mailto:wwyletter@163.com)

通讯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平顶山学院文学院；邮政编码：467000。

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平顶山学院文学院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日